

目 录

| | |
|--------------------------------|-------------|
| 抗日战争中的中越国际交通运输线····· | 陈修和 (1) |
|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人越受降纪略····· | 陈修和 (14) |
| 荣家经营纺织和制粉企业六十年概述····· | 李国伟 (30) |
| 国民党政府法币的崩溃····· | 资耀华 (45) |
| 金圆券发行后蒋介石在上海勒逼金银外汇的 回忆····· | 戴立庵 (55) |
| 书綦江狱····· | 章士钊 (64) |
| 蒋介石建立空军的黑幕····· | 许念晖 (66) |
| 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 | 黄绍竑 (71) |
| 桂系及其反动的政治组织····· | 黄启汉 (119) |
| 阎锡山的铁军内幕····· | 朱崇廉 (130) |
| 流氓军阀孙殿英····· | 张述孔 (138) |
| 刘神仙与四川军阀····· | 蒋尚朴 (160) |
| 补充和订正 | |
| 关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同志的被害····· | 宋云彬 (168) |
| 第四、五两辑订正二则····· | 任鸿隽 (169) |
| “南行使命”文内有关汤芑铭史实订正····· | 陶菊隐 (170) |
| 关于袁世凯····· | 恽宝惠 (170) |

附注

对《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一文的补充和订

正见《选辑》第十八辑二一八页、第三十一辑

三〇〇页

对《关于袁世凯》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

三十一辑二九五页

抗日戰爭中的中越国际交通運輸綫

陈 修 和

一、中越交通的調查和鐵路公路的扩建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軍閥发动侵华战争時，我正在陝西宝鸡勘査计划中的兵工厂厂址(我当时是兵工署兵工研究专门委员)，忽得軍政部兵工署长俞大維急电，要我赶回南京。我回到南京后，俞告訴我說：“中日战事已起，新建兵工厂緩不救急，我国部分軍火和大部分制造兵器的材料都需要从外国进口，而沪、粵等处海口将为敌人封鎖，无法輸入，惟越南海防有鉄道通入云南和广西边境，可以补救这个严重問題。已同法国駐华武官商談过，我国軍火有权通过越南，希望你偕同法国軍火商龙东前往越南視察中越交通情形，期于一个月內返京。”我接受了这项任务，立即找到法国武官和龙东，商办赴越手續，当日签妥护照，偕同龙东从上海經香港到广州，乘西南民航机飞往河內。我国駐河內总領事館已先得电报，我飞抵河內后，即同总領事許念曾、龙东到法国印度支那总督府与主管部的政治部长面談。他同意我国軍火物資在越南通过，惟德国制造的武器，則拒絕假道。我先后在河內、海防住了几天，調查海防港口和越北鉄路、公路的设备情况及运输能力后，乘火車到达越南边境的同登，經鎮南关(現改名睦南关)到龙州，又由龙州乘車

到南宁，与两地广西地方負責当局商談運輸問題和改善水陆交通办法。随后，我由南宁乘飞机到桂林，看見了李宗仁，他也表示尽力协助改善广西的交通，支持抗战。我于八月中旬回到南京，日寇已发动侵犯上海的战争，新辟一条国际運輸綫已十分迫切。

根据这次短期的調查，海防港口，万吨輪船可以停靠碼頭，起重和倉庫設備也相当完善，惟越南鐵路均系窄軌，海防到昆明的滇越綫計長八四八公里，山洞甚多，坡度极大，每月运量只有一万吨左右。由海防到广西边境的鐵路二六七公里，路綫較平，沒有山洞，每月运量較大，但終点那岭在龙州左江上游支流的越南边境，仅有小船可以接运，大件器材不能通过。一般運輸都从同登車站（距鎮南关四公里）轉入南鎮公路，先到南宁，量小費巨，很难适应軍事上的需要。因此，我根据上述情况草拟了一个报告书，建議由同登建筑一条約五十公里的鐵路支綫通到龙州，再将龙州以下的各河流加以整理，使小輪和木船能終年通航，大件器材可以經越桂鐵路运入，通过水运轉到內地；同时改善現有公路，加強水陆交通联系，扩大運輸能力。俞大維将我的报告轉与何应欽和蔣介石，他們都批准了，并限令交通部于六个月内将龙州到同登的鐵路修成，同时赶工整理广西的公路和航路。

但是这个建議，只能在国民党买办政权的历史上記下了一笔債務，对于軍事運輸沒有发生过絲毫的效果。因为南京交通部派員測勘的結果，发现同登至龙州間山谷較多，工程較难，遂决定改筑同登經鎮南关至南宁二百公里的南鎮鐵路。当时交通部长张嘉璈不考虑軍事上的時間性，不按照中国自己搶修鐵路的积极办法，却勾結法国殖民資本家的法国銀行团和官僚資本集团宋子安的中國建設銀公司，投資合組中法建筑公司，承包兴建。談判数月，到

一九三八年四月才將公司成立，在諒山設立工程處。在這樣迂延時日、組織複雜的情況下，儘管這條鐵路地勢平坦，只有一條小隧道，沒有大橋，工程進行，仍極遲緩，直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才築成通到左江岸邊崇善約一百公里的窄軌路基，但鋪軌尚未完成，而日軍已從欽州登陸，侵入南寧，因而又不得不倉皇拆除。此路從批准到興建，前後經過兩年多的時間，而軍事運輸始終未能利用一次。

抗戰初期，中越交通除了上述的南鎮鐵路外，還在距這條路線西北二百公里以外地區修了一條公路，稱為田岳路和河田路。該線起自黔桂公路的車河，經東蘭、田州、田東、天保、靖西到越邊的岳墟，與越南高平屬重慶府邊區公路連接，共長約五百公里。越南境內，從海防、河內、高平到岳墟的公路約四百多公里。一九三九年二月，日寇侵占海南島，以後又封鎖我沿海區域，禁止外國商輪航行，南鎮路受到海上敵人可能登陸的威脅，遂趕工修築這條公路。人民羣眾在抗戰熱情的鼓舞下，很快就建成了路基。是年十一月南寧失陷，該路未被切斷，在敵軍侵入越南以前一段時期內，儘管受到法殖民當局的許多限制，仍然繼續擔負了重要的軍運任務。

二、中越運輸概況和法殖民政府扣留

蘇聯援華軍火及抗戰物資

日寇侵犯上海以後，國民黨政府的軍事當局尤其是兵工署方面，要求立即在西南地區建立國際運輸機構，乃由軍事委員會命令交通部次長曾養甫在廣州組織西南運輸處，擔任進口軍用物資的運輸。我於九月初旬再赴廣州，代表兵工署與西運處聯絡並兼任兵工署駐香港辦事處的工作。九月下旬，有法國製造的武器一批經過越南運入廣西，我前往擔任檢驗和接收工作。時西運處已在南

寧和河內設立分處，俞大維也要我在河內設立辦事處，但我因為河內業務不多，請領館和西運處協助，已足應付，沒有成立。

抗日戰爭開始後，蘇聯為了支援我國抗戰，經與楊杰（中國政府駐蘇大使）商妥，將蘇軍自用的軍火倉庫撥了一座，在黑海某軍港裝船，秘密開赴遠東。其中兩艘輪船指定在海防轉口，運入我國。所裝的戰車、火炮等大件，均準備隨時交付部隊使用，未曾裝箱，以致在海防碼頭起卸時，被日軍間諜看見，日本政府據以向法國殖民當局抗議，要求禁止運入我境。法人畏敵如虎，接受了日人的無理要求，停止我方運輸。當時僅有戰車、戰防炮及小部分彈藥已裝入火車（約二千噸左右），原擬運至同登卸下，經公路運入廣西。我們得到法人禁止內運消息後，急從同登將原車折回，改經滇越鐵路運昆明，等到法殖民當局命令到達，這列火車已離開越境了。這批武器突然運到昆明，接收保管，均無人負責，除電告重慶外，我飛往昆明先同雲南省主席龍雲和航空學校校長陳慶雲商洽，暫由當地駐軍和航校代為看管。沒有幾天，兵工署已派員到昆明辦理接收，我就飛回河內。這次緊急措施，僅僅運出整批中的大件部分，尚有大批彈藥卸置港口，法人不准通過，又不准轉船他運，實行扣留。我國政府向法國巴黎政府及印度支那殖民政府幾次交涉，均無結果。根據中法條約，我國軍火有权由滇越路通過，法殖民當局扣留這批械彈，實屬違反國際條約，經我方嚴重抗議之後，才同我們商量解決辦法：他們提出表面扣留、暗中讓我們採取走私方式，由海防裝小舟運至芒街，轉入我國廣東邊境的東興。時宋子良已代曾養甫接管西南運輸處，他同意了我們的協議，據情轉告蔣介石。我國軍事當局迫不得已，批准了這個辦法。但此時敵人軍艦早已停泊欽州灣外，我們的行動如稍不機密，即有遭炮擊的危

險。为了安全和避免損失，我先赴南宁与西南运输分处处长汪英宾乘車經欽县、防城到东兴，考察該綫公路情形，布置中越交界的接轉地点。凡临近东兴沿綫竹木丛箐的蔭蔽地区，均划作暫時存儲的露天倉庫，以备轉运。我由东兴进入越境芒街，乘小輪返海防，視察沿海情形并与海防西运分处处长黃強詳商偷运办法。布置已毕，我即同黃強和西运处工作人員駐于芒街，汪英宾則駐于对岸我国境内的东兴。我每日通过中越国界的大桥，往来两方，密取联系。海防卸存械弹装上木船，用小輪拖帶，沿着海边，轉入芒街內河，再駁上东兴江岸，运到預先指定的臨時倉庫。如此昼夜工作，历时几及一月，始将三千余吨的械弹运入国内。是時戒备极严，凡行踪可疑的外来行人，均暫予扣留，俟运输完毕，再行解禁。日寇于开始駁运的前一日，忽派飞机在距东兴二十余公里的白龙尾海角投弹数枚，幸均落空地，未受損害。当时敌人或已微有所聞，但終未发现我們偷运的形迹，虽东兴口外，敌艦在望，我們兢兢业业，時虞炮弹飞来，但二十余日中，倖未发生意外事故，参加工作的同人，莫不感到十分庆幸。从此以后，除法国制造的武器外，各国軍火都不得假道越南，而法人供給我們的武器为数极微，因此，滇緬公路遂成为此后从海上輸入軍火的唯一要道了。

我国軍火虽不能从越南經過，但机器材料尚未发生过境問題。当时軍政部已决定在昆明附近建立四个兵工厂，由东南內迁的兵工厂，也匆忙間在黔桂两省的桂林、柳州、貴阳等处重建，因而从越南运进机器材料，仍然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但南鎮鉄路的修筑，正与法人开始談判，尚未动工，仅靠公路运输，汽車少，路綫长，运量有限；同时滇越鉄路也因昆明对内地交通尚未改善，鉄路的能力沒有充分利用。据法人印度支那統計年鑑称，由海防到昆明的

鐵路運量，一九三七年為三萬三千多噸，一九三八年僅增到五萬一千多噸，這個數字雖然仍有遺漏，但也可以看出當時的一般情況。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廣州、武漢相繼失陷，越南海防就成為我國在太平洋上唯一可以依靠的港口。原來經過香港內運的公私物資，均大量地湧入海防，碼頭倉庫，貨物充塞，沿江馬路，機器材料堆積如山。駁船停滯江心，不得卸貨，甚至有載重過量以致沉沒的。海防港務局因存貨過多，倉庫不能容納，又無法疏散，遂限制貨輪入口。我國公私機關竟事搶運，滇越鐵路成為活動的中心，投機商賈和公私不分的國民黨官吏，賄賂管理鐵路的法人，購買運貨車皮，大發其國難財。該路每月運量不過萬餘噸，海防存貨已在十萬噸以上，舊的未運出，新的又到，擁擠情形，有增無已；而法國殖民政府官吏凭借權力，多方留難，要挾需索，無所不至。

抗戰以前，中國政府在越南的機關只有外交部的河內總領事館、海防領事館（屬河內總領事館領導）和西貢領事館（直屬外交部）。抗戰以後，重慶政府各單位在越設立的機構計有：西南運輸處海防和河內分處、軍政部兵工署駐海防辦事處、交通部駐河內和海防代表辦公處、航空委員會駐海防辦事處、資源委員會駐海防辦事處。中央信託局、航空公司、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等都在河內、海防設有營業機構。其他機關、工廠、學校和私人企業等派有代表經常往來或住在海防、河內的數目也很多。同時，海防、河內也到了大批中國的投機商人，旅館住宅，滿坑滿谷，酒食征逐，歌舞喧闐，滬、津、港、粵商埠的惡習，充分暴露出來，使越北變成了空前繁華紛擾的情況。華僑和越南人民習於節約，對這種不顧國家危難的敗類，表示十分憤慨。行政院根據報告，曾三令五申，予以告誡，但是，這些發國難財的人大都是孔宋官僚資產階級集團有關的人物，

他們习見于孔宋家族的驕奢淫逸生活,对于孔祥熙(当时的行政院长)的命令,莫不嗤之以鼻,毫无忌憚。

一九三九年九月,英法对德宣战,十一月日寇侵入南宁,南鎮公路全綫失陷,幸新修的田岳和河田公路,已接通越南的高平,但未鋪路面,勉強通行。當時停滯海防、急待入口的公私汽車,达五千輛以上,由諒山至高平的公路,路面狹窄,只准单綫往来,法殖民当局規定每日通过車数为五十輛,限制了我国的搶运。敌人侵据龙州后,已无力前进切断公路,乃派机轰炸,阻扰行車,我运输車队虽時有損伤,仍昼伏夜行,未曾間断。

是時滇越鉄路的运输,异常拥挤,公私机关,不择手段,搶运物資。敌人又派机轰炸云南境内开远和河口附近的鉄桥,桥梁被毀,鉄路中断。兵工署留存海防的机器材料尚存一万多吨,昆明、重庆各厂均待这批器材开工。俞大維鉴于情形急迫,遂报請蔣介石統籌运输办法,以图补救。蔣命宋子良亲赴河内主持西运处工作,海防分处改由陈体誠負責。我也代表兵工署专設机构与西运处配合,同時商請鉄路当局予以协作,凡公私物資經過滇越鉄路,均由西运处統一支配,所有鉄路平車,全装兵工机器,逕运昆明,而汽油、五金材料,亦列入优先起运。時鉄桥尚未修复,我同宋子良乘汽油車赴开远視察搶修情况,并决定在鉄桥尚未修复之前,先将重要器材运入国境河口儲存,再待接轉。过了二十几天,便桥完成,才恢复通車。

但是,法国殖民主义者又借故留难,乘机掠夺。他們看見我国軍用物資堆积海防,十分歆羨,尤其对于兵工机器,覬覦最久。当欧洲战事发生以后,如前所述,法殖民政府即宣布德国制造的商品不准通过,并将我国兵工署大批德制机料予以扣留。事实上,这些

机料早于欧战发生前运存海防，待車轉口。法殖民当局不顾这些事实，仍然視同敌貨，企图沒收。中国政府与巴黎法政府交涉再三，才同意由行政院长孔祥熙在我国貨单上签字，証明已屬我国物資，飭令放行。但法国殖民軍部借口軍事需要，突于某日又派軍官到海防倉庫，不許德制机器起运，一再交涉，毫无結果。我考虑當時的情势，再难等待重庆命令或拖延時日的談判，遂与法軍部直接商量，凡同类的工作母机，其数量較多者酌借一部分，其余的机器，即任我起运，他們同意。我从权借了新式銑床十几部和其他零星机械，由法总督府与我国駐河內总領事館办理正式借用手續。这些殖民強盜，暫時达到目的，短期中沒有再来留难，被扣的一千余部重要机器加速地运到昆明，各新办的兵工厂才勉強开工生产。我事后报告兵工署，重庆方面也只好追認。

滇越鐵路是坡度很大的窄軌(一公尺軌距)，貨車載重量(二十吨)和山洞限界都很小，不能通过大型机器。兵工署原来购好的几部水压机无法运入昆明，又不能从广西运到內地，曾計劃将这些机器运过国境的河口附近(海防到河口一段无山洞)，在紅河边上設一分厂，但为了軍事上的安全，沒有决定实行，这些机器以后一直弃置在海外。

国民党政权从来不計劃自己設厂制造兵工材料，完全依靠外国供給。抗战两年，存貨和进口的物資，几乎全部用罄。重庆各兵工厂急待进口材料开工，电請由河內空运接济。我們虽然尽力交运，因为数量太少，无济于事。當時公路运输，均系分段接轉，費时很久，錯誤甚多，不能按需要运到。我同西运处商定，将急用兵工材料装卡車百輛，由海防經广西新公路直駛重庆，試办一次，以应急需。兵工署对于如此长途行車，頗表怀疑，但历时不到一月，由

于司机同志的勇敢机智,冒着敌机轰炸,仍安全到达,毫无损失。此后各兵工厂遂纷纷要求由海防直运机料,惟施行不到三个月,中越交通又被法殖民政府封锁了。

一九四〇年六月,欧洲法军失败,法国政府向德国法西斯投降。日寇要求法殖民政府停止中越运输,派日人监视封锁中越边境。法殖民当局不顾中法外交,接受了日寇的要求。我国运存越南的公私物资,尚有十余万吨停留在海防各地,唯一的希望,只有转往缅甸,从仰光进口,但英国殖民当局,也接受了日寇的要求,封锁滇缅公路三个月。国民党政权妄冀英法帝国主义者不致投井下石,遵守国际条约,得到了这样的结果之后,仍然没有使他们有丝毫的觉悟。我国存越的重要物资,虽曾计划转口一部分,但进行不久,因日寇进军而停顿下来,中越运输从此完全断绝。

从一九三七年九月到一九四〇年六月,我国经过越南的物资,除苏联援华军火外,以生产资料的机器、材料占主要部分。数量最大的是飞机汽油和其他燃料油料;生活资料则比较居于次要地位。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上半年运量较大,根据回忆,粗略估计滇、桂两省的铁路公路,每月运量始终没有超过两万吨,而时遭阻扰,断断续续,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可能达到三十多万吨,连同开始的一年多,即抗战前期的两年九个月当中,我国经过越南运入的公私物资,约在四十万吨左右。被法人扣留一直没有清算清楚成为悬案的,当时估计约有十几万吨,其中包含的物资仍以机器材料所占的比重为最大。

当运输紧张之际,我国运输机关里的中越职工(曾由广东调来一批中国工人分担装卸)都昼夜工作,抢运机料,同心协力,完成任务。越南人民和华侨也给予我们很多帮助,支援我国抗战,在这个

回忆当中是應該提到而深深感謝的。

三、法殖民政府拒絕同我国合作抗日 和日寇进入越南后的情况

自从法殖民政府封鎖中越边境,停止中越运输后,日寇又进一步要求法殖民当局簽訂日法軍事协定,想从中国拔出泥足,进兵越南,作为南进的根据地。法国殖民者模稜两可,观望形势。我們各机关推駐越总領事許念曾面見印度支那总督德古,探詢他对于日軍的态度。德古提出:“假使法人抵抗日軍的侵犯,中国方面究將給予怎样的支援?”領館据情电告重庆政府,立得回电:“如法軍与我合作抗日,我政府决定派九师兵力援助。”但法国殖民当局得到我国的通知后,仍迁延观望,不作决定。嗣后我駐越各机关鉴于情势紧急,推我飞重庆面見參謀总长何应欽,报告越南情形。經何轉告蔣介石,要我于次日返越,邀請法方派軍事代表到重庆面商。我赶回河內,即由許念曾面告德古,并留专机等候他的代表飞往重庆。經過半天的商談,法殖民当局真情暴露,原来他們已准备接受日人的要求,拒絕同我国討論合作了。

日軍由桂边侵越,法殖民軍中的越南官兵,乘机革命,紛紛起义,于是日軍很容易地包围了諒山。海防日艦也采取行动,日空軍更用法国造的飞机,向海防河內投弹。法国殖民者养尊处优,素无斗志,軍事設施,只作鎮压越南人民的工具,实无抵抗日寇的能力。并且外震日軍的勇猛,內惧越人的革命,尤怕我軍入越,华侨合作,法人地位根本动摇,所謂备战求援,不过是故作姿态,以欺騙国际視听,掩飾其怯弱而已。

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二日,法日协定簽字,日軍由諒山、海防

两处向河内前进。法殖民当局通知我領館：“已不能保护你們的安全。”我国駐越各机关驟得这个消息，即商滇越鐵路局，特备車輛，將我国全部駐越公務人員撤至老街轉入国境。時河口鉄桥已为我軍炸毀，滇越鐵路从此中断（一直到解放以后，才由新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將其修复）。駐河内总領事館原拟隨車入滇，因中法外交关系，尚未完全断絕，我国三十万以上的侨民，散处越南各地，領事館負有保护責任，应否撤退，我們研究由許总領事与越督面談后再定。許当夜会見德古，德古要求河内中国領館撤到順化或西貢暫住。我考虑存越的軍用物資，已有一部分疏散越南各地，可能乘机轉口，搶运仰光。因此，我同領事館人員于二十二日午夜乘汽車南下，而入越日軍即于次日进河内，开始搜索我駐越公務人員和預备待命的員工，其中有被敌軍逮捕殘害的。

我們赶到西貢接获河内消息：我国原拟轉口物資，因敌軍初到，尚未完全查出，仍可运离越境。在敌軍进迫時，我們曾疏散重要材料一千余吨暫存越北义安的边水港，内有钒鉄、鉻鉄、鉬鉄、鉬錠等軍用冶金原料，大战期間，勢难再向国外购入，乃急电香港西运处請派专輪駛赴边水接运，立得复电租輪前往。我赶到边水，协同搶运。船方出港，当地海关突奉法殖民当局电令扣留，然已不及矣。海防装运轉口物資各輪，乘日軍登陆秩序紊乱之际，开出了几艘，但不久即为敌人查觉，有一艘被扣，強令將船内器材卸回，其余的就不能再动了。此后我存越物資，遂全入法人掌握，任敌軍予取予求。重庆政府对法殖民当局的違約行为，虽曾屢提抗議，而越南的法殖民当局一向以我国为最大的假想敌人和进一步侵略的目标，乘机打击，毫无顧忌，甚至巴黎法国政府与我国外部商定的办法，他們每每不肯遵行，法政府派員督察也难于生效。帝国主义者

放縱其殖民地官吏違法橫行，已成尾大不掉之勢，我們的抗議恰恰是這些殖民強盜討好日寇的最好資料。

日寇侵入越南，占據海防、河內及附近重要交通地區，法殖民主義者，俯首聽命，與維琪貝當政權，狼狽相依，助紂為虐。敵人封鎖我國運輸綫的目的已經達到，侵占南寧等處的敵軍，受到我人民游擊隊和惡劣氣候的襲擊，傷病累累，遂全部退入河內，集中整理，補充休息，而將中越邊界交法軍駐防，代為守御，脫離了與我軍接觸的困境。從此，法軍受了日寇的指揮，成為日寇的仆從；日軍不損一兵一卒，控制了北越的軍事要地。

當日寇開始向越北進攻的時候，利用越南人民反對法帝國主義的情緒，裝着同情的模樣，鼓吹黃種人團結驅法，因此，曾有一部分人受其欺騙，為日寇利用。而法國殖民強盜雖然不敢抵抗日軍的侵入，但對於風起雲湧抗法起義的越南人民，如西貢近郊等處的暴動，則採取血腥鎮壓的手段，用猛烈的炮火，毀滅整個村莊，殺盡無辜人民，情況慘烈，聞者痛心。當時我正由西貢赴河內，在一個旅館里午餐，一位越南服務員，很殷勤地招待我們，他後來問明我是中國人，誠懇地說：“我們是同族兄弟啊！我在不久的下一個月就要到河內日本軍營里從軍去了。”我很驚异地問他為什麼，他奮激地說：“我們受了法國殖民者長期的壓迫與殘殺，不能再忍耐了，我們要聯合日本人把法國人趕出去。我們同日本人都是黃種人，中國同日本為什麼不能合作？”我很同情他反法的热情，但是，因為他們對於日本軍閥的殘酷的侵略行為還不了解，我舉了朝鮮和中國歷史上的事例，以及最近日寇在中國的罪行，勸他不要受日本軍閥的欺騙，越南人民不久就有解放的機會，最後他同意了我的意見。以後事實證明，法國殖民主義者血腥地鎮壓越南革命，是日本軍閥支援

的。日本法西斯的凶惡面貌，不久即在越南人民面前逐漸地被揭露了。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泰國乘日軍侵入越南，向印度支那法國殖民政府索還失地，兩國進入戰爭狀態。後經日人調停，法殖民當局割讓柬埔寨及老撾一部分土地，於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在西貢日艦上簽字，法泰糾紛，暫時告一段落。日本軍閥乃加緊壓迫越南人民，幫助其法國傀儡安定越局，以便掠奪物資，奴役人民。在以後的四、五年中，越人受日法殖民主義者的雙重壓迫與剝削，過着非人類的生活，並發生了餓死二百萬人的慘劇。

法國派駐重慶的外交代表，鑒於我國大批物資扣在越南，法國政府萬難推卸責任，乃與法殖民當局籌劃，擬將我國物資轉讓，或運出一部分。我奉命暫留越境，待機洽商，並往來於西貢、河內、高平等處。調查可能搶運的辦法。我雖時與日人相遇，幸未遭其毒手，蓋日寇僅據守戰略要點，對於越南民政表面上不加干涉。汪偽政權已派員入越，設立機構，拉攏華僑，只要不是重慶政府派的人員，尚可自由通行。我改易姓名，另換護照，往來各地，均于小站下車，再換車到達目的地，故始終未被敵人發覺。

日越既侵據越北，更要求占領全越的軍事基地。法國維琪政府於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簽約承認，日海軍亦將陸續在沿海登陸。我的任務雖未完全終了，但留此已無作用，乃電兵工署報告越中交通運輸絕望形勢。時我兼任兵工署駐香港辦事處副處長，原任處長方兆鎬調赴仰光，俞大維急電我赴香港接替，遂於七月二十八日由西貢乘輪赴港，結束了我自抗戰開始到越南建立中越交通綫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軍入越受降紀略

陈 修 和

一、法殖民軍的逃入云南和阴謀返越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国民党政府設“中国陆軍总司令部”(以下简称陆軍总部)于昆明,何应欽从軍政部长的职位調来担任这个机构的首脑,越南方面的軍事任务也划归陆軍总部直接管轄。

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駐越南的日本軍队突然以武力解除法殖民軍的武装,并将所有法籍軍民全部拘禁在集中营內。駐在中越边境的部分法軍,糾集越籍士兵三千余人,由原任法屬印度支那殖民軍參謀长亚力山得里中将率領逃到我国云南境內。陆軍总部得到这个消息后就报告了重庆,法軍駐重庆的代表极力要求我国收容,准其留駐在云南境內,給以盟軍的待遇。重庆政府同意了他們的要求,命令陆軍总部就地安頓。但駐防滇南的第一方面軍司令卢汉,对于这一批不久以前还是我們敌人的法軍不肯收容。何应欽为了处理这个問題,除电卢汉遵照重庆的指示外,命我亲往开远同他商量,并赴建水、石屏等处視察法殖民軍的情况。我去視察时,看見这些曾經作威作福、双手染滿越南人民鮮血的法国強盜,胁同一些越籍士兵十分狠狠地散住在破庙或公共建筑中,他們衣服襤褸,口粮困难,向我們搖尾乞怜。我同卢汉商量的結果,决定将他

們安頓在蒙自附近草坝的營房里。一切給养由陸軍總部按盟軍待遇予以供应。

一九四五年七月，国民党軍在湘西反攻告捷，陸軍總部前进到湘西的芷江，另于昆明設立办事处，何应欽派我担任办事处主任，負責处理后方留守工作和与美法軍接洽的事宜。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广播投降，我們得到消息后，因为出乎意料之外，对于胜利后的安排，毫无准备，因此反而有些无所措手。盟軍總部規定法屬印度支那十六度以南由英軍受降，十六度以北由我軍受降。駐昆法軍司令亞力山得里向我洽商，派法国飞机到河內与日本联系。我报告了何应欽，認為他的阴谋是想法机一到河內，就可打出电报，在国际上宣传法軍已重回越南，收复河內。我們都主张决不允許他們这样做，立即命令昆明空軍司令晏玉琮将停在机場的法国飞机予以扣留，以防其潛飞越南，并严令駐在云南境内的法軍在我軍接受日軍投降之前，应駐原地待命，不得进入越境。法机被扣后，駕駛法机的空軍軍官向我探詢被扣原因，我把这些經過告訴他們。他們認為亞力山得里无权指揮法国空軍，他这种不适当的活動使別人无辜受累，并要求允許他們飞回法国，保證不飞往越南。我答复他們說：“法国飞机要等待中国軍隊到达河內以后才能放行，你們个人可以自由行动，也可以上飞机查看，但不准起飞。”亞力山得里也极力向我解释，說他並沒有別的意图，完全是出于一种誤会，要求把飞机放行。我推說是何总司令的决定，非待中国軍隊进到河內不能改变这个命令。亞力山得里屡次要求面見何应欽，企图打破我这道难关。我主张接見亞力山得里，当面揭穿他这次的阴谋，杜絕以后的破坏活动，并严厉指出他过去在越南阻撓我們的軍运，扣留我們的物資，勾結日軍、反对同我們合作等等罪行，声明我

們不咎既往，已很寬大，決不允許他搗鬼和干預受降工作。亞力山得里隨帶一名中國譯員（是一個姓王的老留法學生）來見，何應欽同我一起接見他。何听了他的報告和要求后，就將我們預先商定的話用申斥的口吻說了一遍，而他的譯員竟不敢照直翻譯，只是輕描淡寫地譯了几句。我听了很生氣，立即質問譯員為何不照實翻譯，何應欽也勃然大怒，要我翻給他們听。我覺得如由我口里說出來，可能使亞力山得里誤以為是我的意思，我當即要譯員重新翻譯，不得絲毫遺漏。亞氏听了，面紅耳赤，侷促不安，只好道歉認罪，不敢再說下去了。但是，他們並不死心，又向重慶活動，竟取得了國民黨外交部同意放行被扣飛機的文件。

事實證明當時重慶內部的混亂，比較外部敵人的威脅還要嚴重。我要求何應欽直接同外交部長談妥：關於越南問題，必須遇事協商，步調一致，不得採取片面行動，否則我們以後無法工作下去。何應欽立即掛了一個長途電話給外交部長王世杰，指出外交部未經陸軍總部同意，也沒有同他商量，逕自允許法軍的要求，發出書面文件，超出了外部的權力，陸總當然拒絕執行，并警告王世杰以後要特別注意，以免我國內部發生糾紛，被法人利用。

二、國民黨軍進入越南

一九四五年九月，中國戰區由陸軍總部派副參謀長冷欣到南京設立前進指揮所，九月九日在南京舉行了日本投降儀式。印度支那十六度以北地區，包括越南的一半和老撾的大部分，決定由第一方面軍司令盧漢統率全軍入越，接受日本的投降。在入越以前，陸軍總部曾規定了几條辦法（手頭無原文，僅記概要）：（一）接受日軍的投降，解除武裝，遣送回日；（二）組織軍政府管理民政；（三）駐

云南的法越軍在原地待命，不准入越，如有个人志愿返回越南者，必須解除武装。陸軍總部的決定，沒有把法國人當作對象，沒有考慮把越南交還法國，更談不到同他們合作。而重慶反動集團，在同法國殖民主義者的勾結下，另訂出新的出賣越南人民的十四項原則。據財政部代表朱僊所著的《越南受降日記》（一九四六年十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九月十五日重慶行政院召開越南顧問團會議，對於占領越南的軍事及行政措施，指示了十四項原則，其中兩條是：行政院于占領軍總部內設顧問團，由外交、軍政、財政、經濟、交通、糧食六部及行政院秘書處各派代表一人組成；凡占領軍總部有關行政部分的一切命令概由顧問擬定，由總部頒布施行，顧問團召集人得為占領軍總部發言人等。其他十二項中，就有九項與法國有關，如第二項：占領區內駐防軍及過境軍數目隨時由占領軍通知法方；第五項：為明了實際情況及整齊步驟起見，顧問團得與占領軍總部第五處處長副處長、美軍代表及法國代表團之主要負責人員舉行會報，密切聯繫；第六項：請法方派代表參加受降典禮，並指定人員若干名組織一代表團，協助占領軍總部辦理資產接收及物資供應事宜；第七項：越南境內一切交通工礦事業責成現有人員繼續維持及經營，听候占領軍總部商洽法方派人接收；第九項：越南流通的日幣及占領軍使用的貨幣問題，由外交、財政兩部與法方商妥後另訂辦法；第十項：占領軍所需糧食、煤炭及運輸工具等，由法國代表團設法責成越南現有機構供應負擔，將來由外交部與法方另商清算辦法；第十一項：政府各部及人民前在越南遺留或被扣留之物資，應由經濟、財政兩部搜集以前調查所得資料，將來由外交部提出向法方交涉；第十二項：占領軍區內法方回越的行政人員，法國代表團應將全部名單隨時通知占領軍總部；第十三項：對法越間一

切关系,概严守中立态度,不加干預。重庆当局定下这些原則,完全忘却了六十年前法殖民者侵略越南而引起的中法战争和半年以前法日合作向我进攻的事实,也不顧法日强盗互相厮杀、法殖民者还在日軍集中营内、法国在越南是否还有什么現成机构的事实,而是假定法国仍为越南的主人,要中国占領軍替他們从日本軍閥手里拿回来,双手奉獻給法国殖民者。这种出卖中、越两国人民利益的办法,除了說明国民党反动統治集团已被法殖民者收买,甘作走狗而外,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然而越南人民的力量,打破了法殖民者勾結国民党反动集团偷偷地重回越南的迷梦。

第一方面軍司令部先派副參謀长尹繼勛先到河內設立前进指揮所。卢汉和我于九月半乘軍机飞抵河內,我代表陸軍总部并預定参加軍政府工作。当我们到达河內以后,发现政治上的情况与事先所想象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已經建立了民主共和国,成立了临时政府,掌握了全越南的行政权。这样,原来計劃設立的軍政府当然沒有必要了。我在河內住了两天,就飞回昆明找何应欽請示。当时何应欽往来于重庆、芷江、昆明、南京等处,我发了几个电报,都沒有得到答复,也不知道何时能来到昆明。某天杜聿明告訴我一个絕密消息說,蔣介石已到了西昌,如有关于越南的情况,他可以代我轉去。我就写了一个报告,特別提到胡志明已組成了越南临时政府,坚决反法,不准悬挂法国国旗,受到了越南人民的拥护,如果我们不同他合作,或让法国軍隊回去,就会惹起越南人民的反对,发生中越冲突,影响受降,并将在历史上造成中越人民的恶感。我要求他慎重考虑,給予指示。过了两天,杜聿明通知我說:“委員長已看到你的报告,何总司令就到河內,他叫你回去商量,昆明空軍已准备飞机(当时只有軍

机来往)送你回越。”我于次日(十月三日)上午重返河内。

何应钦已先一日下午到达,他对于我的离开河内表示不满。我对他说,当前越南的情况和原来的设想完全不同,而各方的意见亦极不一致,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我留此无益,希望早日回到兵工署去(我原在兵工署任职)。何最后安慰我说:“你研究越南问题很久,不必放弃这个机会,可以代表我在这里工作,如何做,我们再讨论。”当日晚餐以后,何同我们正在闲谈,见卢汉的神色忽然大变。一个秘书问我:“你才从昆明来,知道那里发生事变吗?”他告诉我刚才得到电报,杜聿明已包围五华山(龙云的司令部)向龙云开火。我才了然蒋到西昌、何到河内,都是为了布置赶走龙云的工作。第二天发表调龙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卢汉继任云南主席。从此以后,卢汉就无心过问越南方面的事了。

越南十六度以北地区,国民党军禁止法军入境,所有被释放的法国军民男女不准携带武器,也不得悬挂法国国旗;中国军队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九月廿八日在河内举行的受降仪式,也没有法国代表参加。卢汉用中越两种文字发布文告,自称此来除了受降外,还是越南人民的朋友和解放者,并宣布对于各级行政机构和人员也一切照旧。这些处置暂时稳定了中越和法越间的关系。但国民党军进入北越以后,被蒋政权培养起来的越南国民党武鸿卿和越南革命同盟会阮海臣等反动分子随军返回越南,利用蒋军势力,到处寻衅,企图推翻越南人民的革命政权,取而代之。而重庆国民党中央机构的海外部、侨务委员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统局和军委会的军统局等都派有人员在河内设立机构,同越南的反动派互相勾结,自由活动。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指示,对他们的活动自然不敢予以制裁。

何应欽来到河内,除了商同卢汉安撫云南系統的軍隊外,当然是解决中国内部的問題和对付越南的問題。何在司令部(前法国总督府)召开會議,作出了各种決議,其中重要几点如下:(一)限十月卅一日完成日軍投降和解除日軍武装工作;(二)限十一月十日前完成日俘的集中;(三)我軍兵力部署,以集中主力、占据战略要点为原則;(四)占领軍司令部設立第五处,由卢汉兼任处长,陈修和为副处长,再由美方加派一副处长;(五)由第五处、中統局、軍統局、海外部、侨务委员会、三青团等单位,合組汉奸罪行調查委员会;(六)由中美两方合組一临时調查委员会,調查战争罪犯,并由第五处負責主持;(七)由行政院顧問团負責調查政府及商民在越南的物資損失;(八)将入越游杂部队和特种机关列表呈閱,并由司令部处理;(九)对于越南临时政府的态度必須审慎,保持友好立場,但不可有正式公文来往,办理交涉最好用无头无尾的备忘录;此外,还有关于占领軍的經費和当地交通电信修复原則等等。以上几条決議,对于国民党政权在越南的受降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但美軍方面不愿意参加第五处和战犯調查委员会,所以这两条有关决定以后沒有实行。新組織的法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圣德尼向何应欽极力討好,他說:“中国方面不喜欢法軍司令亚力山得里,已另派人接替了。”但是这次會議沒有考虑同法国合作的問題,司令部内部更沒有法国人参加。中国各方面所設机构都由司令部指揮,不得自由对外,而这些工作大部分归第五处主持,卢汉經常去昆明,我就不能不主动地多負担了一些責任。

三、中外各方面对于越南的态度

胜利前后各方面对于越南的态度和中越关系的变化,从直接

間接所得的情況，簡要地分析如次：

（一）中國方面

蔣介石：我在以前雖然寫了幾個關於越南情況的報告給蔣介石，但幾年當中沒有見着他，也沒有得到過他的書面指示。在中法協定簽訂之後，我回到重慶看見鄭介民（當時是軍令部第二廳長，主管國際情報），鄭告訴我說：開羅會議時，蔣介石曾與羅斯福商定，戰後的越南由中、美、英三國托管，決不交還法國。這個沒有公布的協議，杜聿明也聽到于右任從蔣的報告中談到。抗戰後期，蔣在廣西培養了一些越南的反動分子，希望他們回到越南作他的傀儡，特務頭子之一的鄭介民當然受了蔣的密令，干預這些工作。這些事實證明蔣介石確實有過某些安排。抗戰勝利後，羅斯福已經死了，蔣一心反蘇反共，要打內戰，宣傳“中國不從越南撤兵，蘇聯就不從東北撤兵”的謊言，以便對付主張駐兵越南、拒絕法殖民者返越南的國民黨軍人的要求，而不提開羅會議的秘密協議了。英殖民者也經常幫助法殖民者向蔣威脅。盧漢曾轉達蔣的談話說：“重慶英大使向他告密：法國準備若干軍艦、飛機、坦克、大炮向北越進攻，將中國軍隊趕出去；如果我們不撤退，被人趕走，反而丟臉。”這些內在和外在的原因都使蔣介石改變了從前的主張而決定將越南交還法國殖民者。

宋子文和他的行政院：宋子文當然貫徹蔣介石的意旨。在勝利後，宋親赴巴黎與法政府勾結，利用出賣中越人民的机会，又找到一個新的主子，例如把路基將近築好的成渝鐵路賣與法國資本家修築；全國解放後他不去美國而到巴黎，這也說明他已早有狡兔三窟的準備。宋子文的態度既是如此，其他如王世杰等人，對於促成國民党政權出賣越南人民的勾當更是特別賣力。一向奔走宋

家門庭的黃強(保定軍官曾留學法國),由宋子文特請蔣介石批准,派到第一方面軍司令部擔任第五處副處長(為他增加一名)。這個政客兼買辦的軍人,抗戰初期曾和我在越南共事幾年。我們對他很有戒心,重要的公事不敢給他看,怕他告訴法國人,聯合起來對付中國和越南。他公開地說:“中央與地方意見不一致,國際情勢又很複雜,宋院長已赴巴黎商討越南問題,大勢所趨,將以越南交回法國,而南越法軍已經登陸,英軍已將越南行政權交法人接管,越南人民的革命暴動,時有所聞。為中國計,為派遣軍計,最好的辦法,莫如接受日本投降繳械以後,即行撤退,對於法越問題不加干涉。”黃強確實代替宋子文做了一些工作。

陸軍總部和駐越各軍:陸軍總部的負責高級軍官和駐防越南的各軍將領如軍長萬保邦、曾澤生、盧濬泉、周福成等,都主張拒絕法殖民軍回越,培植親國民黨政權的越南黨派,而不肯雙手將越南送還法國殖民者。盧漢開始主張長期占領,中國托治,扶助越南人民獨立,以後由於實際情況的發展,他的意見也與大家一致了。

行政院駐越顧問團:重慶行政院派駐越南顧問團的代表,計為外交部凌其翰、軍政部邵百昌、財政部朱僊、經濟部莊智煥、交通部鄭方珩、糧食部馬燦榮。他們本應代表重慶的立場來執行任務,但到了越南以後,情況完全不同,不僅越南人民已經起來,即占領軍的態度也同他們相距很遠,因此這些人都改變了主張而與第一方面軍司令部漸趨一致。惟凌其翰同法國人早有直接來往,原來與法國殖民者比較密切,又是經辦中法外交的人員之一,有些傾向於法國方面。我曾經同他發生過好多次衝突。自然,這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是他所代表的反動的头子的主張。邵百昌接到陳誠指示說,只要國民黨軍隊迅速撤離越境,調回中國打內戰,一切可

以不管，甚至留在越南的中国物资也可以不要。后来国民党军队匆忙撤走，确实执行了蒋介石和陈誠的政策。

国民党中央所属各单位：国民党海外部代表邢森洲、三青团代表徐某、侨委处萧文、軍統王某等，都是些特务头目，来越南的目的是要扶植他們所培养起来的阮海臣、武鴻卿等反动分子建立反动政权。当他們看見大势已去，又經過何应欽的訓斥，就不得不同司令部采取一致的步調了。尽管如此，他們仍然橫行霸道，胡作非为。如某一天河內华侨在大剧院里开欢迎邢森洲的大会，竟至悬挂各国国旗，其中也有法国国旗在內。越南羣众看見了法旗，大动公憤，将剧院包围，势将用武（当时越南人民一般都帶有手榴弹和手枪）。經司令部派員指責这些特务們违犯司令部的命令，擅自悬挂法旗，惹起如此严重的局面，令他們立即将法旗扯下。适邢森洲由会场走出，反質問为何不可以悬挂法旗，經司令部所派人員严厉申斥，并将法旗扯下，越南羣众鼓掌欢呼，而外围的法人則佇視流泪，一場风波，才告結束。又如軍統王某未經司令部批准，擅自派人在順化附近逮捕汉奸嫌疑犯，經当地駐軍扣押。从此以后，这些特务就稍稍斂迹，不敢公然在外面肆行无忌了。

华侨：越南的华侨大多数是小本經營的商賈和少数开办小型工厂的厂主。他們同越南人民生活在一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另外一类华侨則充当法越間的中間人，担任法国資本家所办工商企业的买办。他們經濟生活比較优裕，但越南知識分子和有革命性的青年都有反对这类华侨的表示（我在胜利以前就听到过这类不滿言論）。华侨当中也有少数人尤其經濟較好的人，希望法殖民者仍然回来掌握越南的政权，因为这样对于他們比較有利。

（二）外国方面

日本：一九四〇年八月日寇进入越南后，曾經联合法殖民者压迫和剝削越南人民。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他們又玩弄新花样，解除法軍武装，組織越南傀儡政府，以保大为伪帝，宣布“安南帝国”“独立”。日寇同时又編組伪軍，企图借此反对人民，巩固占領，而其結果則反成了軍火輸送队，装备了越南的人民軍。日本向中、苏、美、英投降时，对于法軍并不承認自己是战敗者。在河內的日本官兵遇着中、美、英三国軍官（当地无苏軍来往），都首先向他們敬礼，而对法軍則仍存鄙視之意，傲然不理。

英国：英帝国政府全力支持法殖民者恢复越南的統治。英軍接受印度支那十六度以南的受降任务，九月初在西貢登陸后，就释放法国俘虏，重新装备法軍。于九月廿三日，法軍进攻越南共和国政府机关，占領西貢市，引起越法战争，蔓延到整个英軍受降地区。英帝国主义者并未滿足，不仅在重庆向蔣介石威胁，又派了八架飞机在十六度以北的順化附近土伦机場降落，对我国占領軍示威，当被我軍万保邦部扣留，我們故意要他們向重庆交涉，得到許可才准予释放。这一次教訓，使英軍以后不敢再向我們挑衅了。但英軍派駐河內的代表威尔逊中校，經常来司令部替法国人講話。一天他同我說：“中国方面过于偏向越人，对待法越間的糾紛沒有采取公平和有力的措施。”他举出海防附近的鴻基煤矿因越南工人罢工而生产停頓，希望司令部出面干涉，使越人复工。我答复他說：“这是法越間的劳資糾紛，应由他們自己合理地协商。”他說：“中国用武力逮捕几个人，或者枪毙罢工的首領就可以解决了。”我听了很不高兴，質問他說：“我曾經到过英国，你們英国的矿工罢工，是不是由政府枪毙几个工人来解决？”他直接了当地說：“这是殖民地，不能同英国比。”我很生气地答复他：“我們現在是

在一个独立国家里，不再是殖民地了，你要弄清楚。”他連忙認錯，并声明这不是代表他政府的意見，而是个人的意見，請求我原諒。以后这个英殖民主义者就不来同我糾纏了。但是法殖民者比他們的英国同路人，更要頑固、凶恶而愚蠢得多。当我们开始听到英国宣称允許印度、緬甸独立的消息后，我告訴了法軍司令薩兰。他坚决不信說：“这决不可能。”英国殖民強盜很狡猾阴險地玩弄和平手段，欺騙殖民地人民，却支持法国殖民者在越南使用武力，造成法越人民长期流血的慘剧。

美国：第一方面軍的司令部 and 所屬各軍，从軍部一直到連部都有美軍聯絡官。他們在司令部的头子是嘉礼克少将，他們对于中、越、法、英关系表面上采取一种中立态度，暗中却为法軍撑腰。

四、国民党軍抗击法軍强迫接防和法越协定的簽訂

一九四六年初，越南选举正在进行，中法积极談判交还越南的消息，传到河內。我考虑前途的危險，忧心如搗，遂向何应欽打了一个电报，主要内容是說：“越南正举行大选，改組胡志明政府，迫切要求援助，保障独立。法人由中法战争取得越南，日法合作，我国抗战曾受严重損害，万不可以区区經濟利益，尽忘前仇，弃友援敌，自拆藩篱。……今若竟訖法軍重回越土，越人失望之余，必将羣情憤激，以怨法者怨我，中越冲突，势难避免，虽欲安然撤軍，恐亦不能如愿。务恳俯念国軍安危，友邦存亡，准予保留三个軍駐越，协助越人防守，以免重陷历史复轍，遺子孙后世之患。”这个电报发出后，很快得到何应欽的复电，电文說：“电悉，已轉呈委座核示矣。”我的意見自然不可能阻止重庆反动政权出卖越南人民的勾当，但蔣介石得到我反映的情况，他也不能不考虑中越关系和安全

撤軍的問題。中法協定將要公布以前，重慶方面要我們協助胡志明主席同法方談判；至於蔣政權是否也曾要求過法國承認越南政府，那不得而知了。

一九四六年二月廿八日，中法協定在重慶簽字。這個協定的內容，雖然只涉及華僑的待遇、滇越鐵路和海防自由港等經濟問題，但重慶政權既已承認法殖民者繼續對越南的統治權，撤兵交防已屬必然之勢。當時指責重慶政府出賣越南的空氣弥漫河內，中越關係忽然趨於緊張。

第一方面軍司令部接到重慶軍令部通知說，中法交防已經談妥，交防日期自三月一日至十五日開始，三十一日完畢。交防地點從海防開始，次及河內，並許法軍於海防登陸前十二小時以飛機十二架運送武器，降落河內機場。重慶協議完全替法軍打算，事前未征求第一方面軍的意見，又未考慮中越複雜的情勢，反動集團只要將軍隊撤走，早日參加內戰，一切其他問題都不在他們的心目之中。

三月四日下午八時，在法軍代表薩蘭少將要求之下，在第一方面司令部召開中法軍事代表會議，討論接防日期，我方由參謀長馬瑛主持（盧漢在昆明），各有關軍事的負責人都被邀請參加；法方以薩蘭為首的陸海空軍代表也一齊到會，雙方參加的人數共達三十餘人。法方要求於三月六日在海防登陸，他們說這個日期是重慶中法參謀會議談妥的，並提出他們自己的法文證件。我們以未奉到重慶命令，又以法越談判尚未成功，不同意他們所提出的三月六日在海防登陸的要求。法方亦承認法越正在談判，未獲協議；他們說，如中國方面允許法軍接防，可以促進談判的速成。我們堅持法越談判簽字以前不允交防。雙方爭持不下，會議延長到第二天早上的三

时左右不能解决。法人显然要用武力接收越南，法越談判系一种欺騙手段。我們屢得西貢發來的情報說，法國人在西貢公開宣稱：“中國軍隊沒有坦克、大炮、飛機、軍艦，裝備很差，戰鬥力薄弱，決定集結遠東所有海陸空軍力量，將中國軍隊趕出北越。”我當時權衡局勢，不能不明確地向他們提出警告了。最後我發言說：“中國駐軍只能將防務交與法越聯合組織的部隊；法越談判沒有成功以前，我們不能許你們單方面接防。如你們強迫進軍，法越間發生衝突，中國的軍官和士兵肯定將站在越南方面同你們作戰。但是，我們目前是同盟國，不希望發生這種流血慘劇，請你們慎重考慮。”我發言後，大家都嚴肅起來了。一個法軍官居然同意我的看法，也說不希望發生這樣的情況。法國殖民者慣用拖延耍賴的手段，拉長會議時期，企圖使中國人失卻耐心，馬馬虎虎答應他們的要求。當時黃強和空軍代表某（廣東人）竟在會上說：“我們談了很久了，橫豎要交防的，早遲幾天也沒有多大關係。”參謀長馬瑛和副參謀長尹繼勛都是油滑而又無權力的人（司令部里的高級幕僚，除了我和黃強外，都是雲南系軍人，只對盧漢負責，一向不敢有任何主張），既不敢許法軍接防，又不敢下令要駐軍抵抗，開了一夜會，當然得不出一個決定，無結果而散。散會的時候，我聽到兩個法國軍官私下談話說：“糟了！來不及了！”我從這個語氣中知道他們已師行在途，不能停止，預料法軍必定向我軍挑釁，企圖打垮中國軍隊給越南人看。我回到寓所告訴六十軍軍長曾澤生（他同我住在一起）說：“中法軍事衝突無法避免。你全軍駐在海防（此時六十軍正集中海防，待船開赴東北），如法軍登陸，坐視不理，最後挨了打，被老蔣知道，說你在外國丟臉，還是逃不了處分。我們迎頭痛擊，先打他一頓，即使闖出禍來，但我們是奉盟軍總部命令來越受降，法軍未得許

可，強迫接防，將受到國際上的譴責，有這些重大理由，不怕老蔣不支持我們。”並且說：“這一切責任司令部和你我大家負擔，不要顧慮。”曾澤生完全贊成我的意見，立即乘小車赴海防布置（由河內到海防一小時可達）。當時海防和河內防務由五十三軍負擔，軍長周福成去重慶沒有回來，由副軍長趙鎮藩代理，他夜間參加了這場會議，也主張不許法軍接防。第二天早上，我同尹繼勛、趙鎮藩等到行政院顧問團辦公處報告夜間開會情形，大家一致反對交防，拒絕法軍登陸。但軍事上的任務首先落到五十三軍頭上，只有由他們自發地去執行了（朱懷受降日記說：司令部已同意交防，由於顧問團反對而改變；又說中央與地方軍關係，司令部下令六十軍守中立等語，都非事實。因六十軍系雲南軍，五十三軍系東北軍，當時海防河內沒有蔣系中央軍）。

三月六日上午八時，法軍不顧我方警告，竟派遣海陸軍在海防強迫登陸，受了五十三軍一百三十師的堅強反擊，遭到慘重的損失。據趙副軍長報告：法國艦隊於六日晨從海口開入海防內河，有六艘靠近海關碼頭，企圖強迫登陸。我軍鳴槍制止，法艦竟用大炮射擊，轟燃我方海關碼頭的彈藥倉庫。我軍以機槍還擊，未能制止法軍前進，乃在有效射程內用火箭筒向法艦發射，六發皆中，一艘焚燒沉沒，二艘受傷，當即懸掛白旗，全艦隊向下游退去。此後五十三軍一百三十師王理寰師長曾將海防事件經過親向第一方面軍司令部匯報，並在河內發行的中文報紙發表了書面報告。

海防戰鬥開始，越南人民奔走歡呼，支援中國軍隊的行動；法國殖民者眼看沒有別的出路，只好趕快進行法越談判。

三月六日下午四時，越、法代表在河內東方匯理銀行簽定法越初步協定。中國方面派陳修和少將，美國派伯克利少校，英國派威

尔逊中校等参加了签字仪式。根据法越初步协定，越南政府和法軍組織參謀會議，成立聯絡处。凡屬接管中国駐軍的防务，都由法越双方会同办理，这是中法軍事會議上我們要求的最重要的条件，法国殖民者被迫执行了。海防港外停留在軍艦上的法軍，在法越协定签字后，我們即允許他們在海防登岸，指定地区駐扎；接防日期另由中越法三方商定。三月十八日，法軍开入河內，以后陸續交防，延迟到四月內才告完毕。五月，国民党軍完全撤出越南。

一九六〇年六月七日于北京

荣家經營紡織和制粉企业六十年概述

李 国 偉

一

我从事于紡織和制粉工业,到今天已有四十年的历史。我开始参加荣家在汉口所办的福新企业組織,是在一九一八年。我原在唐山工学院学土木工程,毕业后,到隴海鐵路任徐州分段的副工程师,后調隴海总工程师局設計工程司。那时第一次欧战告終,英美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了远东市場,还没有捲土重来。日帝乘战事机会,蓄意攫取东方霸权,而限于国力和机器設備的生产赶不上它国内的需求,一时还不能高速拓展。这样,就为中国民族工业創造了有利的条件,我国国内很多紡織和制粉工厂都是在这个时期創立的。无錫荣宗敬、德生先生兄弟在上海和无錫从事紡織和制粉事业,到那时已有将近二十年的历史,正在逐步向高峯发展:紡織工业方面,上海有申新一厂和二厂,还有第三厂設在无錫;制粉工业方面,上海已有福新一厂至四厂;此外,茂新还有三个厂,分設在无錫。荣家企业的輪廓,已大体形成,基础亦漸趋稳固。

汉口为长江中游汉水、湘江流域和豫省漯河以南等地区粮食的集中地,每年約有三四百万担的小麦在那里集中。那时荣家的事业还没有推广到汉口,当地有金龙、和丰、裕隆三家面粉厂,每日

生产能力約为一万一二千包(每包四十九磅);每年尚有二百余万担的小麦运往长江下游,供应蕪湖、南京、鎮江、无錫、上海等地的面粉厂。因此,在汉口設厂不愁原料缺乏,福新五厂就是以这个有利条件为基础而从事計劃設立的。这厂自一九一八年秋天开始筹备,到一九一九年十月全部完成,开工出粉,每日产量为六千包,此后逐渐加增为一万二千包。汉口申新四厂是一九二一年四月开始筹备的,其創設动机,原是为了供应福新粉厂袋布需要,求取自給自足,到一九二二年二月开工,最初裝置紗錠一万四千七百余枚,其后陸續增添設備,到对日抗战前夕,共有紗錠五万枚、布机一千台和日产二千匹的漂染整理机器全套。

在旧时代从事企业的人,对于用人方面,总是尽量采取保守态度,不是素所深知的人,不肯輕于託付重任,因此往往容易形成非亲即友的局面,从而也难于吸取社会上一般的人才;荣家資本集团自然也不能例外。荣德生先生在他的“乐农自訂行年紀事”里面,似乎以“昔年老友,都为經理”而感到自豪,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荣家企业里面上层組織,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面的。我是德生先生的长婿,所以在他和宗敬先生的敦劝和支持下,我放弃了我鉄路工程师的地位,改行来办理工厂。我开始参加荣家的企业,是做汉口福新第五面粉公司的协理兼总工程师,后来申新四厂开办,我兼管两厂。那时任两厂經理的柴月泉先生,是宗敬、德生先生的族兄,其后他年老退休,我繼任两厂的經理。

我是学土木工程的,对于紡織和制粉工业原是外行,而我从开始参加企业,所接受的任务,便是負責全部工程和装机計劃;两厂开工之后,工务推进,也由我負領導的責任。我只好摸索前进,虽然后来得到一些知識和經驗,但是走的弯路也很多。有些同事批

評我，說是“拆拆裝裝，枉費許多人力物力”，我是應該竭誠接受的。工廠創辦初期，還是沿襲着工頭和粉師的陳舊制度，機器運轉和工人進退由其把持，工人羣眾受着雙重的剝削，封建把頭的聲勢和氣焰，更是日甚一日。廠方主持人包括我自己在內，既沒有勇氣也沒有力量來徹底鏟除這個根深蒂固的封建把頭惡勢力，有時還利用這種惡勢力，與它勾結着，來加強對於職工羣眾的剝削。在這些地方，無可掩飾地暴露出民族資產階級的两面性中丑惡的一面。其後由於產量日落，無法與外界競爭，而從剝削方面來講，工頭和資本主之間，也根本存在着利害的衝突。以此，我們逐漸使用專科畢業生來管理車間，革除了工頭制度，提高了生產，機器保全也獲得了相當的保障。

我們漢口的申新四廠、福新五廠自抗戰內遷，申新擴建為漢口、寶雞、重慶、成都各廠，共四個廠，附有寶雞的一個鐵工廠；福新擴展為漢口、寶雞、重慶、天水、廣州各廠，共五個廠；又從而推廣附屬企業，在成都、上海辦了兩個建成面粉廠，在寶雞、上海辦了兩個宏文造紙廠，在重慶標買了國民黨政府的軍紡廠（原是漢口日商泰安紡織廠的機器），改名為渝新紡織廠。

關於茂、福、申新各廠的發展過程，主管機關已在匯編歷史資料，從事說明社會經濟的演變過程，我今不再作冗長的敘述。

二

為了利害的正面衝突，由於生存競爭的關係，民族資產階級自始以來，對於封建勢力、外國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隨時隨地作着不斷的鬥爭，而由於妥協性和自私自利的企圖在支配着，又隨時隨地和這三種勢力敷衍拉攏，發生不即不離的關係。我從事企業

四十年,其中在解放前的三十年,就是在这个环境中挣扎着度过来的。而追溯以前荣宗敬、德生先生开始创业,以迄荣家资本集团的形成,其间盛衰变化虽年有不同,而一息脱离不了这三大敌人的魔影跟踪。即使没有全国解放,我们的企业早晚必落入他们魔掌之中而无可倖免。我今概括地叙述我对于茂、福、申新企业在解放前五十年来悠长过程中一些突出的回忆。

荣宗敬、德生先生从事于制粉事业,远在一九〇〇年。他们兄弟原来经营钱庄,获有盈余,因见办厂利厚,集资三万九千两,在无錫创设保兴面粉厂,荣氏兄弟各入股三千两,至一九〇二年开工出粉。从那时开始,就受到地方封建势力的阻挠和摧残。保兴兴建厂房时,所谓地方绅士以破坏风水为理由,提出诉讼,几经奔走疏通,方得平息。外国厂家和买办阶级在机器供给和技术方面,又多方留难,百般要挟。封建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的磨难,在荣家企业方始萌芽的时代,就已经形影不离,跟踪而来了。其后保兴于一九〇三年拆股,成立茂新。到一九〇五年又集资三十万元,创办振新纱厂,荣氏兄弟各入股三万元,这是他们从事纺织工业的开端。振新建厂之初,也曾受到无錫当地封建势力的阻挠,借故兴讼,旋经和解了案。那时为清光绪三十二年,即公元一九〇六年,各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将货物运来中国倾销,统计全年全国进口棉布值银一亿一千五百余万两,为过去未有的高额。此后一年,即公元一九〇七年,全年洋粉进口增至四百五十万担,值银一千四百万两。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清朝政权昏庸无能,已为帝国主义国家所看透。经过甲午中日之战和辛丑辱国条约的订立,中国藩篱尽撤,由他们为所欲为。再加上一八九五年中日马关条约订立,准许外人在中国通商口岸从事“工艺制造”以后,英商老公茂、怡和、美商鸿源、德商瑞

記各紡織廠先後在上海設立。至一九〇二年，日商在滬收買泰興紗廠，改名上海紡織第一廠。外國紡織資本大量侵入中國，喧賓奪主，中國商人沒有任何後盾，反處處居于挨打的地位，遭其宰割，而無可如何。柴氏企業的誕生，正趕上這個不幸的時代。

其後清朝統治政權顛覆，中華民國成立，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篡取了政權，國家積弱如故，當局的媚外賣國也和清朝沒有多大的區別。日商在滬設立了內外棉紗廠，進口紗支布匹同時源源而來，進一步壟斷着中國紗布市場，中國廠家處境更是艱難。而制粉工業方面，雖有外粉進口，但壓力比較輕鬆，故柴氏兄弟從這方面進取，於一九一二年又集資四萬元創設福新第一廠於上海，日出粉一千二百包；一九一三年設福新第二廠，產量為四千三百包，一九一四年設第三廠，一九一五年又設第四廠。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美帝國主義暫時退出了中國的市場，我國工業生產獲得空前發展，面粉產量由輸入國一躍而為輸出國，紗布市場亦漸見供不應求。那年無錫振新紗廠拆股，宗敬、德生先生退出，在上海周家橋創設申新第一廠，裝英機一萬二千錠，日出紗三十餘件。從此年起，紗、粉各廠連年有餘，即以盈餘投入再生產。其後申新发展到九個廠，紗錠五十三萬八千餘錠、布機五千餘台，全廠職員八百六十餘人，工人三萬一千餘人，年產紗三十餘萬件，布二百萬匹；福新发展至八個廠，茂新发展至四個廠，年生產能力為三千五百万包至四千万包。

三

民族工業在封建勢力和外國帝國主義的威脅壓迫下，經常是處在多災多難的氣氛裡面。民族資本家設廠的動機，主要是為了

想賺大錢，而历年外貨的傾銷和外国在华工厂的競爭，使中国厂家无法喘息。为了掙扎图存，中国厂家不能不从各方面寻求出路，保本求利，因此，增加工人劳动強度自然成为各厂一致的政策。振新开办时，机器新（振新在当时国内紗厂中，是第一个用透平发电机，将单独电动机拖帶紗机的），用人少，产量高，工資低，德生先生在他的“行年紀事”里面特別指出，表示乐观。在攫取劳动剩余价值、增加私人利潤而外，各厂还是各有各的手法。宗敬先生时常对我们說，“茂、福、申新各厂得力于：造厂力求其快，設備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錢做三文錢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場，庶几其能成功。”我那时最佩服宗敬先生的話，当我们汉口厂开办时，我还曾在紗厂日夜两班清（花）、粗（紗）、精（紡）、搖（紗）四部，分別用“和、衷、共、濟、力、求、进、步”八个字来做班名，表示拥护宗敬先生的經營作风。德生先生更有他独到的見解，他时常自詡說，他經營事业，得力在于选择原料。茂、福两厂从不收进次麦，汉口小麦搀混石砂，他經常雇人拣择，逐粒剔出，所产兵船牌和牡丹牌面粉，牌子常在其他各厂之上。記得有一年雨量特多，他偶然出外巡視，見多数倉庫外墙泛潮，墙脚水痕有时高至一二尺。他就联想到因天时关系，倉庫潮麦必多，便馬上通知各庄收麦人員特別注意不收潮麦、坏麦。結果那年无錫各粉厂都受到烂麦影响，产品減色，独有茂新的兵船粉品質优良，从此做出牌子，和阜丰的車牌并駕，售價也相等了。辛亥无錫光复后，市面呆滯，各厂都不敢放手进貨，有一大批川麦銷售不出，貨主急于回川，愿将貨留交茂新磨粉售出，再行归还貨价。茂新得此周轉，頗获其益。这又是善于利用机会所得到的成果。后来茂、福、申新的局面越搞越

大,都是本于这种精神,而几次陷入危机,濒于破产,也未始不由于此。

对于紗厂用棉方面,也是各有各的窍门。紗厂以前用两种棉花:一为土棉,统称粗絨,纤维粗而硬,自然撚度少,但是颜色白,相传它的花朵是向下的,天雨时花的托盘不积水,所以不会发黄;一为洋种,统称细絨,纤维细而软,自然撚度多,但是颜色白中带黄。那时为求紗支洁白,便利竞销关系,厂家都用粗细絨配合拼紡,销售员又时常以紗支黄了难销为言。我们汉口厂装的是美国薩克劳威尔机,对于粗细混紡不甚相宜,生活异常难做,产量极低,十六支紗每日总在一磅以下。往常粗细搭配比例,总是对搭,有时四六搭配。我在一九二四年黄梅季节时,因生活难做,减低使用粗絨,但是减低到一比九时,生活虽稍为好做,而产量仍不能超过一磅。我记得很清楚,那年端午节后,配花就不用粗絨,纯用细絨,两日后,十六支紗产量就突然跃进到一点二磅。我从此以后,也就不顾营业处的批评,全用细絨紡十六支紗,因之出数大增,每件工繳大见减轻,而紗支强度又自七十余磅增到一百二三十磅。我体验出粗絨与细絨合紡所以不能有良果,是因为自然撚度不同,而软硬又各异,勉强拼在一起,互相缠撚,是和物质性能有抵触的,因之生产低落,紗支强度不能达到标准。后来申新汉口厂的棉紗极受各方欢迎,尤其是布厂用作经紗以后,增加了布的强度,又减少了废紗,因之减少每匹布的用紗量。还有申新汉口厂所出十二磅细布不及裕华,我们经过多方研究,将每方吋经纬紗各减少十根,另出一种轻质布,售价减低十分之三强,结果销路大畅,反超出裕华之上。这都是在资本主义经营时代所采取的策略,虽卑卑不足道,而在封建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钩心斗角,挣扎求存,在当时也很

是費了一番心力的。

四

我們漢口申新廠在經營初期，還受到過一次嚴重的經濟打擊，幾乎遭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吞噬。由於花貴紗賤，申新漢口廠自開創以來，就受着市面不景氣的影響，無日不在困苦掙扎之中。可是我們漢口廠具備着一個優越的經濟條件，即是和福新漢口廠在同一領導之下推進業務，資金來源絕大部分同是榮家產業資本。福新年年有利，申新依賴福新財力常年挹注，雖在事業虧累之中，仍不斷擴充生產設備，對外亦以福新關係，周轉靈活。但是這樣下去，資產負債不可能平衡，而且情況日趨嚴重，福新一些保守派股東和漢口廠少數高級職員認為照此局勢，福新五廠早晚要被申四拖垮。他們就向上海總公司建議將申新四廠出賣，專辦福新。那時日本帝國主義正在加強對中國的侵略，紗布削價傾銷，同時到漢口開設泰安紗廠，雖然只有二萬多錠的規模，而成為日貨向內地深入傾銷的橋頭堡壘，操縱着華中的紗布市場。他們的紗廠，廠址與申新毗連，同在礄口，見到有機可乘，四出活動，圖謀買進。申新多數職工覺悟到這不僅是一廠一業的問題，而是關係着整個民族工業前途的問題，堅決反對此項出賣民族利益的提議，推出代表到上海向宗敬先生陳說利害。結果此議總算沒有成為事實。

對付反動官僚和逃避官僚資本的吞噬，也是一樁煞費心神的事。官僚們看到工廠有錢，總想來個黃雀在後，不勞而獲。這情況，在北洋軍閥時代比較容易應付。他們的辦法也比較簡單，一般是將各廠、各銀行的主持人請去開會，卻關上大門講斤頭，不滿所欲，不訖出來。如果事先看出苗頭，可以託故不去，也可硬挺軟磨，

討价还价。北洋軍閥政府頗復后，蔣介石背叛革命，成立了南京國民政府，一貫地不惜犧牲人民利益，獻媚外國帝國主義。中國人民在雙重壓迫之下，更是陷入水深火熱的境地。我常駐漢口，對於上海茂、福、申新總公司的事，雖然不大過問，而其間很有一些突出的事，至今尚在我的記憶之中。

我回想到一九二七年蔣幫勢力達到長江下游的時候，上海方面由虞洽卿發起，號召各業捐款給國民黨政權，表示擁戴。榮宗敬先生意有不願，以為華廠獨負此捐，將使更不能與外廠競爭，因之應允稍遲。這樣，就招致蔣幫不滿，聲言要查封榮氏家產，而宗敬先生住在租界，無法下手，乃囑使無錫縣府派人持封條前往榮巷，將宗敬、德生先生住宅封門。經再三關說，留出德生先生一部分未封，僅封了東面宗敬先生家屬居住部分。後來託人疏通，還是化了一些錢，才將事情緩和下來。

我還記得，當年國民黨政府裁撤厘金，施行統稅，按照稅則規定，大大的便利了外國在華廠家，卻增加了中國廠商的稅負。申漢紗廠有人向國民黨財政部長孔祥熙申述企業的困難，說明新稅則的施行將進一步造成中外廠家生產成本的懸殊，希望政府加以考慮。孔不問情由，開口便罵紗廠搗蛋，說：“有困難，你們為什麼不想法子克服？成本高了，你們為什麼不讓它降低？”這一番出乎人情之外的言詞，使對方無言而退，稅則就此實行了。

五

還有一九三四年國民黨政府怎樣對待申新的經濟危機，更是一個顯明的事例。由於過分追求發展，榮家企業一貫地舉辦利債來從事基建，擴大再生產，所以經常陷在高利貸的拖累之中，經濟基礎

是不稳固的,遇到金融有变动,或是市场不景气,便首先感到捉襟见肘,周转为难。自茂新、振新创业以来,遇到的经济危机,不止一次:第一次在一九〇八年,因为宗敬先生在上海做面粉失败,牵动了他所办的广生钱庄的资本,各行庄不肯放款,以致开支无着。第二次在一九一二年,振新原棉告竭,各往来户无法再借,召集董事会请各董事垫款,各董事不应,以致新年不能开工。这两次风险,所差不过一二万元,通过情面关系,再拿出一些田单契据,都勉强渡过了难关。第三次是在一九二一年,那时茂、福、申新系统已发展到茂新一至四厂,福新一至八厂,申新一至四厂,所欠债务在三百万元以上,结果还是在信用上取得了办法,未至摊牌。德生先生在他的“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上说:“借款成功,人人安心,喜形于色”,足见当时紧张的状况。

第四次经济危机的发生,是在一九三四年,当时我曾为这事被召到上海,参加集会商榷。自一九三一年下半年起,中国棉纺织工业开始陷入逆境,一九三二年情况更趋严重,但在这一年中,申新系统营业仍获得盈利,茂、福、申新各厂全年纯利共达到四百万元以上。在一九三一年秋初,天津、河北一带和长江流域洪水为灾,农田大部浸没,非但当年秋收无着,而且因为积水不易疏洩,冬耕未能及时从事,以致一九三二年春收亦大为减少;春耕因缺乏种籽,未能普遍播种,又从而影响秋收。农村三度歉收,食粮尚感极度不给,更未遑添补衣着。同时,沿江沿海城市因洋米、洋麦低价倾销,国民党政府不顾民命,勾结美帝,以重筑堤防为由,借进大量美麦,但是不运入灾区为工赈口粮,而在市场变价出卖,国内粮价被压低过甚,以致农民巢一石谷,尚不能做一套衣服。因之,到一九三三年,棉纱销路滞极,价格跌至民国元年以下的水平。申新更紧,

調款为难，九月底开期，各行庄无一肯轉，后見申新九厂开出，情况尚佳，才允轉三个月。至一九三四年，不但紡織业遭到空前的灾难，面粉业也同时受着世界資本主义傾銷的影响而无法周轉，更加以美帝实行购买白銀案，上海現銀存底被抽去三分之一，以致百物狂跌，市况萧条。挨到那年三月，中国、上海两銀行不肯再做借款，十六家往来錢庄亦坚决收回不放。六月底到期，应付款达五百万元，沒有头寸应付。当时託宋汉章居間，商得张公权同意，由中国、上海两銀行及十三家錢庄接受所謂“产余担保押款”五百万元，以为可以渡过这次风险。不料此項借款付至七月初，約支出了二百八十万元的时候，中国、上海两行忽然停付，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擱淺局面。

那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是汪精卫，陈公博做实业部长，派工业司长刘蔭荂等会同財部及全国經委会派員到沪調查。照陈公博的說法，申新負債已达六千三百余万元，資不抵債，其无担保的債務达一千余万元，榮先生信用已失，若仍以榮氏为中心，无法維持。因此，他就以此作为理由，向行政院提議“由政府召集債权人組織临时管理委員會，經營該公司現有九厂，至多以六个月为限，六个月后，依整理所得結果，再定具体办法”。当时宗敬先生已辞去總經理职务，由王禹卿先生代理，紡織部事宜由李升伯先生代理；事业擱了淺，王登报声明辞职，李也登了“不就申新紡織部职务”的启事，名义上和实际上總經理仍为榮宗敬先生。

陈公博所謂“整理”，究竟包含些什么內容，无法推測；有人說后面还有宋子文的发縱指示，企图乘危吞噬榮家企业。我們不了解在那个时期宋子文和汪、陈之間是个什么关系，不能加以什么按語，不过当时傳說很盛，說是要收归国营，无錫紡織厂联合会曾有代电

致行政院和財、實两部反对申新收归国营的事，并对于实业部所作“估計”表示異議，举出以申新九厂为例，該厂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完成，計有厂基六十余亩，依照工部局估价，每亩地价二万五千元，厂房造价二百二十万元，現有紗錠八万枚、綫錠一万五千枚、布机五百台，按照現市最廉价值，須在八百万元以上，而实业部及棉統会調查結果，仅估四百余万元；又如其他数厂，每錠购价至少須在三十元以上，而只估十七元，詎为駭人听闻。无錫申新三厂亦同样向国民党政府具文申明，并說申新三厂并未亏累，无用整理，指摘国民党政府以維持为名，行摧殘之实。此案結果，由行政院做出決議，說是“目前該厂虽稍有困难，然既由荣氏本人大加整理，此后如有需要政府予以协助，自当格外設法，以資維持”；对于陈公博提出的整理計劃，也就从此不再提起。

六

申新經過擱淺风涛之后，虽在尽力从事内部改进，而經濟基础根本动摇，維持更极艰苦，到第二年，即一九三五年春間，又遭遇到英商汇丰銀行拍卖申新七厂的事件，这又是外国帝国主义阴谋乘危吞併中国民族企业的一个典型事例。其先，申新在一九二九年购入英商东方紗厂为申新七厂时，即以二百万元押入英商汇丰銀行，年息八厘，期限六年，到一九三五年二月限期屆滿。一九三四年六月，申新与中国、上海两銀行及十三家錢庄成立产余担保押款时，也将申新七厂計入在內，而汇丰亦曾予以承認，因此申新七厂本身作了两次借款的抵押对象。汇丰押款到期，申新当然无法履行債務，汇丰以債权人的資格，不經過法律手續，即委託英商魯意斯摩洋行定期公开拍卖。中国、上海两行見到拍卖公告，不能同意，也根

据本身債权关系,呈請江苏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將該厂作为假扣押,并布告不准出卖。外国帝国主义商人对于国民党政权久已視同无物,不顧一切,坚令魯意斯摩仍于是年二月二十六日实行拍卖,并串出日本岡本、村上两律师作为代表日本某商业会社以二百二十五万元的最低价拍去。这一事件发表后,上海各界非常震动。各报社論,一致譴責汇丰非法行为,各社会团体激起公憤,热烈声援。申新七厂全体四千六百余工人更是裹裹烈烈地动員起来,奋勇护厂,严厉督促国民党政权对于汇丰此种摧殘中国实业、侵害中国法权的行爲速予有效制止。国民党政府迫于羣众的坚强意志,派实业部长到上海去向汇丰磋商,拖延了很长的时期,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由宗敬先生与汇丰銀行簽訂合同,將抵押借款二百万元延至一九四〇年底偿还,并将年息八厘改为七厘,并由申新于一九三七年付出利息十二万元,申七拍卖,未予执行,此事算告一段落。实际到一九三五年下半年,由于世界局势的轉变和内地农产的連年丰收,事业已有复苏气象。到一九三六年,申新各厂都已获得了稳定的盈余,汇丰債務也就順利清偿。这件事在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賬上不过添了小小的一笔,而阴谋吞噬的凶恶印象,长留在我們記憶之中,我故举出,做一个典型的事例。

七

抗战八年之中,外国帝国主义退出了中国商場的竞争,紗粉工业为后方衣食所需,我們内迁各厂利用机会,都获得了一定的进展。我一心从事于后方各厂的经营,与申、汉陷区脱卻联系,在这个时期之中,为了取得经营便利,并保持战时額外利潤,通过迁川和迁陝工厂联合会,与国民党政权和各级官僚斗争的事例較少,而轉入

于拉攏敷衍，以求相安無事。抗戰勝利之後，美麥美棉充斥市場，在我國大量傾銷。我們的面粉廠、棉紡廠受到擠軋，至不能喘氣，力量薄弱的，不能免于虧本歇業。如蕪湖的益新面粉廠，因不能開工而租給福新五廠經營，福新五廠亦因無利可得，反遭虧損，未及二年，即退租不做。美棉輸入後，排擠了國棉的銷場，壓低了棉花的價格，以致農民減產棉花，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我國棉花的年產量低至一千萬担以下，大大的減少了農民的收入，影響到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我們從事復廠，在抗戰將近結束的時期，向英美訂購了很多戰後交貨的機器，交付了鉅額的定金。戰事結束後，各國對機器的需要增多，供不應求，英美帝國主義廠家一貫地移花接木，將造成現貨另自高價售出，而對於定貨合約延不履行，所有交貨延遲期間，原料物料增價以及工資上升、甚至罷工風潮等一切與買主無關的因素，都片面地將損失轉嫁到貨價之內，使我們計劃失去平衡，無法推進，复工無期，受到嚴重的損失。

抗戰時期，我們受到的損失非常巨大。申新系統，以申新一廠和八廠為最慘，其中申新八廠全部被炸毀，申新一廠北工場、布廠、辦公室、工人宿舍、飯廳、貨棧、物料間等幾乎全部炸平，受傷工人三百五十餘人，被炸身亡的有七十餘人；而滬東的五、六、七廠損失亦極慘重。無錫三廠有紗錠七萬餘枚，為蘇南最大工廠之一，被日寇用硫磺、火藥、柴油焚燒，除了鋼筋水泥的一座廠房之外，幾乎全部被毀。各廠都長期停着工，其中申新七廠停工達到八年之久。面粉廠中，茂新一、三兩廠亦全部被毀。我所主持的申新四廠、福新五廠部分，申新四廠損失了一千瓩透平發電機和相配合的鍋爐大部分、紡棉機二萬錠全套、布機五百餘台、漂染整理機全套；福

新五厂损失了制粉机九千包的全套、第一工場五层楼的全部地板和相配的电动机共八百多匹馬力，其他房屋机器被拆毀损伤的还不在于內。按照国民党政府的甘美諾言，說是一切損失可以通过“盟軍总部”向日本索償。抗战胜利后，我們汇集人証物証，填好表册，列出清册，提請办理，卻种种挑剔，提出一些不可能的条件，如要我們說出被劫机器現在日本何地存放及提供拆迁机关部队条据等，硬說我們的手續与規定不合，又拿出一大批英文中文表格，要我們重填。我們填好送去时，看出官方不負責任，請求由厂方派員赴日帮同根查，他們又說此案盟总調查，尙无眉目，暫緩派員。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經濟部、外交部、工商部四五个机关，輾轉行文，彼此推諉，拖了两年之久，結果还是不了了之。

恶性通貨膨胀后期，物价升騰，一日千倍，国民党政权倒行逆施，橫征暴斂，不顧一切，各企业无不陷入于崩潰的境地，无計求存。要不是全国解放，挽救了这个万劫难回的局面，中国民族工业是不会有昭苏之望的。

国民党政府法币的崩潰

資 耀 華

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开始发行的不兌換紙幣——法幣，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資本集团用来对人民进行殘酷掠夺的主要手段之一。当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前夕，法幣发行总额还只有十四亿元；在八年抗战期間，四大家族打着抗日的招牌，利用法幣来进一步垄断全国經濟，搜刮人民財富，因而通貨不断膨胀，到了日本投降前夜，法幣发行額即已达五千亿元。一九四六年三月，蔣介石撕毀停战协定，发动反共战争以后，随着国民党軍事危机的日益严重，經濟危机也日益加剧，到一九四七年四月，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內，法幣发行額即陡增至十六万亿元以上；最后到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以金圓券代替法幣的当时，法幣发行額竟达到六百六十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額的四十七万倍，而物价則較抗战前上涨三千四百九十二万倍。

国民党政府在一九四六年初，除了接收了大量的敌伪财产之外，它的金融垄断組織——中央銀行还握有九亿美元的外汇和五十余万条（即五百余万两）的黄金庫存，此外还有美国援助的数十亿美元的物資。但是这一笔偌大的家当很快地便被蔣介石在反共战争中消耗掉了。同时，蔣介石为了进行內战，采用橫征暴斂、滥发紙幣、抬高物价的种种手段对人民进行极其殘酷的經濟掠夺。在

这种情况之下，經濟危机自然无法避免，而法币一泻千里，不可收拾，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

如上所述，蒋介石发动反共战争，是法币崩溃的根本原因。但是，四大家族利用职权，上下其手，相互之间，勾心斗角，特别是当时掌握国民党政府财政金融大权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勾结英美垄断资本，利用外力，操纵金融，也是加速法币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我从这一个角度，就当时见闻所及，对这一事件提供一些内幕情况。

一、宋子文勾结杨格开放外汇市场

在国民党的金融垄断组织的所谓四大银行之中，中央银行是“国家银行”，从成立时起就一直是由孔祥熙、宋子文轮流把持，中国银行也一直为孔、宋所控制；CC 派因只能操纵交通、农民两行，有所不甘，总想找机会把孔、宋排挤下台，把四行完全控制在手。一九四五年，CC 派趁孔出国赴美，在重庆发动第一次黄金大疑案，拘捕了孔系的郭景琨和高秉坊，并以宣告死刑相威胁。孔闻讯，急由美赶回，声言不长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这个疑案就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孔下台后，CC 派推俞鸿钧继任中央银行总裁，该行要职悉为 CC 派分子所把持。但到一九四六年初，宋子文勾结美籍顾问杨格，宣称可以获得美国借款二十亿金元，因而得任行政院长。宋上台后，即以他的私人亲属担任中央银行总裁，所有该行要职又都为宋派所占据。CC 派在“二十亿美元借款”的声势之下，只好隐忍退却，从暗中同宋争夺外汇和黄金。

宋子文当时能够上台，是利用杨格所开的二十亿美元大借款的空头支票；而杨格为了满足美籍商人的要求，极力主张开放外汇

市場。所以宋一上台，即執行楊格的意旨，由行政院正式頒布“開放外匯市場案”、“中央銀行管理外匯暫行辦法”及“進出口貿易暫行辦法”。這三大法案的主要內容是：

一、劃分進口物品為三類：甲、自由進口類，即可以自由購買輸入的物品；乙、許可進口類，即申請許可後方能輸入的物品；丙、禁止進口類，即不准輸入的物品。實際上，國民黨政府為了討好美國主子，對美商進口貨物幾乎沒有任何限制。

二、由中央銀行指定若干銀行買賣外匯。因為那時主要的外匯是美元，實際上是由美商銀行把持外匯買賣。

三、中央銀行可以斟酌市面情形，隨時買賣黃金、外匯來平衡市價。實際上，這是為了便於當權者上下其手。

根據以上辦法，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中央銀行實行開放外匯市場，美元匯價正式招牌為二〇二〇元（即美金一元等於法幣二千〇二十元）。對於外匯的審核及申請辦法，依然沿用抗戰前由英籍顧問李滋羅斯等所擬訂的中英平衡基金委員會的一套制度，不過當時由英籍顧問把持，現在改由美籍顧問操縱而已。

中央銀行隨又制訂了“黃金買賣細則”，即：（一）每晨九時由各金號及銀樓到中央銀行申請購買黃金，十時，由中央銀行根據供求情況公布金價，並按市面情況配給黃金；（二）中央銀行暗中特別委託几家指定的金號隨時拋售黃金，以避免該行直接在市場上出面拋售。其實是掩耳盜鈴，是為了更便於他們自己上下其手，搶購黃金。

外匯市場開放後，一方面由於蔣政權宣傳假和談，一方面由於中央銀行放出大量外匯，中央信託局處理大量敵偽產業，同時中國紡織公司拋出大量紗布，使舊法幣大量回籠，因此從一九四六年三月到七月，金、鈔、糧、棉市場，在表面上波動尚不甚大，有如下表：

| 市 價 月 別 | 項 目 | 黃金(十兩) | 美鈔(元) | 白米(一担) | 棉紗(廿支一包) |
|------------|-----|--------|---------|----------|-------------|
| 三 月 | | 156 萬元 | 2,001 元 | 26,900 元 | 1,095,000 元 |
| 四 月 | | 155 萬元 | 2,061 元 | 34,500 元 | 1,107,000 元 |
| 五 月 | | 176 萬元 | 2,332 元 | 52,000 元 | 1,260,000 元 |
| 六 月 | | 189 萬元 | 2,588 元 | 57,000 元 | 1,373,000 元 |
| 七 月 | | 183 萬元 | 2,577 元 | 57,000 元 | 1,347,000 元 |
| 上 漲 率 | | 20% | 25% | 105% | 30% |

据上表所举,当时物价市場表面上除白米价格上涨較高外,其他不过上涨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似乎法币可望穩定。但一看对外貿易,就知已成死症,不可救药。因当时宋子文的对外貿易政策,純系討好美国主子,进口貿易为美商垄断,美貨进口毫无限制,出口則无力恢复。所以一九四六年三月以后,每月入超多达一千一百亿元,少亦达八百亿元,到一九四七年,每月入超达三千亿到五千余亿元。外汇損失鉅大,有如无底之洞,其中进口貨品主要为美棉、汽油、煤油、化学用品、紙張及各种奢侈品,美貨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有的为美貨所独占,甚至有不經過任何合法手續而进口的美貨。所以当时只要有美国貨輪进口,市場黃金美鈔就有一度高漲,因为这些进口美貨不是用美金外汇結汇而是在市場鈔购黃金美鈔来抵偿貸款的。

这样,美籍顧問討好美商的目的可算达到了,但是宋子文所幻想的二十亿美元大借款,却同画餅充飢。一方面外汇大量損失,一方面外汇头寸日見減少,汇价当然很难維持。原来当时宋子文維持汇价的手段只有三条,即第一是美元大借款,第二是严格限制进

口，第三是变更外汇官价。后来他知道美援大借款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毫无希望，而限制进口，更怕得罪美国主子。例如宋子文曾經一度主张限止美国小汽車进口，就因美国商人的抗議而作罢。同时，一批美国影片商人反无理要求貼补过去在重庆、昆明积存的租片巨額外汇（实际上他們在重庆、昆明早已买好美鈔作抵了），并声称如不按牌价結汇，就要鬧到华盛頓去。宋子文只有唯命是听，平白地供給了大量外汇。因此外汇头寸更是捉襟見肘，外汇官价更难維持。到了这样山穷水尽之时，宋子文所剩下的只有第三条路（变更汇价）可走了。但外汇行市，即使有充分准备，如輕易变动，也必然引起波浪，无准备而輕易变动，就等于大海决堤，汇价更难維持。

可是美籍顧問楊格又別有用心，极力主张变更汇价，調高汇率。还有美国在华农业顧問团也越俎代庖，公开指責中国外汇汇率不当，主张立即变动。他們一吹一唱，无非是一方面借以傾銷美帝剩余物資，一方面又便于美商吸收中国廉价原料。宋子文到了这个时候，还希望美元借款，不敢有违美籍顧問意旨和得罪美商，終于在同年八月十七日（星期六）下午乘市場各业休息之机，宣布汇率从二〇二〇元調高为三三五〇元（即美金一元等于法币三千三百五十元，調高百分之六十五），同时宣称繼續运用黄金来稳定国内币值。这时宋子文已被美籍顧問赶进了死胡同，毫无出路了。

二、限制进口法案遭到美帝反对

汇率变动后，市場掀起大波，黄金从十七日汇率变动前的二百〇三万元涨至二百八十五万元。宋子文当即下令中央銀行大量抛出黄金，两天之內抛出一万多条，收回法币二百三十亿元，但是金价也退不进二百万元关，黄金与外汇庫存日見減少。到了九月中旬，

情况更趋恶化,进口不能减少,出口不能增加,而不按合法手續进口的美貨更日見猖狂。因此美鈔黑市自九月十九日起,五天之內狂涨至四千四百五十元,比官价汇率高出三分之一。結果一切物价跟随上涨,人心惶惑,市場不安。美籍顧問楊格一見情勢不妙,称病辞职,撒手不管。宋子文不得已,又将原来在中英平衡基金委员会的英籍顧問罗杰士(即同李滋罗斯一起参与法币改革的)和馬克两人,再度敦請上台。他們两人当即提出兩項建議:(1)課紗厂重稅,理由是紗厂获利极厚,因为自一九四六年三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棉价上涨只二千倍,紗价上涨到四千倍以上,市場上搶购金鈔的大戶,多半就是各大紗布厂家,所以他們主张应当課以重稅,来弥补因大量外棉进口而受到的鉅額外汇損失。(2)速即限制进口貿易,設法推广出口貿易。英籍顧問这两項建議也有他們的意图。因为当时进口貿易几为美商所垄断,英国商人无力与美商竞争,他們想借此建議来压制美商。在当时,这两項建議虽不是什么仙方妙药,对于一时維持汇价,稳定币值,或許不无小补。但宋子文对于紗厂課重稅的建議,認為有損他自己的利益,无意实行,因为中国紡織公司占中国紗錠总数的一半还多(全部紗錠四百五十万枚,中紡占一半,全部毛紡錠四万余枚,中紡占四分之三強),是宋子文手中的一张王牌,不肯放弃厚利;若单課其他私人厂以重稅,又恐遭人攻击,道理也說不过去。因此,他只采用第二項建議而放弃第一項建議。即令这两項建議都能彻底实行,也只能稍有補助,并不是根本办法;何况第二項建議又遭遇美商压迫,也不可能行得通。

宋子文既采用英籍顧問第二項建議,当即由英籍顧問罗杰士及馬克,并由海关調来英籍職員吉勃脫共同草拟“修正进出口貿易办法”,并于十一月十五日頒布实行,可是遭到美商的反对,沒有获

得效果。

同时，由于美帝根据一九四二年六月的“中美互助协定”派军队来华，截至一九四四年止，美国先后只付给二亿五千万美元来抵偿美军在华应当偿付的二十五亿美元的驻军费用。此外，美军机场建筑费及我国供给美军各项巨额用品的代价，双方对于结合美金的算法问题久争未决，一九四六年八月，美帝特派专员来华与宋子文单独磋商，宋竟私自允许，只将美帝战时散布在太平洋各岛上的—些剩余物资来作价抵偿这笔巨额费用。因此，中国不但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美金外汇现款，反而蒙受极大损失。原来一九四四年以前，我国对美军所垫各项费用，总计达二百余亿元，如前所举，于一九四五年初只由美帝折合二亿五千万美元，拨充外汇基金，当时汇率上我国已吃亏很大，若依官价外汇计算还款，应合美金二十五亿五千万美元。可是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八月底止，我国对美军垫付各项费用，又达一千三百余亿元，而这时仅由美帝声称以可值八亿美元的实际上等于废品的各地剩余物资作抵，这就是等于变相赖帐。何况这些存在太平洋各岛上的剩余物资，我国还需付出巨额美金外汇的运输费用（需要美船装运）。这当然更给法币一个当头的打击。宋子文固然丧心病狂，不惜牺牲人民财富来更进一步削弱法币的基础，以讨好他的主子，而美帝这种欺诈骗赖帐的行为不就是毒辣可耻的国际骗子的行径吗？

三、所谓生产贷款与宋子文的最后挣扎

如上所举，宋子文所希望的外汇基金来源已断，外汇头寸日见枯竭。蒋政权这时已掀起内战，而内部争权夺利和文武机关人员贪污腐化，达到惊人程度。例如中央银行包飞机向平津各地运

送現鈔支付軍費，各地所謂軍政長官收到巨額法幣現鈔後，即先用以爭購黃金美鈔。各地中央銀行分行及四行兩局，也大量搶做上海匯款，除了已向中央銀行總行配給每周申匯定額外，又各私自包飛機運送現鈔回上海，當然更助長了各地的投機套買。即如徐州原非工商業碼頭，但因系軍事重鎮，駐有重兵，銀行錢莊相繼開分行，爭做上海匯款，套買金鈔。因此中央銀行由南京往北運送鈔票的運鈔專車，有時竟出現行至半途即掉轉車頭原車南開的怪事。這就充分說明當時為什麼外埠黃金美鈔的價格總是高於上海市場上的金鈔價格，為什麼外地游資（實際都是中央銀行自己發行供各地軍政費用的鈔票）不斷流到上海，為什麼中央銀行在滬盡量拋售巨額黃金，依然不能抽緊銀根，壓低金價。

所以同年十二月初，中央銀行連日拋出黃金幾千條，終不能抵擋各地流滬的六千億元以及滬市原有二千億元的游資。

到了一九四七年一月，金融形勢更趨惡劣，金價由二百九十萬元漲至三百七十萬元，美鈔漲至六千五百元。一月二十一日，更因大票額美金鈔的出現，外埠金價打破五百萬元大關（北京、天津、漢口、廣州），因此上海金價突破四百萬元大關。一月三十日，中央銀行雖拋售黃金一萬九千餘條，收進舊法幣達七百五十億元，也還不能穩定黃金市價。

到了二月三日，黃金市價又形波動，其他物價跟蹤直上，無一不漲，法幣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CC 派為了大量搶購金鈔，既不愿自己拿現款購金鈔（因為拿自己的鈔票購金鈔，僅能保值而已，不能賺巨額利潤），就設法向中央銀行借款。因此他們就壓迫宋子文發放巨額貸款，美其名曰“生產貸款”，用廠基及機器作抵，並指定上海及外埠十二個城市的四行總處同時開辦，實際上就是

为了搶购黄金美鈔。例如有的工厂早晨从中央銀行領取所謂“生产貸款”的巨額支票，来不及通过交換所交換，即直接在市場上搶购中央銀行拋出的黄金，因而中央銀行拋售黄金的收款中，就发现自己当天上午所发出的生产貸款支票。仅在阴曆年关几天之内，四联总处就放出六百五十亿元的“生产貸款”，其他貸款尚不在内。这等于自决堤防，当然要遭沒頂之祸了。

可是宋子文还想作困兽之斗，又于一九四七年二月五日，頒布“出口津貼、进口征費”的办法，来苟延殘喘，即：自二月十六日起，凡是出口貨物結汇时，对其輸出价格給予百分之百的補助費；对于进口貨物，則依海关征稅价格从价再征收百分之五的附加稅，但对于机器及米麦、煤油、棉花，为了討好美帝，則免征附加稅。此項办法，如此討好美帝，还是引起华盛顿政府的反对。美国駐沪总領事館当即以书面通知各海洋輪船公司，告以中国所实行的出口津貼办法，与美国一九三〇年頒布的關稅法令及海关稅則有抵触，并通知出口商凡輸往美国的出口貨須在領事簽證書內將津貼及奖励費加以注明，到达美国口岸后，还要特別課稅。宋子文的这个最后毫无办法的办法，也因美帝的反对而完全无用。当时中国的进出口貿易已为美帝所垄断，美帝这一关通不过，就滿盘皆輸了。

四、第二次黄金大疑案

总的說来，宋子文的黄金外汇政策及稳定币值办法，遭到了美帝的榨取干涉和CC派的搶夺压迫，以及自己的监守自盜，此时业已山穷水尽，黄金突破了九百万元大关，一切物价随之狂漲，毫无止境。宋不得不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六日頒布經濟紧急措施，禁止黄金美鈔自由买卖，美汇黑市跃至一万二千元，此后日見恶化，

最后高至十六万元。

CC 派看到宋子文假借外力已不足恃，經濟情势不可終日，搶購黄金已不可能，乃掀起第二次黄金大疑案，由参政会、監察院、立法院等机关联合对宋子文提出弹劾，并派大員到沪会同淞沪警备司令部进行检查，声称要拘捕中央銀行總裁，且立即拘捕了該行業務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楊安仁及某金号經理。于是宋子文不得不辭职出走广东，中央銀行要职又为 CC 派所占据。所謂第二次黄金大疑案，又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法币也就从此总崩潰，无法收拾了。

以上这些事实，有的是本人記憶所及，有的是得之于当时参与内幕人士的口述，但恐尚难获得全貌，希望熟悉当日内幕情况者加以补充和指正。

金圓券发行后蔣介石在上海 勒逼金銀外汇的回忆

戴 立 庵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傍晚的时候，我接到中央銀行抄送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給俞鴻鈞（当时的中央銀行總裁）的一个电报，大意說：請他邀約上海金融界的人于明日到南京行政院开会。所邀的人有宋汉章、錢新之、赵棣华、李馥蓀、徐寄廌、王志莘、傅汝霖、杜月笙、徐国懋、沈日新等十余人，我亦在被邀之列。我当时打电话問中央銀行是什么事情，俞鴻鈞不在行，不得要领。当晚回家路經南京路西藏路，看到那里有一座电动新聞牌，說明天起改革币制，要发行金圓券了。这个消息来得很突然，我想行政院邀我們可能就是談这件事情。第二天到了南京行政院，主持会议的是当时的行政院长翁文灝、财政部长王云五、政务次长徐柏园，纪录是財政部錢币司帮办薛臻舫。會議开始，由翁文灝說明发行金圓券的原委，希望大家拥护，出席的人表示拥护，沒有异议，也談了一些金融界困难情况。我当时沒有发言，在會議将近結束的时候，徐柏园指名要我講話，說我在財政部主管金融多年，現在又是联合銀行總經理，有这样两重身份，問我对于这次改革币制意見如何。我于是起立发言，大意是：“在抗战末期到胜利以后，建議改革币制的很多，当时財政部内部亦有此項主张，我們研究的結果，認為条件不够，

不能輕于嘗試。現在當局勇氣百倍，決定實行，我們當然希望它成功。不過從已公布的各項辦法粗粗看過一遍，覺得有三點矛盾衝突之處：首先，辦法內規定各種物品不得超過八月十九日的價格，同時對公用交通事業的收費又可調整價格，電力和運輸的支出與物價成本有關，都是構成物價的因素，如果同意它調整價格，又何能限制其他物品不加價呢？其次，限期收兌黃金、白銀和外國債券來充實準備，辦法很好，但是大批新券出籠，驟然增加龐大的購買力，對市場壓力很大，也是值得考慮的問題。（第三點已記不起）這些問題，當局諒亦看到，一定會統籌兼顧，我所說的可能是過慮”云云。我說完，大家默不作聲，不久會議即散。在我走出會議室的時候，薛臻齡跑過來輕輕向我說：“你的話太直率了，他們听了會不高興的。”我說：“‘驢不及舌’，既說了又有什麼辦法呢？”隨後，上海來的一般人去到勵志社見蔣介石，蔣亦希望大家擁護新幣制。大家照例頌揚一番，我沒有發言，一場會見就此結束。會後，我到財政部會見當時的常務次長李儼（倜君）。李對我說：“你是財政部的老人，希望對於新幣制竭力擁護。”我沒有多講，就作別回上海。

不久，盛傳蔣經國擔任上海經濟管制督導員，並已來滬籌備（名義上，上海區經濟管制督導員是俞鴻鈞，蔣經國是副督導員，但實際上俞鴻鈞絕不過問，完全由蔣經國一手包辦）。八月底，中南銀行胡惠春（胡筆江的兒子，這時是中南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叫人告訴我：聽說蔣經國這回來滬，對我有不利，要我注意。我當時頗為驚異，但亦沒有十分注意。這時行政院經濟管制委員會上海區三個管制機構的組織規則和委員人選都已公布：一是物資調節委員會，委員劉攻芸、李立俠、程遠帆、束云章、楊綽庵、江杓、沈熙瑞、沈鎮南、張茲闔、張希為、王嵐僧；二是檢查委員會，委員蔣經國、俞

叔平、宣鉄吾、周力行、林崇墉、张勇年、张毓泉、王云南；三是物价申議委员会，委員吳国楨、吳开先、潘公展、方治、李立俠、徐寄廬、吳蘊初、水祥云。同时馬路上有大羣所謂“經濟戡乱大队”遊行叫囂，造成紧张局势。

九月八日下午出版的特务宣鉄吾所办的《大众夜报》，用头条新聞大字标题，說我联合上海商业銀行逃避大量金銀外汇，还編造了許多誣衊我的事項，对我大肆攻击。我当时很冲动地拿起报纸，就奔向中央銀行找蔣經国。正值蔣在开会，我看到了俞鴻鈞和徐柏园。徐柏园是专为各銀行陈报外汇资产而来上海的，俞鴻鈞劝我不必見蔣，暗示見了蔣对我未必有利，当天夜晚，《申报》的記者来訪問，我将《大众夜报》对我的攻击加以駁詰，我的談話第二天《申报》登出。这事对我不啻是晴天霹靂，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对于为什么要加我这样大的罪名感到困惑；但从俞鴻鈞的語气看来，胡惠春要我注意的話是不无因由的。以后几天，《大众夜报》每天都有攻击和誣衊我的新聞。这时中央銀行通知各商业銀行限期陈报持有外汇资产数额。当时上海銀錢行庄都有明暗两套帐簿，黄金外汇都在暗帐收付，明帐中看不到，这是我参加金融业后才知道的。联合銀行甫于八月一日改組成立，我到行不久，联合銀行的外汇资产，除出善后債券列于明帐外，其余的外币証券、外币存款、庫存黄金都是暗帐，我从未見過，亦未問过，因此我問当时的联合銀行董事长錢新之如何陈报。錢新之把联合銀行总管理处几位高級職員和上海分行經副理邀在一起，当众对我說：“我們和盘托出，决不牽累你。”又說：“你們把表准备好，我明天和戴總經理一同亲自送往中央銀行。”

这时报載九月六日那一天，蔣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扩

大紀念周上惡狠狠地說：“目前尚有一個問題，即商業銀行對於政府法令尚存觀望態度，其所保留之黃金、白銀及外匯，仍未遵照政府的規定移存於中央銀行，並聞上海銀行公會理事會擬集合上海所有各行莊，湊集美金一千萬元，賣給中央銀行，便算塞責了事。可知上海銀行界領袖對國家、對政府和人民之禍福利害，仍如過去二三十年前，只愛金錢、不愛國家，只知自私、不知民生的腦筋毫沒改變。在‘共匪’這樣猖獗、人民這樣痛苦、尤其是前方官兵這樣流血犧牲的時候，政府為要加強‘戡亂建國’的力量，決心實行這一個重大的改革，其成敗利鈍，實有關於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而若輩擁有鉅量金銀外匯的，尤其是幾家大銀行，這樣自私自利，藐視法令，罔知大義，真令人痛心。這種行為固然是直接破壞政府‘戡亂建國’的國策，而其間接實無異助長‘共匪’的內亂。彼等既不愛國家，國家對彼等自亦無所姑息，故政府已責成上海負責當局，限其於本星期三以前令各大商業銀行將所有外匯自動向中央銀行登記存放，屆時如其再虛與委蛇，觀望延宕，或捏造假賬，不據實陳報存放，那政府只有依法處理，不得不採取進一步的措置予以嚴厲的制裁。”這些胡說，完全是流氓詭詐的口吻，可謂無恥之極。那時蔣介石祇要想加害某人，就加以破壞“戡亂建國”的罪名，他們就可以生殺予奪，為所欲為，這回也如法炮制。同時，蔣介石又親自打電話給俞鴻鈞，要他立即查封浙江第一銀行，因為浙江第一銀行董事長李馥蓀是當時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的理事長，蔣介石認為湊集美金一千萬元賣給中央銀行的主意是他出的，因此就把浙江第一銀行首先開刀，借以恐嚇其他銀行。俞鴻鈞對於這個“命令”，因為上海環境關係，不敢執行。李馥蓀又託了和蔣介石關係密切的已故中央銀行常務理事葉琢堂的女婿李叔明向蔣說情，才得無事。錢新之

知道这事的严重性，不是可以应付过去的，所以有“和盘托出”的話。在这样淫威鎮压之下，上海各商业銀行在九月十天左右，都将所存的黄金、白银、外币及其他外汇资产列表报告中央銀行。

九月十日，我忽然接到一封信，由蔣經国具名，約我于九月十一日上午到梵皇渡路乐义飯店某号一叙。我当时打电话問錢新之，他說：他也有的，不过他今晚要去南京，已复信改期再談。我感到这是“霸王請客”，吉少凶多，但又不能不去，因此十一日的早晨到了乐义飯店。約定談話的房間，是个套間，我先坐在外間，只听到里間講話声音很大，似有爭执模样，看到桌上会客的名单約有十余人，周作民也在內，已会过了。不久里面走出来的人是李馥蓀，面紅耳赤，神色頹唐，和我点点头就离去。这时里面邀我进去，只見蔣經国站在那里，房間內朝窗摆了两张沙发，中間隔着一张茶几，旁边一张沙发有人坐在那里。蔣經国招呼我坐下，因我在南京曾和他同过一次席，所以还認得。起先寒暄几句，后来漸入正文。蔣問我：“近几天的报纸你看到嗎？”我說：“已看到，正要請督導員彻查。至于联合銀行的黄金外汇，已經开单于昨天和錢新之先生一同面送中央銀行俞总裁和財政部徐次长了。”蔣重复《大众夜报》攻击我的事，要我承認，我說：“这是无稽之談。”蔣不以为然。我說：“《大众夜报》說我私人财产达二亿美元以上，这种連常識都沒有的話，你也会相信嗎？况且这事可以調查的。”蔣仍糾纏不已，而且做出很严厉的样子。我說：“那末，請你把具体事实和証据拿出来，証我也可甘服。”蔣思索一会說：“要拿，到法庭上再拿，我正在考慮送你到法庭还是到特种刑庭。”我說：“听你的便。”談話就在这样情況下結束。在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蔣又說“希望你考慮考慮，下次再談。”我說：“没有什么考慮”，一面就走出了套間。在我們談話中

間，蔣經國曾幾次站起來在房間內來往走動，似乎在想什麼心事。後來有人對我說：同一天早上蔣經國和周作民會見的時候，蔣一再追問周作民有多少外匯，周說有五千元美金，蔣大為憤怒，一再說要打電話警察局把周作民拘留起來，並站起來做出要打電話的姿態。我想他的在房間里往來走動，可能也想以同樣的方法恐嚇我，不過沒有做出罷了。在樂義飯店談話後幾天，《大眾夜報》又以头条新聞大號字說蔣經國傳詢我云云，並且在四川路漢口路附近即聯合銀行門口張起跨過馬路的大橫幅指名攻擊我。我感覺到問題嚴重，但我每天仍照常到行。小報上又說：戴某有恃無恐，鎮靜如常。這時搶購物品風潮已開始，物價亦有波動，儘管《大眾夜報》和一些小報對我還不斷攻擊，蔣經國在我離開樂義飯店時雖說下次再談，我也時刻準備着，但在那一段時間內沒有再找我。到了九月二十四日早晨，聯合銀行來了一個穿警察制服的“官員”，名片上刻着“刑警督察長程義寬”，說要會我。我見了他，他拿出一張預先寫好的“切結”，要我簽名蓋章，並且要正當行號做保人。原“切結”上並不說明原因，祇是說，“某某非經核准，不得私自離滬”。我問來人：“我究竟犯了什麼罪，要這樣處理？”他說：“對不起，我是奉命辦理。”在這樣情況下，我如不照辦，立刻就會遭到難堪，但倉卒間找誰作保呢？想起太平洋保險公司設在聯合銀行樓上，我問來人，找太平洋保險公司作保何如？他同意了。我即打電話給該公司的協理浦心雅請他下來一下，我把原委說明，他同意作保，隨即办好手續。我看程義寬手上還拿住同樣的紙頭一捲，問我：“周作民住在那裡？”我說：“可以問金城銀行。”周作民自樂義飯店出來後，很受震動，即避居虹橋療養院，事後知道程義寬並沒有和周作民見面，周的“切結”由金城銀行的有關機關誠孚公司作保。從九月二

十四日起，《大众夜报》和一些小报間或还在攻击，蔣經国对我再沒有其他的动作，直到金圓券崩潰，蔣經国离沪后，那张“切結”由俞鴻鈞交还我，可惜当时就把它扯碎了，否則倒是一个沉痛的紀念。不久，錢新之对我談起：在南京会見蔣介石，談到了上海的事，蔣說：“小孩子胡鬧。”这一幕丑剧，蔣介石是唯一的主持人，現在却說“胡鬧”，推得干干淨淨，这是他一貫的作风。蔣氏父子用了这样穷凶极恶的手段，对于帮助他起家的夥伴——南北金融資本家，想反轉过来一棍子打死，而且李馥蓀这时还是金圓券发行准备監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也不稍留余地，可謂咎由自取。在上海一地，蔣介石掠奪了黃金一百十四万六千余兩，美鈔三千四百五十二万余元，港币一千一百萬元，銀元三百六十九万余元，銀子九十六万余兩（截至一九四八年十月底數目）。但是各銀行的外幣存款和外幣証券搜括數目和他們的企圖相差很远。原因是各銀行的外匯資產雖經申報，除了因行庄增資結售一部分外匯和少數需要頭寸的銀行將所持外匯結與中央銀行外，其餘銀行仅仅办到申報手續为止，所有外匯資產仍在自己的戶頭上面，沒有轉帳過戶，而且金圓券崩潰太快，沒有時間讓他們進行勒索。它所掠奪到的，多數是人民所有的黃金、美鈔、港币、銀元。據說蔣介石的親信吳忠信的老婆對人說：“經国是我抱大的，現在連我的棺材本，都被他搶去了。”吳忠信的老婆尚且如此，一般老百姓的遭受禍害更可想而知了。

金圓券是蔣介石掠奪人民財富的惡毒的手段，開始就用殺害手段來達到他的目的。他首先槍斃了與孫科有關的林王公司的王春哲，然後對當時金融界幾個頭面人物施行種種威脅，意思就是說，“你們究竟要命還是要錢”。蔣介石在南京紀念周上的威吓和蔣經

国在上海乐义飯店形同強盜綁票的迫胁，父子串双簧，目的就在黄金、美鈔，問題是很显明的。在当时我想，象李馥蓀、周作民这些人在金融界素負“盛名”，把他們做个榜样来威吓人还有作用，象我这样的人，也值得做榜样嗎？后来事实逐渐明了，这里面的原因是很为复杂的。首先，我虽然在金融界不久，但金融界熟知我的名字，把我做个榜样，可以威吓金融界其他的人。第二，我在金圓券发行的第一天，就在南京行政院指出它的弱点，这是他們最忌諱和最痛恨的。因此在我回上海不久，蔣介石的侍从室就有电报給淞沪警备司令部，叫它注意我的行动。第三，由于錢币司管理金融的关系，經常和特务的利益冲突，从重庆到南京我一直是特务“欲得而甘心”的对象。在重庆时特务头子郑介民曾向俞鴻鈞說，“你們的錢币司长戴銘礼假借儿子十岁做寿为名，要各銀行送礼。”俞鴻鈞轉而問我，我說：“我今年沒有十岁的儿子，但今年我母亲七十岁却是个好題目，我沒有利用，何必去用儿子的名义呢？”另一桩事是在胜利后不久我还在重庆的时候，有一个姓白的人，攜帶申請北洋保商銀行复业的公文并附有軍統局的証件，証明在平津淪陷期間北洋保商銀行曾为軍統局做了很多掩护工作，以此作为复业的理由，請財政部批准复业。这个姓白的是軍統局派在华北的特务头子。我說，北洋保商銀行是王克敏的事业，是大家都曉得的，王克敏是汉奸，如果他办的銀行可复业，何以見諒于社会，这事不好办。姓白的說，他“对抗战有功”。我說：“你們的証件既不便向外面公布，老百姓怎能知道呢？”姓白的天天来催，后来財政部把这个案件向行政院請示，行政院擱置不复。在那特务橫行的时代，有办不通的事，在他們說来是极为失“面子”的，而且也堵塞了他們发财的机会。因此姓白的极为憤怒，在外揚言要收拾我。蔣經国的督導員

办公处原是特务的大本营，这次是他们收拾我的机会了。另外，我和蔣經国还有一段不愉快的经过：胜利后，在上海的某商业銀行（这家銀行随后即倒閉，行名已記不起）查帳报告中，有十六个戶头沒有姓名，都用某某記，数目既大，进出又很頻繁，投机倒把的情况很为显明，这銀行是当时郵政儲金汇业局局长徐繼庄暗中經營的。徐繼庄說：这十五六个戶头，是蔣經国弟兄所开的。我很气愤地說：我不管这些，蔣經国就可以不守法，为所欲为嗎？”这些鬼打架的事情，不值得一談，但是綜合起来看，蛛絲馬迹很显然的。因为有这些关系，我就成为他们的对象，和李馥蓀、周作民同样充作牺牲品，实现他们的恐怖政策。由于各銀行已办理“陈报”，他们目的已达到，所以沒有进一步加以毒害。《大众夜报》在对我大肆攻击的时候也說过：政府目前对此案尚无有所行动的表现，一切恐将視今日上海各行庄依限办理繳存金銀外汇之結果如何以为断。由此說明蔣氏父子串演这幕丑剧，目的在掠夺黄金外汇，作为他們的逃跑的資本。

書 綦 江 獄*

章 士 釗

吾居上清寺日，董君必武見訪，圍爐聚語，涉及近事。君為言沈君衡山有門人參理殘案，發見一最大冤獄。事起于綦江戰干團，大約該團師生，思想多少左傾，為當局所注意。軍統因突以造反罪名，從事大規模逮捕，株連達五百余人，酷刑訊至半年之久。誣告設有電台，廣布通訊網，人司專職，密密相連，乘間竊發之可能性極大。一問左証，則全為烏有，電台既昧處所，復提不出機件。案中所刊証迹，一從溝渠內撈取之破爛表壳，因謂秘密機關，概存于鏽蝕之鋼質旋條。案情之滑稽可笑，一至于此。牽連中之主犯一姑，號稱間諜長，一姊，號稱文牒員，則全與聊齋所載臙脂一則之誣扳誣訊，稍緩皮肉之燦爛者無異。迨衡山門人參與審訊，而冤濫死者已數十人，即存者或手足斷，或骨節折仍無算。此特仁者于強寇殺人眨眼間，略盡誘說之能，以言平反冤獄，乃相去萬里。且此案當時報紙一無紀載，外間知者絕少，以勢推之，亦不過特務橫行草菅人命諸惡例中一小小部分而已。時在庚辰初冬即千九百四〇年抗戰中期。

庚辰春已徂 渝州陰風促 株連五百余 淫刑半年弱

* 這是章士釗先生于一九四〇年在重慶時的舊作，可以與本刊第五輯周振強先生所寫的“四川綦江戰干團慘案回憶”一文相參証。

| | | | |
|-------|-------|-------|-------|
| 竿揭號捕名 | 竿揭號捕名 | 竿揭號捕名 | 竿揭號捕名 |
| 浮台何處所 | 浮台何處所 | 浮台何處所 | 浮台何處所 |
| 隱札托親戚 | 隱札托親戚 | 隱札托親戚 | 隱札托親戚 |
| 二女一呼至 | 二女一呼至 | 二女一呼至 | 二女一呼至 |
| 求生既不能 | 求生既不能 | 求生既不能 | 求生既不能 |
| 前決百十眾 | 前決百十眾 | 前決百十眾 | 前決百十眾 |
| 幕府懼偕亡 | 幕府懼偕亡 | 幕府懼偕亡 | 幕府懼偕亡 |
| 剗人如剗羊 | 剗人如剗羊 | 剗人如剗羊 | 剗人如剗羊 |
| 吾能為此詩 | 吾能為此詩 | 吾能為此詩 | 吾能為此詩 |
| 自古奇冤多 | 自古奇冤多 | 自古奇冤多 | 自古奇冤多 |
| 俱發到細作 | 俱發到細作 | 俱發到細作 | 俱發到細作 |
| 毀棄贖机軸 | 毀棄贖机軸 | 毀棄贖机軸 | 毀棄贖机軸 |
| 姑姊名相屬 | 姑姊名相屬 | 姑姊名相屬 | 姑姊名相屬 |
| 囊供出誣服 | 囊供出誣服 | 囊供出誣服 | 囊供出誣服 |
| 求死豈易得 | 求死豈易得 | 求死豈易得 | 求死豈易得 |
| 櫻斃頗与埒 | 櫻斃頗与埒 | 櫻斃頗与埒 | 櫻斃頗与埒 |
| 无意更深鞠 | 无意更深鞠 | 无意更深鞠 | 无意更深鞠 |
| 睚眦誰敢詰 | 睚眦誰敢詰 | 睚眦誰敢詰 | 睚眦誰敢詰 |
| 事寢三四月 | 事寢三四月 | 事寢三四月 | 事寢三四月 |
| 大者綦江獄 | 大者綦江獄 | 大者綦江獄 | 大者綦江獄 |
| 飛電有浮台 | 飛電有浮台 | 飛電有浮台 | 飛電有浮台 |
| 赫赫鋼旋条 | 赫赫鋼旋条 | 赫赫鋼旋条 | 赫赫鋼旋条 |
| 姑指間諜長 | 姑指間諜長 | 姑指間諜長 | 姑指間諜長 |
| 誣服何因由 | 誣服何因由 | 誣服何因由 | 誣服何因由 |
| 卒賴好廷評 | 卒賴好廷評 | 卒賴好廷評 | 卒賴好廷評 |
| 生或手足斷 | 生或手足斷 | 生或手足斷 | 生或手足斷 |
| 緹騎微奇功 | 緹騎微奇功 | 緹騎微奇功 | 緹騎微奇功 |
| 政令防未然 | 政令防未然 | 政令防未然 | 政令防未然 |
| 言者屬吾党 | 言者屬吾党 | 言者屬吾党 | 言者屬吾党 |
| 密通憑隱札 | 密通憑隱札 | 密通憑隱札 | 密通憑隱札 |
| 溷渠得表壳 | 溷渠得表壳 | 溷渠得表壳 | 溷渠得表壳 |
| 姊乃管書牘 | 姊乃管書牘 | 姊乃管書牘 | 姊乃管書牘 |
| 略緩爛皮肉 | 略緩爛皮肉 | 略緩爛皮肉 | 略緩爛皮肉 |
| 截流強令活 | 截流強令活 | 截流強令活 | 截流強令活 |
| 少亦損骨節 | 少亦損骨節 | 少亦損骨節 | 少亦損骨節 |
| 左計莽陰毒 | 左計莽陰毒 | 左計莽陰毒 | 左計莽陰毒 |
| 反坐愈難說 | 反坐愈難說 | 反坐愈難說 | 反坐愈難說 |
| 紀錄算斧鉞 | 紀錄算斧鉞 | 紀錄算斧鉞 | 紀錄算斧鉞 |

蔣介石建立空軍的黑幕

許 念 暉

一九三二年，蔣介石、汪精衛再度合作，汪出任行政院長，宋子文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蔣介石以軍委會委員長名義實行軍事獨裁。時值“中日上海停戰協定”簽訂不久，全國各方面一致提出加強國防建設、首先建立空軍的要求。在這一形勢下，蔣擴大了航空署的組織，以葛敬恩、徐培根為正副署長，同時又派葛兼任中央航空學校代理校長（校長名義由蔣自兼）。葛為浙籍軍人，日本陸大畢業，曾任浙軍第一師師長陳儀的參謀長，北伐期間投降蔣介石，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處長兼參謀本部次長，因為浙江同鄉的關係，頗為蔣所信任。以上兩職發表後，葛以為自己不是航空人才，躊躇不肯就任。宋子文勸他不要多所顧慮，並且答應在財政上予以支持。航空學校所聘美國顧問裘偉特也見葛打氣說，美國航空署長也不是學空軍出身的。得到這樣的有力支持，葛就走馬上任了。

航空學校設在杭州，美國航空顧問團駐在校中。葛為了工作上的便利，就也將航空署設在杭州。當時談不上自造飛機，建立空軍的唯一辦法只能是向國外訂購飛機；這就首先發生了帝國主義各國向中國推銷軍火的爭奪戰。蔣介石在軍事上本來迷信德國，當興登堡任德國總統時期，已經聘用了以鮑威爾為首的德國軍事

顧問團，主持所謂建軍計劃。不久鮑威爾病死，希特勒已上台，收派以佛采尔为首的顧問團來華，人數較前增多，權力更為擴大。蔣處處模仿德國，除在政治上加強法西斯化外，在軍事上無論購買軍火、聘用人才等方面，主要也傾向德國。但佛采尔是個飛揚跋扈的軍人，不把蔣家軍政大員放在眼上，引起了大家不滿。宋子文案來親美，竭力主張改聘美國軍事顧問團。蔣既想結交德國，又要依靠美國，於是假口德國合同尚未屆滿，未便中途解約，同意宋以行政院名義，在航校聘用美國教官。隨後以裘偉特為首的美國顧問團就來到了中國。美國顧問團的任務只是主持航空教育，但帝國主義者對付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就象主人對待奴才一樣，什麼事情都要管，尤其是不肯放鬆推銷軍火這筆買賣。另一方面，德國軍事顧問團認為他們主持全面建軍，空軍也包括在內，堅持向德國購買飛機。德、美兩國顧問團矛盾重重，首先表現在德國顧問團介紹購買高射炮的問題上。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受到凡爾賽和約的限制，不准進行軍火生產，於是德國人用借尸還魂之計，在他國設立軍火廠，如瑞典的博伏斯軍火廠、匈牙利的軋買尤阿斯軍用探照燈廠，資本和技術人員都是德國所提供的。德國顧問團介紹中國在博伏斯廠買進過二百多門重山炮，根本不適用於公路不發達的丘陵地帶。航空署防空部成立，又代訂購二十門高射炮，亦由博伏斯廠承造，而應該與高射炮配合成套的牽引車和探照燈，却要分別向德國及匈牙利訂購。當牽引車圖樣送到航署審核時，美國顧問裘偉特發現是農業用的拖拉機，因此用譏諷的口吻說：“這種東西我們美國農村多的是，怎麼可以牽引高射炮呢？”經葛查明，原來高射炮牽引車也在凡爾賽和約禁止製造的範圍內，德國顧問認為南京政府一團糟，蔣家不識貨，就想魚目混珠，用改頭換面的拖

拉机来代替它。騙术戳穿后，葛敬恩坚持要退貨，改向英国維克斯兵工厂訂购。同时避免在美国訂貨，以減輕德国顧問团的反感。由此可見蔣介石政权事无巨細，必須向帝国主义面面討好，根本談不上什么主权国家。其次，中国官吏在訂购軍火上貪图佣金，你爭我夺，又发生了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内部矛盾。宋子文支持葛敬恩上台，目的是在购买軍火上与葛狼狽为奸。宋曾以財政部名义，向美国佛利特飞机厂购买教練机十架，貨到之后，即交与航校使用。裘顧問一看不是自己介紹的出品，心中很不自在，假意对航校副校长毛邦初說：“这批教練机質量是好的，比德国出品好得多，只是价錢太貴了，你們国家受到損失，我心里很难过。”原来美国軍火工业由各个系統的寡头金融分別掌握，互相竞争，佣金也有厚薄。宋子文訂购的教練机，并不属于裘伟特所指定的一家。同时毛邦初也想染指佣金，不滿意宋子文越俎代庖把裘伟特的話告訴葛敬恩，并建議彻查一下。葛当由航署函达美国佛利特公司查对，結果該公司开来的购价与宋开来的价格有百分之二十的差額，显然那百分之二十被宋中飽了。葛根据佛利特公司来函向財政部提出質問，宋派机要秘书邓勉臣（邓在抗战期間因貪污案被枪毙）到航署解釋說，美国厂商林立，竞争剧烈，早晚时价不同，航署如再向該公司訂貨，当然比过去低廉得多。这种抵賴之詞，既出于“貴戚”之口，此案只能以不了了之。

一九三二年十月，孔祥熙以“考察实业专使”名义到欧美有所活动，也想在购买軍火上大捞一票。孔到意大利会見了墨索里尼，經過几度接洽，购到了大批飞霞式轰炸机，并且延聘了以劳地为首的意大利顧問团来华协助建立空軍。孔回国后对葛敬恩說，建設空軍，已得到意大利政府的支援，財力物力都有办法，航署应即扩充

为部,并且开门见山地向葛表示,愿意自任航空部部长,请葛以首席次长负实际责任。葛不愿受孔支配,借口中国航空建设,尚无端倪,设署已感多余,改部实无必要,表示不同意。不久意大利飞霞式轰炸机二十余架运到,航署接收后,经美国顾问检查,认为“这样的旧东西,炮管中的来复线都已磨光,如何能用”。于是裘顾问振振有词地主张退货。葛敬恩既不能不理美国顾问的意见,又不敢开罪孔祥熙,只得将经过情形据实向蒋请示。蒋介石表面说要追究责任,但是以后并无下文。不过航空署改部之说,孔祥熙再也没有提起过了。

葛敬恩在矛盾重重下,不想再干,一九三三年七月,调为浙江省政府委员,航校校长即由毛邦初代理,航署署长以副署长徐培根升任。毛为蒋的内亲,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肄业。徐出身保定军官学校,并留德有年,接近蓝衣社,自视甚高,平日除对蒋恭顺外,一般人都不在眼中,尤其是看不起军需系与军委会管理财务的军需人员。航空署从熊斌、张惠长的时代起,向外国行家购买军用品,包括飞机汽油等等,都有回佣,结账时由外国行家送交会计处,全署员司按级分配,久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葛敬恩接任时本想革除此项陋规,但是对于合同未清的货款,必须如数照付,如果放弃回佣,徒然便宜外商,因此将已订合同应付货款的回佣近二万元移作航署福利经费,但仍然引起署内员司的不满。这年十一月,蒋介石令航署战斗人员迁往南昌,以副署长曹宝清兼任南昌行营航空处处长,徐培根亦到江西指挥空军屠杀人民。不料从意大利购来的飞霞式轰炸机就象害了痨病的一样,飞不多时,就要大修。有一天一架飞机发生了故障,送往机械处修理,拆卸后尚未兴工,晚间突然着火焚毁。起火原因,有说是出于红军地下人员的破坏,有说

是徐培根在沪投机失败，亏空公款三百万元，故将飞机焚毁，以少报多，以旧报新，借以弥补亏空。当时曾有人为此事见蒋，主张严加查究。蒋被迫下令将徐逮捕，发交军法处鞠讯。徐在供词中说到曾挪用航空署葛敬恩任内移交的福利基金。蒋电令浙省府召葛到案质询，葛抵南昌即被拘禁。直到红军离赣北上抗日，南昌行营移设重庆，葛才被释放。至于徐培根一案，拖延很久，也无下文。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日写于上海

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

黃紹竑

前 言

全国政协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成立不久的時候，我問会里一位同志：“从何写起？你希望我写些什么？請您出个題目。”他說，希望我把与桂系、与蒋介石的关系写出来。当然，我能写的东西，几乎件件都是与蔣、桂有关系的，等我通通写完之后，我与蔣、桂的关系自然会完全暴露出来，但这样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我現在就用“我与蔣介石和桂系的关系”作为題目，把我与蔣桂之間錯綜复杂的重要关键写出来，这样，我以后再写其他历史資料，可能有便于讀者的了解。这是我个人大半生的骯髒历史，也是国民党反动統治的骯髒历史。如果我不是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感召，是決不肯坦白地写出来的，也沒有机会写出来。我写了之后，更彻底地認識了自己，对于我的思想改造有极大的好处，我对党表示衷心的感謝。

一、我与桂系的关系

我是新桂系的創造人之一，有人認為在反动政治里我是桂系的陰謀家。我与桂系的关系大致可分两大阶段：一九三〇年以前

是前一阶段，一九三〇年以后是后一阶段。前一阶段比较简单，将另文写出；现在所写的是后一阶段，也就是最复杂的阶段。

主要是要说明一九三〇年我为什么离开广西、投到蒋介石那里去。说来话长，要从头说起。一九二九年春，南京召开编遣会议时，李济深本不赞成编遣，不想出席会议，躲在广西梧州大坡山他的老家里，要我去商量。我极力主张他去出席，适当地尊重蒋介石的意见，进行编遣（详情见另稿“新粤桂第二次战争”）。为什么呢？我认为我们桂系几年来发展得太快了，基础很不巩固。蒋介石的编遣，虽然是为了想削弱第二（冯玉祥）、第三（阎锡山）、第四（李宗仁）集团军力量，以加强他自己的第一集团军的力量，实行独裁，但就国家来说，总是一个正大的名义，而事实上也决不能把二、三、四集团军完全编遣了的，大家都编遣了一些，力量的比例还不是一样的吗？而第四集团军因为发展得太快，也必须借着中央编遣的大帽子进行编遣，才能更加巩固，更加有力。这样岂不是既获得好名，而自己又获得实惠吗？李济深勉强同意我的观点，才去出席南京的编遣会议。

李济深被蒋介石囚禁汤山，是出乎我意料的事，在我看来，这是蒋介石最错的一着失棋，于国、于己都没有什么好处。及到编遣会议破裂，蒋桂战争将要爆发，我曾派机要参谋罗克传秘密带信（因电报易泄漏）去武汉找李宗仁。我在战略上主张把桂系主力控制在粤汉线上，必要时放弃武汉和北平，不宜急于同蒋介石开火。这样至少可以确实控制广东和湖南，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坐观时局的变化。这样消极的战略，首先受到胡宗鐸、陶鈞（桂系中的湖北派）、白崇禧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如果那样，由广州到武汉、北平的桂系局面就自己垮台了，不但到口的肥肉他们不愿轻易放下，

并且认为打是很有把握的。不料蒋介石利用金钱收买，不但把白崇禧所指挥的由唐生智旧部改编的部队（如廖磊、李品仙、叶琪、周祖晃等）收买了，就连第七军的基本部队李明瑞、杨腾辉两师也被收买，倒戈相向，桂系在武汉，北平热烘烘的局面就被蒋介石搞得冰消瓦解。李宗仁、白崇禧只剩得两个光杆，逃回广西老巢。盛极一时的桂系十几万人的部队，就只剩下我的三个多师，我心里是多么难过！这是我与他们第一次在政略、战略上意见分歧的结果。

编遣会议破裂，李济深被囚禁，桂系在武汉、北平失败之后，在粤军方面虽然陈济棠、陈铭枢、陈策（粤海军司令）已经站在蒋介石方面反桂，而徐景唐（第五军军长）、邓世增（广州警备司令）、舒宗鑑（粤海军有力者）仍然忠于李济深，主张反蒋；两陈部下亦有一些忠于李济深的人，我驻粤部队主力已撤回桂边。在这种情势之下，我希望两广相安一时，看看大局的变化，再作打算。李、白逃回到广西后，极力主张立刻出兵去打广东，他们的理由是：武汉方面胡（宗铎）、陶（钧）部队还有很多退到鄂西继续反蒋，广东方面也有不少人要反蒋，如果不及早把反蒋的旗帜树起来，就会逐步地各个被消灭净尽。他们输急了，就不顾一切，想把我剩下的小小本钱作孤注一掷，极力要我马上出兵广东，树起反蒋的旗帜。

从来桂系内部的大事，都是我们三人商量、多数决定的，他们既是多数，我个人不好坚决反对。当然，如果我坚决反对，也是可以的；但是这样，仅存的桂系，内部就要分裂了。我不愿这样做，但内心很矛盾。因此第二次粤桂战争，军事上一切都交由白崇禧去指挥。而我则留在广西等待胜利，同时也在等待失败（那时李宗仁已去国外从事各方面的联络）。结果，仍然又弄得大败而回，连广西老巢也保不住。我同白崇禧一同逃到安南、香港。这是我与他们

們第二次意見分歧的結果。

一九二九年秋天，汪精衛的改組派也起來反蔣，改組派顧孟余等在香港同我們商量共同反蔣，我與生死對頭的改組派又言歸于好。張發奎的第四軍在宜昌為蔣軍所迫，由宜昌逃往湘西桂北，想回師廣東驅逐陳濟棠、陳銘樞，占領廣東地盤。我們也乘機潛回廣西，重新執掌廣西的殘局，與張發奎共同出兵廣東（是謂第三次新粵桂戰爭，見另稿），結果又是大敗而歸，張發奎殘部亦退入廣西。李宗仁自稱護黨救國軍總司令，我為副總司令，白崇禧任前敵總指揮；張發奎仍是第四軍軍長，不願擔任什麼名義，也就是暗示不願當李宗仁的部下，這個合作是暫時的。

一九三〇年夏天閻馮聯合反蔣，在北平召開擴大會議，汪精衛來電要我們出兵湖南，直搗武漢，響應閻馮。那時我正在廣西右江方面與紅七軍李明瑞對峙着，他們（指李、白、張）事前不同我商量，就傾巢出兵湖南，這種戰略我也不同意，把我弄得很被動，跟他們跑來跑去。蔣介石把主力集中在鄂南防禦，並要何鍵（湖南主席兼四路總指揮）撤出長沙、岳陽，避免同他們（指李、白、張）作戰，以保存實力。他們便輕易地占領長沙、岳陽。但蔣介石却令陳濟棠、陳銘樞的粵軍占領了衡陽，把我們截為兩段。李、白、張、唐（生明）不能不由岳陽、長沙狼狽撤退回來，在衡陽也因為同我的意見不一致，又打了一個大敗仗，把實力損失了大半。總之，歷年來我與那所謂“小諸葛”白崇禧的意見往往是相左的，儘管他過去也有許多戰功。但我們私人的感情是很好的，無話不說。

由衡陽敗退到廣西邊境全州，我與白崇禧同駐在清湘古寺里（據說是明末高僧大畫家石濤住錫的地方），半夜的鐘聲，使我的內心十分矛盾，實在忍不住了。我想：我們搞了十幾年，結果弄得這個

样子，同蔣介石爭天下，肯定是爭不過的了；我不如趁此借着桂系的影响，凭着自己的手段。到外头（指蔣方）去混，自己一定可以混出一个名堂来，或者于桂系間接作一些帮助，至少我也可以图得下半世的快活，何必在广西挨苦；以后的問題更多，可能还要遇到一些現在料不到的問題呢。于是我对白崇禧說，我决心不干了。他很惊异地問我为什么，我当时不便說出上面所說的那些理由，而是說我对軍事实实在在感得厌烦了。他赶忙說：“你現在千万不要对大家說出来，否則我們的軍心就要瓦解了。你心情不好，我很知道，你就休息休息，专理行政的事（那时我兼任广西省政府主席），軍事由我們負責好了。你如果坚决不干，要离开广西，也要等軍事局面稍为安定，才好提出来。”我接受了他的意見。我們退回桂林和柳州后（那时我們仅保有这两个地方），我就一事不管，到良丰花园（前清台湾巡撫唐景崧的花园，即后来广西大学农学院）去休养。

一九三〇年秋天，由于蔣、桂、閻、馮战争的关系，长沙成了真空，据传共产党彭德怀、黄公略等起义占領了长沙。我由于一貫反共，觉得同蔣介石打来打去，无非是为共产党造机会，何苦来呢，就不征求他們的同意，发出电报（大約是九月或十月的馬日），向他們辞职，并主张和平。这个电报被他們扣着发不出去，他們并来电对我慰解。我虽然想离开广西，但四方都被敵軍包围封鎖，走不出去。

一九三〇年冬天，他們把围攻南宁的卢汉部滇軍击退，南宁解围，余汉謀的粵軍也撤出宾阳，退守梧州。我們回到南宁、龙州到安南的路也通了。我又把要离开广西的問題在一次會議上提出来，并且說我出去决不出卖团体，可能还对团体作一些間接的帮助，他們就不再劝阻了。李宗仁說了一些以后希望我仍为团体努

力的話。白崇禧發言最尖刻，他說，广西人不會投降的，不但現在不投降，即使將來的環境比現在更困難也不會投降的；所謂為團體而努力的意思，就是在不投降原則之下使團體的力量更大、更強、更鞏固。隨後白崇禧手下大將廖磊也發了言，無非是舉洪楊時代广西人革命壯烈犧牲的事跡作比，強調广西軍隊不會投降、不會被收買。我心里暗暗好笑：你們還吹什麼，你們怎麼剩下幾個大光杆逃回來的呢？李明瑞、楊騰輝、呂煥炎不是被收買倒戈的嗎？但我成竹在胸，決心到外頭去進行我的政治活動，也不同他們辯論什麼，只是笑笑。第二天，李宗仁、白崇禧還叫黃旭初來向我解釋，昨天會議上使我不甚愉快的局面，也是可以理解的，其實我滿不在乎。我抱定：第一，不再破壞國家的統一，也就是不再反蔣，參加內戰；第二，決不出賣團體。這是一個極其矛盾的問題，怎樣在這矛盾中求統一，至少在我個人的行動上求統一，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我由龍州出安南，這一向是广西新舊軍閥下台的后門，陸榮廷、譚浩明等走這條路，我們也照樣走這條路，我已經是走第二次了。在河內逗留不幾天，就到了香港，蔣介石已派伍廷黻（一九二九年以前广西建設廳長兼十五軍師長）、陳适（保定同期同學，蔣介石的高參）在那里迎候我，邀我去南京。當然，我這次離開广西，本抱有積極的目的，並不是想在香港當寓公，那時也還沒有資格當寓公。因此，我很快就去南京，可以說，那時我去南京，是主動的而不是被動的。這是我離開广西的原因，也是我与蔣介石發生關係的開始。

二、我与蔣介石的關係

第一階段

我到南京，同以前一樣，見了蔣介石。蔣除了見面時說几句應

酬話之外也不說什麼，不久就任命我为广西軍务善后督办，要我回去收拾广西。南京有以馬晓軍（我們以前的营长，我們得志后总不理他，他恨极了）为首一小撮人，在我住的旅館大貼反对标語，說我是“破坏国家統一的祸首”、“实行苦肉計”、“实行緩兵計”，要南京中央惩办我，要求南京中央出兵討伐广西，后来經蔣介石派警察彈压才平息。

蔣介石任命我做广西軍务善后督办之后，还送我二十万块钱，并且說这是給我筹备就职之用的，如果以后有更多需要的話，随时可以打电报来要，也就是說，如果需要收买軍隊的大宗款項，是随时都可以支付的。他要我赶快回广西就职，可是，我如真要回广西就职，除非带兵打回去或者是用大量的金錢收买李、白的部队。蔣介石也明白打回去是困难的，希望我采用后一个办法，但我并不那样做。

我拿了蔣介石的錢，在上海縱情地玩了一陣，就回到香港，在那里买了洋房住起来，有时也到广州去走一走。那时陈济棠任广东編遣主任，陈銘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他們問我什么时候就职，我說，要等等机会成熟。蔣介石还派陈适在香港跟着我、催着我，我也是那样应付他。

一九三一年春間，蔣介石把胡汉民扣囚，孙科、邹魯、古应芬都离开了南京，秘密回到广州。有一日早晨，我在香港碼頭上，看見陈銘枢很狼狽地从由广州开来的英商太古公司海輪山东号下来（省港往来一般都是坐省港輪船的），我很詫异。他邀我到香港大酒店密談，同进早餐。他說，广东的局面变了，陈济棠联合李、白和张发奎反对南京，他只身逃来香港。两广事变的原因，我事前是不清楚的，我当作为一个秘密打电报报告蔣介石，其实蔣介石早就知道

了。这样,我不能就职就更有理由可說了,我在反动政治上的市場也就扩大了,当然我还想不断的設法扩大。

不久以前,陈济棠、陈銘枢还是表面上合作的广东实力派两巨头,現在却分开了,而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不久以前正是与陈济棠枪口相对的敌人,現在又“团結”起来了。汪派、胡派(胡尚未释放)、孙派竟以清一色的广东佬在广州开府(国民政府),与南京蔣介石对抗,不但社会上很多人莫明其妙,而我亦弄得不十分清楚。

我在香港閑住,預料广州会要邀我参加,不久李宗仁、白崇禧来香港游玩,要我回广西去。我同他們回到南宁,当然我有我的打算,对于軍事和政治問題閉口不談,只同他們談一些經濟建設問題,这自然与他們的胃口是不很对的。有一次在梧州欢迎汪、孙的大会上,他們要我講話,我也是避开軍事和政治,只談談經濟建設問題(当然,他們心里希望我說些什么話,我是很明白的),結果弄得大家不很高兴,認為我是對他們的反蔣泼冷水。

两广非常會議在广州中山紀念堂开大会,我以桂系的关系也被邀出席参加。那时孙科对非常會議有相当的权力,他大发脾气,認為我还戴着蔣介石委的督办头衔,是蔣介石的間諜,如果再让我出席,非常會議的内容就要完全被蔣介石知道了。风声传到我的耳里,李、白也觉得为难,我就不再参加了,但仍与白崇禧同住在珠江頤养园的紅樓(珠江頤养园在广州的二沙島上,自一九二四年以来就成为两广軍閥借名休养的处所),不久我就回香港去了。由于李、白的說情,广州方面打算要我做广西經濟督办。很明显,那时候广西有什么經濟可督、可办的呢?我又懂什么經濟?他們无非是想把我拉回广西去,不致使我一面倒到蔣介石方面去。那时我虽然不就蔣介石所委广西軍务善后督办之职,但我並沒有辞去,仍然戴着

广西軍务善后督办的头銜住在香港，玩弄两面手法。

我为了避免南京、广州两方面的麻煩，同我任內的广西教育厅长盘珠祁（留美学生，广西大学副校长）去菲律宾住了个把月，本打算再到台湾、日本、美国游一趟，增加一些見識，也可以摆脱政治上的麻煩。但象我这样热衷政治的人是决不肯冷靜的，回到香港后因为安葬母亲回到我的家乡容县去。我这样回去，李、白一方面是欢迎的，一方面又是有顧虑的，不知我回去暗中想搞什么鬼。

九一八事变发生了，震动全国，我想这是实行全国大团结的好机会了。我由容县乡下出来，广西某些地方学校都請我去講話。我无非是講些团结御侮、救亡图存的話，我想这些話当然不会被任何人所反对。但事后有人告訴我，李、白馬上就派人糾正我的說話。他們認為“非反蔣不能抗日”，“非反蔣不能救亡”，認為我那些話仍然是向他們泼冷水，另有作用。我知道这种情况，就不同他們見面而悄悄地溜回香港。九一八事变后，团结御侮、救亡图存的声浪响遍了国内和国外，經一些人的奔走拉攏，南京和广州为輿論所压迫和“良心”上的驅使，双方終于各派代表到上海去和談。广州方面的代表是汪精卫、孙科、邹魯等人，我和唐生智也同坐那个德国郵船去上海，各有各的目的，各有各的活动。在台湾海峡遇到特大的台风，船很危險，我同唐生智都是保定同学，都是因反蔣而先后下台的，在香港是同喝、同玩慣了的。这时我向他說了一句笑話：“孟瀟（唐生智号），这回如果不是‘同舟共济’，就是‘同舟共葬’了。”当时不論那一种情况，都会于国家有益的，因为同船的好些人，都是以前內战的搗蛋鬼。

船到了上海，还没有泊碼頭，就有好些人张着“上海各界欢迎粵方和談代表”、“团结統一”、“救亡图存”等等标語来欢迎。我不

是粵方代表，會議的情形不很清楚。據說粵方要求南京釋放黨內的政治犯胡漢民、李濟深、居正等人，蔣介石引咎下野，重新分配國民黨中央委員名額；而廣州方面則答應結束非常會議。雙方談妥後，先由兩廣方面就現有地區召開所謂國民黨代表大會加選分贓得來的中央委員，再由南京召集國民黨中央第四屆一中全會。我既不是粵方選出的中委，一九二九年因反對蔣介石就被南京方面開除了黨籍和中委，沒有經過恢復的手續，南京方面就拉我去參加，我也居然去了，真滑稽不過。這次全會關於中央政制上有一個重要的決議，就是修改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以“年高德劭”的人擔任國民政府主席，不負實際的政治責任，並不得兼任其他職務，而以行政院長負實際行政責任。這是國民黨內某些人（主要是粵方元老）提出的，想用來制裁蔣介石的獨裁。第四屆一中全會推選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院長，蔣介石下了野。蔣介石叫宋子文用財政力量扼殺孫科的行政院長，孫科上台不到兩個月，就倒下來了。我在上海住了一些日子，又回香港去。這就是我與蔣介石第一階段的关系。也許有人會問：你騙了蔣介石所給的“廣西軍務善後督辦”名義和二十萬洋錢，而你卻在香港玩兩面手法，蔣介石以後還會信任你嗎？道理很簡單：只要廣西問題一日不解決，蔣介石就一日不會放棄我的，一個督辦名義和二十萬塊錢，在蔣介石手裏算得什麼？我有本事還要再騙騙他。其實，在反動政治里，彼此不過是相互地騙而已，蔣介石難道不知道嗎？

第二階段

“一二八”十九路軍淞滬抗戰之後，蔣介石重新上台，蔣、汪合作了。蔣介石做了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汪精衛做了行政院院長，孫科任立法院院長，居正任司法院院長，戴傳賢任考試院院長，于右任任監

察院院长。行政院各部部长也有新的安排：黄紹竑任内政部部长，罗文干任外交部部长，何应钦任军政部部长，宋子文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顾孟余任铁道部部长，陈绍宽任海军部部长，陈铭枢任交通部部长，陈公博任实业部部长，陈树仁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閻錫山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閻不到任，由副委员长赵丕廉代理）。从这个阵容的人物的关系来看，很显然，仍然以蒋介石为中心，汪精卫等人不过是为蒋介石撑撑场面而已。但胡汉民却有自己的打算，他溜回香港作陈济棠的幕后人物，两广仍保持半独立状态。

我为什么也分得内政部部长一席呢？因为我既与桂系有历史的关系，又与蒋介石有新近的关系，汪精卫为了应付蒋、桂，就利用我的两面关系，把内政部长分给了我。内政部虽在行政院各部的地位排在第一位，但是一个在各部会中最穷最冷的衙门，从一九二八年四月成立以来，仅仅四年多，就换了十任部长：第一任薛篤弼（馮派），第二任閻錫山（閻不到任，由閻派赵戴文代理），第三任赵戴文，第四任楊兆泰（奉派）。第五任鈕永建（蒋派），第六任刘尚清（奉派），第七任李文范（胡派），第八任汪精卫兼，第九任馮玉祥（馮不到任，由次长彭学沛代理），第十任黄紹竑。从这里很清楚地看出，内政部的地位是专门为调剂各派系的，是无足轻重的。但我却做了三年多，是从来任期最长的一个。我就利用这个地位和时间为蒋介石做了一些似乎于他有利的东西，以争取他的再“信任”。

汪精卫行政院的阵容并不巩固，不久就发生交通部部长陈铭枢的辞职。陈那时是亲蒋的实力派。据说陈早些时候就与一些国民党元老往来，希望用元老的力量来抑制蒋介石的独裁。汪精卫

做了行政院长，陈亦以此相劝，但汪反向蒋告密。而蒋介石对陈亦有不滿，因为：十九路軍自淞沪抗日后就名聞中外，威风十足，陈銘枢更是兴高彩烈，得意忘形。陈为交通部长并能控制十九路軍，而京沪是蒋帮的根本基地，京沪铁路是他們前庭后院出入必經之道，十九路軍駐在那里，他們认为这是莫大的威胁，蒋要去掉陈銘枢并把十九路軍調走，就是意料中的事了。那时我与陈銘枢也頗有往来，他对我說过，他給蒋介石辞职出洋的信中有“知道流之难阻，阻則橫流”的两句話，可見蒋陈双方不滿的情緒。我說：“你走了，十九路軍怎样办呢？”他說：“你不要担心，十九路軍有他自己的生命力，他們自己会把握自己的命运，在苏州开追悼陣亡将士大会的时候我已對他們說明了这个意思。”蒋、汪为敷衍十九路軍和陈銘枢的面子，只說是出洋考察，并不明令撤职。那时蒋介石看交通部是仅次于軍政、財政、铁道的重要部，原来就布置心腹俞飞鵬作次长把持一切，陈出洋后既不便派俞飞鵬代理，更不好派陈孚木代理（陈也是次长，陈銘枢的人），也不好任命別人。汪精卫又利用我的两面关系，以内政部长兼交通部长。上海小报說我紅得发紫，其实内幕就是这样。部里有蒋派的人（以俞飞鵬为首），有陈派的人（以陈孚木为首），我既不得罪那一方面，撤換那方面的人，也不用我自己的人，而是单枪匹马去代他們划押。后来蒋介石利用馬可尼无綫电合同的大舞弊案和招商局碼頭的大舞弊案，把陈派的人搞得很臭，都撤走了，十九路軍也調去福建，其中李立民、賀揚灵却变成了我的干部。汪精卫曾对我說过“季寬先生，你就真除交通部，好嗎？”他的用意是我不好兼代久了，要我让出一个位置分給別人。我也有真除的意思，因为交通部总沒有内政部那么旁、那么冷。但蒋介石不答应，不久就委俞飞鵬代理部务，我只得仍然回

去坐內政部的冷板凳。

一九三二年八月汪精卫突然辞职，跑到上海，后来又迁到莫干山，事前并不告知我們为什么要辞职，而是第二天我們才知道他走了。我至今还弄不清楚汪辞职的原因，据中外历史年表所载“汪精卫与张学良不协，皆請辞职”，也載得不明白，总之，是汪蔣合作后的第一次鬧翻。那时所謂实行“責任內閣制”的那些部长、委员长們，都一起向国府主席林森递了辞呈，南京表面上变成了无政府状态。但事情总得要有人来轉圜，蔣介石就叫我去莫干山疏通，請汪打銷辞意回南京来。我到了莫干山，汪精卫睡在床上見我，并不說明为什么辞职，只用手指着他的肚子說，医生診出是肝脏硬化了，又有糖尿病，很严重，坚决要到法国去休养。陈璧君并阻止我多說話。事情沒有結果，汪終于到外国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在蔣、汪之間所作的調停奔走。他一直到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才回来实践所謂“共赴国难”。以后在蔣、汪合作之間还有不少警扭，双方都是利用我来奔走調停，我也向各方面为蔣奔走調停（内容以后再另文写出）。內政部虽是一个“又穷又冷”的衙門，我却做得津津有味。我除了为蔣介石向各方面奔走之外（那时有人叫做內交部长），还訂了一些各省乐于遵行的法規，还召集了一次全國內政會議，处在半独立状态的广东、广西、四川等省都派民政厅长来参加。这些都是蔣介石認為于他有利的，也是他要利用我的原因，同时也是我在第二阶段里取得蔣介石信任的主要手段。

一九三三年初，日本侵略軍向热河长城进迫，张学良最后不得不抗战。但蔣介石却利用这个机会来倒张学良，接收东北軍（詳細情形見“长城抗战和塘沽协定”一稿），叫何应欽代理北平軍分会委员长（委员长仍是蔣介石的名义），取张学良而代之，叫我当北平軍

分会參謀长，并要我当北平市市长来应付各方面和日本人，我不肯上当。他又叫我征求丁文江当北平市市长，丁文江也不肯上当。塘沽协定后才叫黄郛当北平政务委員长，公开投降，出卖祖国。黄郛也想拉我兼任政务委員，我拒絕了。

塘沽协定后，李宗仁、陈济棠通电譴責蔣介石。蔣介石要我去广州疏通，并且要两广出兵贛南，帮助“围剿”，好让他抽兵北上，准备再度抗日。我与徐景唐（那时的陸軍訓練副監，与李济深有較大的关系，是过去粵軍將領，与陈、李都很熟）为代表，到了广州。广州方面开了一个軍事會議，桂方派总參謀长叶琪参加，粵方以陈济棠为首，其余有粵軍总參謀长繆培南及粵方高級文武人員。我們把来意道达了，在會議席上他們不好公然提出不肯出兵的話，而是用要求补充械彈、補助軍費来刁难。没有什么結果。第二天早上陈济棠邀我一个人到他的公館里去。他手里捧着水烟袋，一面吸着水烟，一面說：“季寬，我們是十几年的老朋友，大家有話，不妨当面直說。我問你：老蔣要我們出兵，是不是想利用共产党把我們的部队在贛南鉗着，好抽出他的軍隊来搞我們囉？我想一定是的。”我笑笑不作声，也就是暗示同意他的看法。他又說：“我老实告訴你，不但日本兵占領了北平我不能出兵，就是日本兵占領了南京我也不能出兵。我們是曾共过患难的老朋友，打开窗子說亮話，請你不要見怪。”我心里想这家伙說話到老实彻底，两广的态度清楚了，我們的使命也就完了。我回南京后，在一次軍事會議上把情形汇报了蔣介石，他听了也不說什么。人們当然会明白一九三六年两广“六一”事变所謂“抗日”的本質是什么，而蔣介石的計劃倒陈济棠也就更急了。

一九三三年的夏天，陈銘枢由欧洲回到了香港，李济深也住在

香港，那时十九路軍已調到福建相当時間了。外間謠言很多，說福建和兩廣要联合起来反蔣。蔣介石又派我去南边走一趟，这回没有什么名义，而是要我私人秘密到南边去看看情况。我到广州同陈济棠等鬼混了一場，回到香港終日同李济深、陈銘枢游泳、吃酒。陈銘枢欧洲回来之后，滿口都是革命的新名詞；李济深也坚决反蔣。那时我想，十九路軍淞沪抗战之后，声望和实力都大大增加了，福建地形也正好搞一个独立王国，老蔣是不容易消灭他們的。这是一个新生力量，为了扩大我的政治市場，不妨同他們拉攏拉攏。其实，我如真肯冒险吃苦反蔣的話，就在广西不出来了。而李、陈他們既然拉攏我入伙，我也加入了。大家認為反蔣不但要有外面的力量，还要在蔣內部有人。我与他們既有悠久的历史关系，在蔣方又能活动，自然是最恰当的人物；如果他們把局面搞得相当好之后，我也会投身进去的。于是我們就計劃組織一个既反蔣、又反共的政党，叫做农工生产党。因为共产党以工人为基础，我們就以农工为基础；共产党要实行共产，我們就主张生产；而蔣介石既不要农工，也不要生产，这样就既可以反蔣，又可以反共了（其实什么叫做共产，什么叫做生产，我們当时还搞不清楚，幼稚得可笑）。由我起草几条綱領，大家同意签名，李济深头一个，第二是陈銘枢，第三是我，交由陈銘枢保管。陈銘枢还說：“我們（指他和李济深）就要到福建发劲了，季寬如果不能馬上來，就派賀揚靈來。”

但是住在庐山上的楊永泰，时常秉承蔣介石的意旨打电报問我的情况，我怎样回复呢？我回电說：閩粵現在还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迫之过急則合而反抗，緩而图之則各自为謀”。这两句話我彷彿記得是与李、陈商量过并經他們同意的，即使沒有商量过，我也那样回复的，因蔣急于图閩或图粵，能設法緩和一下，于閩、粵

和我都有好处,我总想保持閩、粵的半独立状态。楊永泰复电很贊成我的話。但是他再問我如何“緩而图之”呢?我沒有复电,就回到庐山报告蔣介石。有一天晚飯后同蔣一起去散步,他对我說:“季寬先生,你可以作我的高級基本干部。”这是他对我信任的表示。我当时心里想,真慚愧,我身上还夾有一包臭屎沒有打开来呢,可是表面上我只得滿口答应,表示感激。

一九三三年冬天,內蒙德王、云王受日本人的嗾使,鬧內蒙自治,使南京政府大伤脑筋。那时正是塘沽协定之后,由于汪精卫实行媚日外交,既不敢用武力解决,就委我做內蒙宣撫使(赵丕廉为副)到內蒙去宣慰,想用軟的方法解决。我正在內蒙,报載“閩变”爆发了,使我大吃一惊。我同李、陈自香港分手之后就沒有通信,他們事前既不通知我,也无法通知我。我想蔣介石对閩、对粵是两样的:陈济棠虽然做了南粵王,仍然是在国民党旗帜之下,而且沒有有什么大志,尽管仍然是割据一方的半独立状态,作用不大。福建既以人民政府为号召,过早地脫离了国民党的旗帜,不容易得到其他国民党軍閥的同情;十九路軍又有淞沪抗日的声誉,是蔣介石当时的眼中釘,他并知道閩、粵、桂沒有团結一致之可能,势必不顧一切,以全力去扑灭福建人民政府,結果勝負如何,是很清楚的。而我呢,一方面既然与李、陈有勾搭,恐怕阴謀暴露,于我不利,性命难保;一方面恐怕蔣介石要利用我来解决福建問題,叫我帶兵去打福建或当福建省政府主席,我的处境真是十分困难危險。我就立刻派賀揚灵(賀原是陈銘枢交通部的主任秘书,后来跟了我)由內蒙秘密到福州去看看情况再作打算。果然,蔣介石有电报要我到行营去,他要我去是做什么,当然可以想象得到。我以內蒙自治問題尚未解决为詞迁延時間,等到福州已陷,人民政府已垮台,蔣介石

任命陈仪为福建省主席，蒋鼎文为绥靖主任，我才回南京，其实内蒙自治问题表面上早就解决了。贺扬灵也由福州带回李济深亲笔写在一块小綢子上的密信，要我到福州去，那时即使我愿意去，也去不成了，何况我是不愿意早去的呢。但蒋介石方面我还得应付：我到杭州，由航空学校校长徐培根派专机送我到建甌，从那里再乘船去福州，中途遇大雪折了回来。这件事总算被我应付过去，双方都没有得罪，但双方都不满意。难道我与李、陈勾搭，我派贺扬灵到福州去，蒋介石事后就毫无所知吗？果然不久，不知中统还是军统，就有人告发贺扬灵秘密到福州去的事，只说是他私自去，不说是我派去的。但蒋介石并不置理，对我表面上仍然是一样。为什么呢？很明显：广西的问题尚未最后解决，蒋介石还要利用我，实情就是这样。后来有人骂我出卖朋友，出卖福建人民政府。其实呢，我是骗了蒋介石，当然也有对不起朋友的地方，不肯共赴急难，出卖则不是的。我自从一九三一年到解放的前夕，我都是用这种手段在反动政治上混了十几年。（注：以上关于陈铭枢及福建人民政府的事，是与陈铭枢委员谈过才写的，可能还有错漏，请指正。）

在“閩变”以前，虽然我在各方面都“兜得转”，但我除了内政部的冷衙门之外，弄不出什么实际名堂，西洋镜终久要被拆穿。我想远走高飞，我想“取人所弃”。那时马仲英与盛世才在新疆打得不可开交，没有人管，我就提議武装去统一新疆。首先得到汪精卫（长城抗战时蒋、汪二次合作，汪当行政院长）和若干人的支持，他答应拨一千五百万作为筹备经费。蒋介石表面上似乎也赞成，因为我是請调用胡宗南駐甘肃部队的一部和他的一队飞机，这就无异于为蒋介石开拓地盘。我计划军队完全用汽车长途輸送，乘盛（世才）、馬

(仲英)相持的时候突然过去,把两方面都一齐解决,在迪化(烏魯木齊)还有苏炳文、李杜手下的东北义勇軍殘部答应帮助,在我看来,必然馬到成功。在归綏(呼和浩特)筹备大致就緒后,我就到兰州同甘肃省府主席朱紹良和胡宗南軍长商量出发。忽然蔣介石来电报要我停止进行,并立刻回庐山去見他。这給我的打击太大了,几乎病倒起不来。我到庐山去見他,他解释說是因为顧慮会引起外交問題,其实主要是他不放心我,而朱紹良、戴季陶也进了謠言。我知道事情无可挽回,就說身体不好,要辞去內政部长,长期回南方休养。他答应給假三个月,我就回广西、香港去住了一个時間,这又使他不放心,怕我又同李、白搞在一起。

不久,他又打电报要我到庐山去,适值浙江省府主席魯滌平死了,CC、黃埔两系爭得很厉害。他要我去当浙江省府主席,作为两方的緩冲。浙江是他的家乡,省府人事一向都由他直接控制的。他先指定了民政、財政、教育各厅长和保安处长人选,問我有什么人可以当建設厅长?我很清楚,我只能用一个秘书长和一个建設厅长。我还假意地說,原任建設厅长曾养甫就很好,不必更換了。他說,曾养甫还要調其他工作,由你推荐一个人吧。我到任几个月之后才把曾养甫調走了,以伍廷飈补上。很显然,他要我到浙江,是要羈縻着我,又不至搞出什么問題。浙江近在畿輔,在他控制之下,的确也不可能搞什么問題。我在“慰情聊胜于无”的情形之下,也只好将就了。有人認為蔣任命我当浙江省府主席,是极大的信任,事实恰恰相反。

蔣介石手下有三个政治大派系——政学系,CC,黃埔。CC同黃埔班輩低一些,而且有它的严密組織,象我这样的人是走不进去的,我也不愿走进去。政学系那些人年紀大一些,都是身經世故,

反动的政治經驗比較多一些，如楊永泰、張羣、熊式輝、吳鼎昌、陳儀、沈鴻烈等，从表面上看与蔣介石比較亲近，某些重大問題蔣介石也与他們商量，采用他們的意見。CC和黃埔是斗争得很厉害的，两方斗争不能解决的时候，就用政学系来作挡箭牌。因此，政学系也就成为 CC和黃埔的共同斗争目标。一九二六年我以广西一省的力量加入两广統一和出师北伐，蔣介石自然不能以CC、黃埔的地位对待我，而是与楊（永泰）、張（羣）等差不多，我与楊張等也容易接近。有人說我是政学系，我不爭辯，那是客观的存在。但据我所知，政学系并没有什么組織和綱領，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政学系的組織會議，也从来没有看見过政学系的綱領，不过与上面所說的楊、張、熊、吳等人气味相投，来往多一些罢了，而且也不得不同他們多往来。

浙江是上海的后方，“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举国都要加强国防，救亡图存，我在浙江也搞一些所謂民众組織訓練，在城市則搞义勇警察，在乡村則搞保甲和民团。又弄了几百万款子在乍浦（平湖县海边一个市鎮）、嘉兴之錢构筑一条“永久”防御工事，叫做乍嘉錢。后来江苏方面也由江阴到无錫构筑一条，叫做錫澄錢，把两錢連接起来。为什么不可以推前一些呢？除了地形关系之外，主要是淞沪停战协定規定苏州以东不能駐兵和构筑防御工事。蔣介石还調来阮肇昌、刘和鼎、李松山三个师駐在杭、嘉、湖一带，暗地里归我指揮（因我没有什麼軍事名义）。那时我对这些事很有兴趣。

大約是五月間，正当我忙于构筑工事的时候，蔣介石忽然有电报要我到庐山去。我不知道是什么急事。那时浙贛鐵路已通南昌（浙贛鐵路是原先張靜江，曾养甫創办的浙江省办輕軌鐵路——杭

江鐵路,改為中央辦理後延長的),我乘火車到南昌,看報才知道國民政府已經發表我為廣西軍務善後督辦,李宗仁調軍事委員會委員,白崇禧調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這真是一個悶雷,打得我昏天黑地,莫名其妙。南昌報館記者要求接見,問東問西,簡直叫我無話可說。上了廬山,首先去找楊永泰(南昌行營秘書長兼侍從室主任),張羣、熊式輝也在座。我說:“好傢伙,你們这回硬要把媒人婆拉上轎,當做小姐出嫁了。也不問一問她本人愿不愿意,也不問一問男家要不要,這是誰的好主意?”楊永泰笑着說:“橫豎你已經嫁過一次了(指一九三一年曾發表我做廣西善後督辦),再嫁一次還有什麼害羞呢!你還是準備上轎吧!”我又說:“男家不要怎么办呢?”他又說:“我們这里嫁一個到他家里,又从他家里討一個過來,豈不是‘拉直’,兩不吃虧,他們可能會肯的。”我再三說,他們一定不會肯;如果硬要這樣做,一定要打交(即打仗的意思)。他又說:“打就打好了,我們已經準備好了,有把握。”我說:“外敵當前,打仗于國家沒有什麼好處呀。”我堅決不干,終於把他們駁倒了。楊永泰又說:“這都是委座(指蔣)的意思,你去見委座說吧!不干我事。”張、熊在旁邊暗暗偷笑。其實完全是楊永泰出的主意,他認為幾年來一直沒有摸清我的底子,就想借着這個機會使我同桂系破臉。但是兩次都被我擺脫了,打不成(詳細情形見兩廣“六一”事變另一方面一稿)。

第三階段

黃、白互調的計劃不成功,廣西表面雖然象統一了,但仍然是半獨立狀態,我仍然回浙江當我的省主席。不久,楊永泰調當湖北省主席,不但湖北人反對,CC和黃埔也反對。一九三六年冬天,楊永泰被人刺死了,據說與CC有關。蔣把我調任湖北,朱家驊調任浙

江,为什么呢?翁文灏曾任行政院长,是蔣的小同乡,他也不明白,解放后他問我这一段经过。我說:蔣介石一向不滿鄂人治鄂的說法,他尤其不喜欢何成濬。自夏斗寅下台,他就用張羣来接替;張羣內調外交部长,就用楊永泰来接替。張、楊头面大,可以挡得住。楊永泰被刺死后,何成濬似乎非当湖北省主席不可。但何与CC有关系,而楊案又傳說与CC有关。何素为蔣介石不滿,黃埔系又反对。于是就把浙江的“看家狗”拿出来挡一挡。这完全是蔣介石对付湖北人、对付何成濬、对付CC和黃埔的把戏,我不过是一个挡箭牌罢了。

一九三六年冬天,西安事变爆发了。那时我还没有去湖北就任,南京中央党部开紧急会议,以何应钦为首的軍人激烈地主张討伐張学良、楊虎城。我看看风头,也主张討伐,因为照我的地位来看,不能不那样主张。会议并决定任命何应钦为討伐軍总司令。我很清楚,何应钦的主张討伐,是想借張、楊的刀来杀蔣介石。何应钦征求我的同意,要我当他的參謀长,我想,同蔣介石玩够了,同何应钦玩可能好玩一些(其实,他們何尝不是来玩我,大家对玩罢了),我就答应了(但未发表)。但我同时也为营救蔣介石,飞到太原去求閻錫山調停,似乎还记得曾有电报給李宗仁、白崇禧,劝他們不要乘人之危又有什么举动。事后听到某些与陈誠、黃埔方面有关系的人說,我对西安事变的态度表現得很好,可見以前有不少人怀疑我,說我的坏話;其实我是两面三刀。

一九三七年一月,我才去湖北到任,是单身去的,連秘书长也不帶(我在浙江的秘书长黃华表投了CC,不要他了)。事前張羣曾对我說过“暢卿(楊永泰号)那个班底(其实也是他的班底)很不錯”,也就是暗示我不要更換的意思。的确,楊永泰用的那班人都

是有一些經驗、會做官的旧官僚，我全班接受下來，做我的光头主席。后来建設厅长李范一提出了辭職，我才把伍廷飏補上。這是我在蔣介石那里摸出的做官訣竅：不到處打破人家的飯碗，就到處都受人家的“歡迎”，自己也免去下台后的許多累贅。

廬山訓練團是蔣介石利用來實行法西斯統治的機構，一九三三年的夏天就創辦了，一九三四年仍繼續辦理，受訓的都是蔣介石的中央軍軍官。一九三五年蔣介石追紅軍而進據了四川，又在峨嵋山開辦峨嵋訓練團，受訓的主要是四川和一些雲南、貴州的軍官。蔣介石兼任團長（他不論在那里，從來都是自兼團長的），劉湘、劉文輝、鄧錫侯、楊森等當了團附。一九三六年夏天，因兩廣事變，沒有辦理。在這以前，我沒有參加過訓練團的工作。兩廣事變和西安事變之後，一九三七年夏天又在廬山大搞訓練團，範圍比以前更大了。廣東軍、廣西軍、東北軍、西北軍、山西軍，都有高級和中級軍官來受訓，此外還有許多高級知識分子。蔣介石仍然是自兼團長，陳誠任教育長，好些高級軍官任團附。蔣介石要我當第一總隊長，孫連仲第二總隊長。第一總隊隊員都是全國中等學校校長、訓育主任以及其他高級知識分子，共約一千多人。第二總隊隊員都是軍官。總隊下分為三個大隊、九個中隊，大隊長、中隊長、分隊長都是由那時軍長、師長精選出來的，抗戰後這些人特別提拔得快。

一九三五年以前，各種訓練團的主要目的，是“剿共”、“統一”，一九三七年的廬山訓練團仍然是以“攘外必須安內”為中心。也就是說，“安內”就要共產黨投降，就要全國軍隊都聽蔣介石命令，然後蔣介石才能“攘外”。這個口號在當時是迷惑了不少人的，連我在內。

第一总队駐在山上，第二总队駐在山下的海会寺，时常要第一总队到海会寺（陈誠住在那里）去听訓話。上下山来回四五十里，不但那些文人吃不消，就是我也吃不消。尤其陈誠的訓話嘰嘰喳喳不知說些什么，我想我耕的要比他好得多，我很有意見。后来在山上装了一个广播器，每逢陈誠訓話的时候就要集合来听。山上山下的天气是不同的，有时山上下雨，山下却是好天。我推說听不清楚，沒有集合队伍在雨下听他的訓話，陈誠对我很不滿意。錢大鈞对我說：“薛修（陈誠号）对你很有意見，你知道吗？”我說：“我知道，算了吧，由他去。”我一直不把陈誠放在眼內。我知道同陈誠搞不好，那期訓練尙未結业，我就推說省里有事要回去处理，蔣介石也就批准了。

我到湖北几个月，預料到武汉将来一定是抗战的中心，就在武汉的外围如信阳、田家鎮、黄石崗等处筹备构筑一些国防工事，准备以后的抗战。

第 四 階 段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不久，蔣介石在庐山召开全国名流會議，准备全面抗战，我被召去参加。其实蔣介石那时仍然是想妥协的，他的通电中那两句話——“和平不到絕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輕言牺牲”，就充分表示出来了。“八一三”上海事变发生后，蔣介石知道不能再妥协了，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名义召开国防秘密會議（地点在国民政府新建大楼上，由蔣介石主持的會議从来不在那里开的），决定全面抗战，国民政府发表自卫宣言。蔣介石以国民政府軍事委员会委員长的名义統率陆海空軍对日抗战，組織作战机构：在軍事委员会之下設六个部，为对外保守秘密起見，称为第一、二、三、四、五、六部。第一部是主持作

战计划的,以后都叫做作战部,蒋介石要我当作战部部长。为什么呢?一方面是由于我曾当过长城抗战时北平军分会的参谋长;一方面是由于我与桂系的关系,和其他各方都有一些人缘,必要时好从事调和。那时蒋介石、何应钦对某些方面、某些人应给予什么名义,还抓得很紧,为了团结抗战,我不免提供一些调和意见,他们也接受了。

作战部是创设的组织,当初很不健全,只有我与副部长王俊、刘斐(刘是李、白推荐的),还有几个高级参谋。蒋介石从来就是自己直接指挥作战惯了的,我这个作战部长不过是把他的面谕或手谕拟成命令发布下去,或汇集各方面的情报向他报告,可以说我的作战部长不负什么责任。我对军队情形很不清楚,蒋介石的军队秘密账都操在陈诚的手里。蒋介石对我说过,“有些你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去问问辞修(陈诚号)。”那时陈诚也在南京,我心里想,既然这样,这个作战部长就让陈诚做好了,好些人也有这个意思。其实陈诚未到南京以前,已有电报给蒋介石反对我当作战部长,说我“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那时我已有意辞去作战部长职务。

大同失守之后,蒋介石要我到山西去走一趟。我在太原遇到一些八路军将领,八路军正由太原向雁门关增援。那时阎锡山住在雁门关,一天晚上我去见他,适逢彭德怀元帅也坐汽车去雁门关,半路上遇到敌人夜间空袭,汽车不敢开行,大家躲在路旁的小屋谈了一会。我在回南京的路上,就听到了平型关八路军反攻大捷的消息。我回南京将山西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想要我当山西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帮助阎锡山,征求我的同意。我心里很明白:这是陈诚反对我,想借此使我离开作战部,同时又好在阎锡

山方面插一个所謂中央的人,而閻錫山对我是不好反对的,岂不是一举两得。我答应了,继任的是与閻錫山有关系的徐永昌,似乎也有交换的作用。徐永昌不論在什么會議上問他的意見,一向都是以“咱没有什么意見”作答的。他作官的能耐真大,一直当到抗战胜利,并代表中国去日本受降。从这里人們就不难想見蔣介石对这作战部长是怎样看待的了。

我到太原首先碰到的,就是第八路軍的彈藥补充問題。那时虽是全国統一、全面抗战,而山西晉軍的軍隊的武器彈藥补给則是独立的。因为閻錫山从来不肯把他的兵工家底交給中央,所以他的部队械弹补充就由他自己包办,而且他的步机枪口径都是六米厘五,南京也无法补充。那时在山西方面作战的,还有中央軍、陝西軍(楊虎城部下赵寿山、馮欽哉)和第八路軍,都是归南京补给的。第二战区的兵站业务由南京派一个兵站副监卢佐去主持(全国兵站总监是俞飞鵬)。有一天卢佐为了第八路軍彈藥补充問題来請示我,因我初到时还戴着作战部长的头衔。我說:“这是你职务上的事,为什么要問我呢?”他說:“如果是其他部队(指中央軍),就没有什么問題。但是,这是共产党的軍隊,而且要的数量相当大,按編制他只有三个师,所以才請示您。”我很惊讶,我說,“这是全国全面抗战,彈藥补充还分什么彼此呢?而且我看見第八路軍士兵身上只有一条子弹帶,恐怕一个基数(六十发子弹)还不到,过去的底子太少,又經過平型关战役的消耗,他們的編制虽說是三个师,恐怕六个师还不止呢。你按可能尽量地发吧。”我这些話,他当然要报告蔣介石的。

那时山西战場以忻口(忻县北数十里)为主,归閻錫山指揮;以娘子关为副,我任指揮,不幸都相繼战败了(詳情見另文)。閻錫山

埋怨說，忻口战役的失敗，是由于娘子关方面先失敗的影响（这里我不想辯白），从此他对我就有意見。尤其是在忻口、娘子关失敗之后，他要把两方面的几十个师去固守太原，在太原綏靖公署的會議席上，我不贊成这个計劃，爭論得很厉害。他非常坚持，他最后說：“軍隊已經行动了，要改也无从改起，就照这样吧。”他說完，就上汽車离开太原，把太原城交傅作义固守，也不告訴我到什么地方去，把我丢在綏署會議厅上，电灯也灭了，也不給我留一部汽車，真是我平生作战最狼狽的一次。我还打电话給南京的錢大鈞（侍从室主任），把情况說明，要他报告蔣介石。我黑夜里同几个卫士步行摸出太原城，摸过汾河桥，第二日才在交城附近找到他。我說，太原恐怕不能久守，要早作外围的布置。他大不以为然，他說：“我坚信宜生（傅作义号）有办法，至少可以守三个月以上。”我不說什么，就到灵石县方面去收容那些潰下来的川軍，那方面只剩下那些殘敗的川軍，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再过几日，太原就失守了。我同南京通电话，說明情况和我的困难，認為我在山西已没有什么作用了，請准我离开山西。蔣介石答应了，我就回到南京。錢大鈞对我說：“委員長为了第八路軍的弹药补充問題对你不滿。閻錫山在作战上对你不滿，就更不必說了。我觉得你回来是好的，不然的話，以后更搞得不好。”我說：“关于第八路軍的弹药补充問題，我只是凭抗战的良心对卢佐說了那些話，发多发少还不是由他作主么？”他說：“你不知道其中还有政治問題呀！”我說：“政治問題我就知道了，那时我只知道要抗战。”

我回到南京，正是上海战場潰敗的时候，敵軍占領了苏州、嘉兴，向南京、杭州进迫。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驊吓得要死，呈請辞职。南京已开始最后的撤退，蔣介石又要我去当浙江省主席。我

想：浙江地处前方，如果把民众发动起来、組織起来、团结起来，于抗战是有利的；以前蒋介石把浙江的人事抓得很紧，没有什么做头，以后的情况不同了，“山高皇帝远”，总可由我放手做去，因此我同意了。我当作战部长和到山西当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期间，仍然兼着湖北省政府主席，这时才另委了何成濬，我要回武汉去交代。周恩来总理是我在大革命时代就認識的，在山西抗战又碰了几次面，那时适值他也在汉口。我去找他，一方面是想知道山西方面的最近情形，主要是想請教他关于发动民众、組織民众、团结民众的方法。共产党发动民众、組織民众、团结民众的方法是著名的，我知道国民党的老一套是不行了的了，想学一学，并且請他以后派一些人去帮忙。他答应了，并不指明是那一个，当然不止一个。我到浙江后，他們给了我直接或間接的帮忙。

第五階段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我到浙江的时候，杭州快要淪陷了，不久就退到金华。那时安徽、江苏、浙江、福建都归第三战区范围，顧祝同当战区司令长官，浙江前綫部队有湘軍刘建緒所部防守錢塘江南岸，桂軍廖磊所部防守于潜、分水、桐庐之綫，都是由上海战敗、轉移过来的。不久桂軍忽然調走了，原因不清楚，不知是不是怕我和桂軍搞在一起？其实桂軍留在浙江前綫同我配合，所起的作用可能会大一些。

那时我没有什么軍事名义，我就用省政府的地位从事发动民众的抗战宣传。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我在临时省会永康召开了一个全省士紳會議（包括各县党部、商会会长、大士紳），想利用他們去发动民众，但没有什么效果，因此我就进行青年政治工作队的組織。那时由上海退下来的爱国青年組織，如杜国庠同志率領的

宣传队，都逗留在金华。我就学他们的样子，亲自到各县去发动组织，把那些在校的或由上海、杭州各地退回来的青年都组织起来，后来连沦陷区都有政治工作队的组织。那些青年真是可爱可敬，不但刻苦耐劳，而且勇敢牺牲，在抗战期中牺牲的，据不完全统计就有一百余人。政治工作队的迅速发展，是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其中有些是共产党员。抗战以前，我到各县去，专门是与县党部委员、商会会长、大绅士接近；抗战后作风变了一些，喜欢同青年接近，对那些县党部委员、商会会长、士绅们，并不是完全不理他们，而是比较冷淡了一些。当各种工作做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大约是一九三八年六月间，忽然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劈头就说本任政府声名狼藉，要我切实注意。我想我到任仅仅是半年，还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怎样就会弄得声名狼藉了呢？我在蒋介石底下搞了将近十年，从来没有受过这样严厉的责备。我愤慨极了，就马上打电报去辞职，而复电却是慰留，内中有两句话说是“耳有所闻，则以之告”。不难想象，他所谓“所闻”，当然是党部、商会、士绅说我的坏话了。

我与蒋介石关系的恶化，一开始就到达了高潮，以后的斗争一直不断的进行着，原因当然不仅仅是上所面说的那一点。抗战以前，我在蒋介石底下当过两次不能到任的督办，当过几年部长，当过两省政府的主席，无非是想骗取他的信任；好不容易挨到抗战，满以为可以在抗战中做一些事情，出出风头，不料作战部做不三个月，去山西抗战又碰了回来。他要我再做浙江省主席，我想这回可以放手干了，但是浙江从来就是三大势力——CC、黄埔、士绅把持的，蒋介石在上面又抓得很紧，省主席如果不是他们的人，就等于傀儡。我不愿再当傀儡了，首先想在省政府人事上突破。以前民政、财政、教育各厅长和保安处长都是他指定的，省党部主任委员就更

不必說了（那時各省的省黨部主任委員都由省主席兼，獨浙江例外）。我就先從民政、財政着手，把民政廳換了以前內政部司長、後來在浙江當專員的王先強（王先強是比較進步的），又用了幾個比較左傾的縣長，那些縣長又引用一些進步青年，其中也有共產黨員。財政廳換了以前內政部司長黃祖培，他秉承我的意旨，开辟了一些稅目，增加了一些收入，供我創辦兵工廠、建立自衛隊之所需。建設廳長是由廣西、湖北帶過去的伍廷飏，他也引用了一些進步青年，也有共產黨員在內。這樣就使素來在蔣介石掌握之下并為CC、黃埔、士紳所把持的浙江，总算被我打開了一個缺口，並且以後還想繼續擴大，他們当然是要譁然了。

全省士紳會議后的效果是不大的。我覺得在國家空前大變的全面抗戰時期，政治上必須一個嶄新而為大眾所擁護的政治綱領，作為政府與人民共守共行的准繩。這本來是應該由中央政府制定公布的，但那時中央正在忙于播遷，還沒有時間來考慮這個問題。而浙江地處前綫，浙西杭、嘉、湖既已淪陷，浙東亦動蕩不安。為安定人心、動員民眾、培養實力，以貫徹中央抗敵自衛的國策，我急不及待，就決定了一個“浙江省戰時政治綱領”十條：

一、浙江省為貫徹中央抗敵自衛之國策，在現階段之政治設施，以動員全省民眾，參加抗戰，創造新的政治及軍事力量，保衛浙江，收復淪陷土地，爭取最後勝利，為一切努力之總方向。

二、調整各級行政機構及地方抗戰自衛組織，培養民主精神，領導民眾運動。并絕對澄清吏治，鏟除貪污，提高各級軍政人員之戰鬥意志與技能，厉行戰時嚴格的自覺的新風紀。

三、對戰時人民之負擔，以有錢出錢、務求公平為原則，嚴禁一切借名苛派。設法減輕地租，改善平民生活，減免戰區田賦，另

筹战时費用,并节減行政經費至最低限度。

四、調整物产,保証战时生产品自給,活跃社会金融,逐步推行公营及管理貿易,振兴民間手工业,以救济失业,增加生产。禁絕日貨,取締奸商投机操縱。

五、健全交通組織,实行水陆联运,并負責軍运民运,严禁拉夫、扣車、扣船等情事。

六、实施战时青年及政治工作人員訓練,提高其民族意識,強化其战斗精神与技术,养成政治及軍事上之新干部。

七、国民兵役之推进,当改良其方法,严厉懲办借抽征壮丁枉法舞弊之各級人員。出征軍人家屬之贍养与保护,伤亡将士之撫卹,地方政府应予切实执行。

八、发动并統一全省文化界救亡工作,号召文化人回乡服务,推广战时民众教育,普遍提高人民之政治認識及文化水准。

九、以国民抗日自卫軍之統一組織与领导,动员及武装民众,坚强人民之抗战精神与自卫力量。

十、巩固抗日陣綫,加紧肃清汉奸,凡背叛或脱离抗日陣綫者,政府得征发或沒收其财产,佃戶对之得不納租,債戶对之得不償債。

这个战时政治綱領,是汇集各方面的意見拟訂的,在一次省政府扩大會議上(包括省党部各委員、高等法院、高等檢察長)通过的,并呈請中央备案,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公布。这个綱領公布之后,配合我所組織的政治工作队大事宣传,不仅在浙江起了一定的作用,即当时全国政治中心的武汉各报亦都以显著的地位来登載,作好的評論。但是另一方面也引起不少坏的批評:說为什么中央的抗战綱領还没有制定,浙江省先单独制定?名称为什么

不用施政綱要而用政治綱領，豈不是想把浙江當作獨立王國嗎？對內容也有批評。加以對於人事上的不滿，這些怪話都向蔣介石控訴。蔣介石對這綱領大體上並沒有說什麼，只說末尾的關於鞏固抗日戰綫的一條欠斟酌。

自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就開始進行長期殘酷的國內戰爭，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中國共產黨毛主席發出團結抗戰的號召，朱德、周恩來等到南京協商抗敵，才停止下來。但這僅是延安方面中共的主力武裝參加了山西方面的戰役，而閩浙邊區的問題尚未完全解決，在團結抗敵偉大號召之下，雙方都要設法解決這些局部問題。我到浙江之後，也首先設法解決這個問題。以劉英、粟裕為首的閩浙邊區，是以浙江的平陽縣、泰順縣和福建的福鼎縣為根據地的。那時國民黨中央已有意把這部分武力與其他合編為新四軍開赴皖南擔任敵後游擊任務，戰鬥雖停止了，但國民黨劉建緒部隊仍然包圍着對峙着。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間，我去武漢出席國民黨的臨時代表大會，與周恩來見面時曾談過這個問題。我回浙之後，中共方面就派吳毓、黃昂為代表同我商談。我商得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集團軍總司令劉建緒的同意，由我作為中間人，到平陽縣去與中共商談。中共的代表三個人，吳毓、黃昂之外，另一個名字記不起了。當時商定了四點：一、所有他們的武裝部隊，完全離開閩浙邊區，到蘇皖的敵後去擔任游擊工作，並確定由浙赴皖的路綫；二、他們的部隊通過時，國民黨軍隊及地方團隊不予為難，並予以補給上之方便；三、他們留在後方的家屬、政府（指省政府），保證其安全，但不能再有政治活動；四、准許他們在麗水或溫州設立辦事處。這些約定並沒有文字的簽訂，只是口頭上彼此同意。我隨後並派人送了一些錢給他們作開拔費。不久他們的部隊就由平

阳、瑞安、丽水各县的边境到丽水属上游的大港头鎮集中。那时我正在碧湖(丽水属,与大港头很近)訓練团,粟裕、吳毓和另一个人到碧湖去找我,并邀我到他的部队去談話。我答应了,还留他們在訓練团吃了一頓午飯。他們的队伍只有六七百人,枪枝不很齐全。我无非是說了一些团结抗战、預祝他們成功的話。他們部队的行动很神秘,不但他們由平阳开来大港头我事前不知道,就是以后怎样經過浙江好几个县份到达皖南的,連各地方都不很清楚。

一九三八年六月以前,也就是我到浙江仅仅半年的时候,我只是做过这几件事,这难道都是坏事嗎?怎样就弄得“声名狼籍”?我不可解,我不服气。虽然蔣介石慰留我,我的辞意仍很坚决。我打电报給蔣介石要到武昌面陈衷曲,他答应了。我就到武汉,托病住在武昌东湖疗养院。我去見蔣介石面陈辞职原因,他說話的大意是:“你自去山西作战回来,逢人就說八路軍紀律好、长于游击战,共产党如何动员民众、团结民众、軍民配合的好話,各級党部、黃埔学生、士紳等听了自然不服气,要說你的閑話。你的战时政治綱領和用人方面,都有令人(指CC、黃埔、士紳)指責的地方。我打电报給你,无非是使你知道說閑話的人多了,要你注意,并希望你能改正,你仍回去,不要再辞。”我辞意并未打消,仍然賴在东湖疗养院不肯回去。适值李济深閑着,也住在那里,不久李宗仁由台儿庄回来,也住那里,白崇禧也时常到来閑談。有一天陈誠来看我們,他笑着說:“你們几个广西佬住在一起,外面惹出很多閑話,十分刺耳,我来赶你們出院。”的确,我們也知道香港方面造我們的謠言。因为李济深閑着沒事,我又呈請辞职。李宗仁也因为自台儿庄战后,魯南、苏北已被日本軍占領,第五战区实际上也不存在,蔣介石有意迟迟不划給战区。这些在外人看来,都有政治問題的存在。也

可能是蔣介石因为桂系关系，不好答应我辞的原因。

辞职既然不准，在全国抗战局面之下，久赖在那里，良心上也有所不安。我把浙江当前应该解决的问题作成书面，请他批准，中间有一条是准我继续组织和发展青年政治工作队。他说：“青年是要组织的，但在国民党中央的青年组织（指三民主义青年团）没有健全以前，你组织起来岂不是替共产党组织，供他们利用？以后一定要由三青团统一。”后来浙江三青团成立，就把那些政工队接收了，还来一次大集训，那些进步青年都退了出来或被淘汰，也有个别被捕的，吴山民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三青团是黄埔系的势力范围，同CC系的省党部一样，是不要我参加的。他还要把民政厅长王先强换成CC系的阮毅成，似乎县里用人不当都要王先强负责，其实是拿他作替罪羊。阮毅成人很圆滑，一半应付CC，一半应付我，双方拉个直，这一波算是平下去了，另一波就要起来。

第六阶段

抗日自卫团总司令部是抗战时期各省地方军事机关，由省主席兼任总司令，是全国性的，但有些省份没有组织。我回浙江后，不久武汉失陷，政府迁重庆，山高皇帝远，蒋介石管不了我许多，我就利用这个组织办理兵工厂，扩充自卫队。那时浙江前线只有刘建绪集团的部队，兵力不敷分配，因此战区方面也希望扩充自卫队，我仅是负组织成立的责任。但指挥调遣则属于战区长官司令部，省自卫队与省保安队是两个系统，省保安队是属于黄埔范围的保安处长。因此，我一意扩充自卫队，没有扩充保安队，与黄埔系也发生摩擦。

一九四〇年冬天，杭州的敌人渡江占领萧山附近的桥头阵地，而担任那个地区防守的是自卫队的一个团，在整个战局中，一个地

点的得失本来就算不了什么，說得更明白一些，防守的部队就是国軍，也是守不住的；不然的話，全国就不至有那样多地方淪陷了。但是另有用心的人把責任都归咎于我的自卫队。省临时參議會成立了，那些參議員都是有勢力的士紳、銀行老板和 CC 分子，他們見敌人一时沒有向金华方面进攻，在开会的时候就有人用“萧山事变”向我提出質問，說用了多少錢办兵工厂、扩充团队，結果連“錢塘天險”都守不住，要我負責。当时我想，如果以萧山那点点地方失守了，就叫“萧山事变”，那末，全国不用說了，就以浙江而論，杭、嘉、湖整片的淪陷又叫做什么呢？又要誰来負責任呢？但我不好說出来，我只是向他們解釋，他們也知道站不住脚，不过是借此向我表示不滿而已。

一九三八年年底我去重庆出席中央會議，有一天李济深約我到神仙洞他家里茶会。座上有馮玉祥和中共方面的周恩来（那时是政治部的副部长）、秦邦宪、陈紹禹、叶劍英、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也在座，一共有十几个人，大家都是談些当前的团结抗战問題。我最記得秦邦宪說的一句話，他說：“蔣委員長时常說‘以不变应万变’，我觉得‘以不变应万变’是不合邏輯的，是行不通的”。还有很多人发言。我也把浙江的情形談了一下。馮玉祥說：“这才算是抗战工作！”周恩来副部长說：“現在到处都发生摩擦（指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間发生摩擦），只有季寬先生那里还没有发生摩擦。”我心里想，我为这个問題不知受了蔣介石和地方多少气，摩擦迟早都会发生的啊！他又說打算到浙江去看看，我表示欢迎，并說最好一同前去。这一次集会在我本人看来，是偶然的，但是有意挑剔的人看来則是預先約定的。后来我又与周同車去浙江。

一九三九年春天，我同周恩来副部长由桂林乘浙贛鐵路火車

去浙江。同車的有新四軍軍長葉挺，是交過手打過仗的，那時見面，倍覺熟落，真是“聞名不如見面”，現在寫起來則是萬分的慚愧！火車到了江西的橫峯，葉挺就在那里下車到他的部隊去了。我同周副部長到了金華，他是中央政治部副部長，我是省政府主席，自然要盡招待的義務。我請他同車去麗水看兵工廠。CC系的東南日報就以“黃周同車到某地”為題大作其新聞，當然這在他們看來是很刺眼的。我們到工廠看了之後，我還請周副部長對工人講話。他的講話受到工人的熱烈歡迎。我發現麗水、雲和兩縣黨部的主任委員都來到那里，我問你們來做什麼？他們說：“金華電話通知我們，周副部長到這里，我們來歡迎。”我心里好笑：他們的消息真靈通，馬上就追蹤來了！他們的用意我很明白，真是來歡迎嗎？但我不好說什麼。

周恩來副部長要到紹興去看看他的家鄉，然後再到浙西天目山，那里設有省政府浙西行署，布置敵後的抗戰工作。賀揚靈是行署主任，正在召開淪陷區政治工作隊會議，我也到那里參加。我同周住在山上一個上海潘姓商人的別莊，我請他對淪陷區政治工作隊作了一次訓話，住了幾日他就回去了。我回到金華，蔣介石忽然有電報問我同周談些什麼，其實我事前並未奉到電報要與他正式商談，要解決什麼問題，而只是就浙江方面為便于以後工作談了幾點，是：（一）請他指定一個代表人，遇有問題發生可以商量解決。他當初曾似乎提到汪兆泰，但他想了一想，又說還是吳毓吧，因為吳毓同我一向接頭，是很熟的，汪兆泰不知是什麼人，我始終沒有會過面。（二）我要求中共參加地方工作的人員，只能在工作崗位上努力，不可發展組織，我並要求他將共產黨員在浙江參加地方工作的名單開給我，這點他並沒有答應。（三）中共在我後方地區不

能发展武装組織。其实那时浙江境内，不但我后沒有中共武装組織，即敌后也沒有中共武装組織（四明山的三五支队是一九四二年以后敌人大举向浙赣路进攻，占領浙南各地，才由錢江北岸（通常叫海北）轉过来的，那时我已不大管事了），当时我就将这个情形回复了蔣介石。可見当时蔣介石对周行动的注意和对我的怀疑。（注：这段經過，我在十八年前写的五十回忆也是这样写的。現在仍然照样写出来，不知是否正确？）

談到浙西行署主任賀揚灵，这里順便补述一下：賀揚灵原是陈銘枢交通部任内的主任秘书，以后一直跟着我，在浙江、湖北做專員、行署主任。一九三四年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我曾派他帶信到福州見李济深，后来被人告发，但結果并沒事，不知是什么原因，后来我怀疑他那时候已被收买了。抗战后他在浙江当專員和行署主任，表面上对我忠实，暗地里則与CC勾搭。蔣介石电报問我同周恩来談什么，似乎是他的报告。后来我办的浙江民族日报的被軍方搜查，黄文适同志被捕，可能都是他搞的鬼。解放后在北京有一次周总理对我說：“你看賀揚灵这个人怎样？”我說：“恐怕是特务”，周总理点点头。因为我从浙江下台之后，賀就回南京中央党部当第五处处长，那是高級特务組織。

一九四一年夏天敌人占領紹兴、諸暨，CC的东南日报就以政治不能配合軍事为題目大做文章，把一切失敗責任都归咎于地方行政人員，紹兴区專員邢震南被蔣介石判处死刑。但是負那地区作战責任的軍长、师长却不受一些处分，这明明是作样子給我看。我气极了，又呈請辞职，仍然不准。我对顧祝同說：“我的政治与軍事实实在配合得不好，請你帮帮忙，推荐一个配合得好的人，好让我下台。”顧說：“你忍耐一些吧！你这样大的鬼，也要找到那样大的庙，

才摆得下呀！’我仍然拖下去。

一九四一年春，“皖南事变”发生，浙江方面也有些人被捕，浙西日报总编辑王文适、浙江妇女会秘书林秋若（后改名林琼）是我知道的两个。在此之前，王文适曾因民族日报被军方搜查向我申诉，因民族日报、浙江日报都是我办的。我劝他忍耐，我说：“如果弄得不好，他们（指军方）也会将我自卫队的枪都缴了，我有什么办法呢！”他们被捕后，被送入上饶集中营。一九四二年敌军大举向浙赣铁路进攻，三战区长官部撤退到福建的建阳。我到重庆开会，路过那里，趁机第二次要求顾祝同保释王文适和林秋若，宕了许久，总算准了。保出来，但王文适已经病死了。我对林秋若说：“你回浙江恐怕还有危险，还不能很自由，不如跟我到桂林去吧。”她就同我乘车到桂林，同车的还有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吴挹峯（CC系），他到重庆就大造谣言，说我同一个女共产党员到桂林，重庆的浙江人更是譁然。

我到重庆除参加中央党部会议之外，还参加了孔祥熙主持、财政部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它主要的目的是要统一四川和云南的财政。他们邀我说话，我主张地方财政要有相应的独立，省政府才有些事可做；如果由中央完全统一，地方就一事不能办了。我这些话都是与那次会议的主旨相反的，他们很不高兴。

由于浙江财政相当独立，又巧立一些名目，弄了不少的钱。我都拿来扩充团队和办理兵工厂。到了一九四一年，省自卫团队就扩充到廿一个团，还有两万多县自卫团队，一省的财政力量养这样多的团队，人民自然觉得负担太重，发生怨言，更有一些人造我谣言，说我扩充私人武力，准备造反。凡遇战役失败，省临时参议会都有人以团队糜费无用为词来攻击我，似乎战事的失败都要我

負責。其實我只是團隊的建立者，而不是作戰的指揮者。如果說地方團隊一定要守必固、攻必克，那麼在整個抗日戰爭的喪師失地，又叫誰去負責呢？我見情形太複雜了，責任太重大了，就請中央派員來協同整理。蔣介石就派他的親信俞濟時來改編成為四個師，俞濟時任集團軍總司令。浙江省抗日自衛總部亦於一九四一年年底撤銷。

我辦兵工廠原是為了自衛團隊械彈的補充，由起初的二十多部爛機器發展到一千多部，可以造步槍、機關槍、迫擊炮、迫擊炮彈、翻造槍彈、炸彈、手榴和槍榴彈等，浙江的團隊用不了，還賣給國軍和各省。很多人就造我的謠言，說我破壞中央兵工統一政策，說我準備造反，要求中央接收。我向蔣介石解釋，要求我自辦。他當初還好說：“好好！你就由你這樣辦下去。”

一九四〇年在南岳召開軍事會議的時候，我帶了一些武器樣品到那里去試驗，邀請到會的將領去參觀。陳誠就對我說：“黃季寬，你已經成為軍火商人了，你是不是想要向我們推銷生意？”我說：“在抗戰時期自己能製造一些軍火出來，不要再買外國貨，也是值得做的買賣呀！”但是他們總不放心，借着種種問題要來接收，並且說浙江太近前線，容易賣敵。一九四二年的春天，軍政部就派人來接收，搬遷到福建去，一年多還沒有裝置起來恢復生產。

我到浙江四五年来所办的認為與抗戰有益的幾件事——組織青年、擴充團隊、辦理兵工廠，樣樣都被接收了，我只好辦辦省政府日常公事，或者是填填詞，寫寫回憶錄。我的情緒消極到了最低潮，也就是蔣介石對我的信任到了最低潮，後來弄到任命一個省政府委員我都不知道的地步，要走又走不了，只好宕着等待抗戰勝利吧！

一九四五年秋天，我正在福州養病（一年以來我多次到福建

去养病),广島、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了,苏联对日宣战,苏軍歼灭日本关东軍,日本投降,抗战总算胜利了。我也由福州回到浙江,回到杭州,处理一些善后問題,并且决定辞职。我深知道蒋介石胜利后一定要把我扔掉的。

第七階段

一九四六年五六月間,蒋介石回到杭州,我向他当面辞职,他仍然是慰留我,要我繼續办理胜利的善后。那时旧政治协商會議还没有破裂,我办的浙江日报还登載拥护政治协商會議等口号。蒋介石見了大怒,陈布雷秉承他的意旨,把浙江日报社社长严北溟(农工民主党成員)叫去大罵一頓。他說:“政治协商會議不过是暫时的,你們不要随便宣传。”其实战区里早就接到国民党中央关于破坏政治协商會議的指示。不久就包围浙江方面四明山三北地区,要共产党的武装“三五”支队撤出該地区,并在中途袭击,內战就再开始了,我的去志更加坚决了。我飞重庆再面向蔣辞职,仍然是慰留。临回的前晚,他請我吃飯,仍沒有准我辞职的表示。我飞回上海,一下飞机,就接到免职的电报,我恨极了。恨的是,既然不要我,昨天晚上当面就准我辞好了,为什么当面不准,等我一走上飞机,就来一个电报免职呢?明明是对我开玩笑。我把浙江交代給后任沈鴻烈,就到上海作我的寓公,閑了打打网球,同一些“白相人”或一些“閒人”来往。有人說抗战时期我在浙江整做了八年是蒋介石的信任,其实是整受了八年的气。

第八階段

自那时起,国民党軍隊虽然在各地方对解放軍进攻,但大局还没有完全破裂,共产党代表团尚住在上海馬斯南路的某号。某天有个广西同乡姓楊的来找我(名字記不起了),以前我并不認識,他

自我介紹，說是柳州人，是軍人，曾入过我办的南宁軍校，是共产党员，是代表团的高级参謀。我很詫异，問他找我做什么，他說不过是以同乡的关系来看看我。我也很乐意同他談談。那时各地正在混战，国民党軍隊正在到处失敗。他說蔣介石一定失敗，共产党一定胜利，意思是暗示我不要再跟蔣介石走。我問他：“周恩来先生也在上海么？”他說，有时也在。那时我本想去看看周先生，但在当时情况之下我不敢去。以后大局破裂了，共产党代表团撤走了，房子被封了。解放后这位姓楊的同志做了广西省人民政府的副秘书长和专員。自从与这位姓楊的同志談話之后，加以各方面情况的急剧变化，我觉得如果大打下去，蔣介石一定完蛋，国民党一定也跟着完蛋。为了挽救国民党，好让自己混下去，我就主张作最后的和談。适值张羣从美国回来，我把这个意見在上海同他談过，他去南京后我又写了一封信专人送去，希望他能作代表去延安作最后的和談，但沒有得到回信。

一九四七年四月，蔣介石改組南京国民政府，容納青年党曾琦、左舜生、余家菊、李璜，民社党张君勱、湯薌銘、戢翼翹、徐傅霖等参加；此外，代表新疆維吾尔族的包尔汉，代表藏族的章嘉活佛当国府委員，算是联合政府，我也是国府委員中的一个，又混了半年多。一九四八年四月，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召开了，蔣介石当选为总統，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統。李宗仁竞选总統，是桂系与蔣介石政治上的最大最后的一次冲突。我帮助李宗仁作竞选（詳情見另文“李宗仁的肮脏竞选”），使蔣介石的威信受到特大的打击，他恨透了我。

蔣介石当选总統之后，就实行“宪法”，改組了所謂联合政府，又任命我为监察院副院长。天呀！象我这样的人在反动政治上，应

該是被監察院的老爺們提出彈劾的對象，反而當了副院長，去監察人家，豈不是笑話，這不過是蔣介石想再來騷擾我一下就是了。在我說來，官兒不小，不妨也做一做過癮。那時張羣當行政院院長，把各部部长名單請蔣介石任命。名單里我是糧食部部长，蔣介石問張羣有沒有事前征求過我的同意，張羣說：沒有，也用不着征求他的同意，就請總統下條子發表好了，他一定會同意的。”蔣說：“不見得吧，還是先問問的好，免得發表了他又打回來。”蔣介石可能是鑒於我一九三六年不肯就任廣西軍務善後督辦和討伐李、白的總司令帶兵去打廣西，加之我在抗戰時期和勝利之後的種種行動引起了他的懷疑，他不信任我了。後來張羣就叫徐堪來征求我的同意，我拒絕了。徐堪說：“憑你同岳軍（張羣號）那樣厚的交情，在這緊要的關頭，你無論如何都應該幫幫他的忙。”我說：“糧食我是外行，內行的人多着咧，為什麼一定找我做？正當軍事緊急的時候豈不是要誤事，我堅決拒絕。”其實我那時心里想，這是（指糧食部）最易招受人民怨恨、費力不討好的東西，抗戰時期的“征實”還搞得天怒人怨，這回情形根本不同，弄得不好，共產黨勝利後還要把我當戰犯，受人民的審判，我還能混嗎？我以後還要混下去，我決不肯上這個當，我寧願當不負責任的監察院副院長。

我住在上海，不時到南京去走走，住在白崇禧家里，有一次同他和韋永成、程思遠等暢談時事。白崇禧他們平時對蔣也有很多不滿，我就趁機說：“蔣介石主張內戰，我們（指桂系）應該同他相反，主張和平，等蔣介石戰爭打不下去，人民要求和平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起而代之。當初德鄰（李宗仁）競選副總統的時候，他同意我的主張，我才幫他競選。這樣，桂系在政治上就有出路了。我主張同共產黨合作。”談到最後，白崇禧說：“話雖然是如此說，但我

素来是‘汉贼不两立的’。”他說完了這句話，就上樓去睡了。我見他說得那樣決絕，我對他很絕望，以後一直沒有同他談什麼政治問題。我現在還不明白白崇禧為什麼要說“漢賊不兩立”的話。

李宗仁當選副總統之後，蔣介石不但恨我，也恨白崇禧，總想把白崇禧的國防部長換給陳誠，好去“戡亂”。適值武漢緊急，就任命白崇禧為武漢“剿共”總司令。白崇禧當然很不高興，以為這是蔣介石對於他幫助李宗仁競選的報復，也是對桂系內部的離間。果然白的老婆就對李宗仁不滿，說：“你當了副總統，却把我丈夫的國防部長來作犧牲。”白崇禧跑到上海不肯去就職，表示抗議。

自從李宗仁當選副總統，蔣介石一直不理我，新立法院成立，我當了一個立法委員，把監察院副院長也照例辭了。一九四八年端午節，蔣介石請我去吃午飯，同座的除蔣氏夫婦之外，只有張羣、吳忠信、蔣經國。我不知道為什麼竟然邀我參加他們的家宴。蔣對我很客氣。他舉杯說，這是端午節，大家請喝一杯。我知道他是從來不喝酒的，不知為什麼勸起酒來了。他又說：“季寬先生，請你到上海去一趟。勸勸白健生快些到武漢去就職，這是黨國存亡攸關的事，各方面都屬望他，他不可違背大家的屬望。”我說：“總統派人去勸過了嗎？”他說：“孔卿先生（吳忠信）去勸過了，他都不聽，你同他交情很深，你去勸勸吧，他一定聽你的話。”我心里想，去就去吧，怎樣的勸，我另有打算。我答應晚上搭車回上海。他說，“最好你就搭經國的專機飛上海。”我也答應了。就同蔣經國辭了出來，到軍用飛機場。

我飛到上海，打電話給白崇禧，約他到我家里來談談，他說：“你的來意我都知道了，那個問題我不想談。”我說：“管你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是老蔣的意思，但是你決不知我的意思呀，你快些來

吧。”他来到我的家里，首先說了很多不能去就职的原因，主要是去了一定得不到好結果，因为“小鬼（指陈誠）素来与我有意見，即使老蔣信任我，而軍政部事事掣我的肘，我怎么办呢！”他还說：“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我听了哑然大笑，我說“你还想做他的大將立功嗎？正因你不能立功，我才来劝你呢。”他很驚訝。我說：“人家都說你是‘小諸葛’，这回我看你这‘諸葛’实在太不‘亮’了。局势已經很清楚，难道老蔣还能长久支持下去嗎？还有胜利的希望嗎？我們（指桂系）如果还死跟着他跑，岂不是陪葬！我們應該及早找一条出路！我們（李、黃、白）都高高在上，处在南京、上海，那些广西軍隊岂不是任由他們（指蔣幫）摆布葬送，那时我們什么都完了，难道你躲在上海就能逃出了他的魔掌嗎？你还不是籠中之鳥！現在难得的好机会放你出去，你还不远走高飞，自己还想关在籠里嗎？你到武汉去至少你可以把广西的部队拿了回来，还可多拿一些他的部队，武汉是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的战略要地，你看形势，看机会，主张和平，同共产党合作，迫蔣下野，德邻（李宗仁号）就可以代理总統，我們岂不是大有可为嗎！”他听了我的这番話，頓然大悟。他說：“你的話对！我馬上就回南京，去武汉就职。”蔣介石还以为我真能干，又帮了他的忙，其实是帮了最后的倒忙。他如果知道了这段經過，岂不恨我入骨。

白崇禧去武汉之后，我也沒有和他通信策划什么，我仍然在上海、南京两头跑跑，当我的立法委員。八月間南京政府因旧法币破产，物价飞涨，发行金元券，我糾合一些人实行反对。我想立法院就等于外国的議院，議院有执政党，也有反对党，我竟然以反对党自居。蔣經国在上海強迫市民把金子銀子兌換金元券，把上海市面搞得天翻地复。我知道薛岳是一块爆炭，他原任徐州“剿总”，因

打敗仗剛被撤下來，對蔣很不滿。他的金子很多，我對他說：“如果小蔣（經國）硬要你把金子去兌金元券，你怎麼樣呢？”薛岳開口就罵：“丟那媽！我們辛辛苦苦搞了几十年，出生入死，才掙得這些金子，如果兌成了轉眼一錢不值的金元券，以後我們吃咩也（粵語，吃什麼）？他敢來，我就開機關槍打死他。”當然蔣經國決不敢向這些人硬來的，這些話傳開了，在上海的軍閥官僚都起了共鳴，只有笨蛋才把自己的金子去兌換金元券。所以蔣經國在上海無論如何雷厲風行，他不敢得罪這些人，苦的只是持有少量金銀的人和一般老百姓罷了。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廿五日晚上，忽然南京方面傳來消息說，白崇禧有電主張和平，迫蔣下野。我聽到了這個消息真是害怕極了，比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晚廣州事變還要害怕得厲害。這樣重要的問題為什麼事前不使我知道，好作準備？這樣，蔣介石一定料是我與白通同搞的鬼，豈不把我馬上開刀或關起來。我急得象駝鳥一樣，改名換姓躲到醫院里去，但是怎樣逃得過蔣介石特務的手眼呢！兩三天後，李宗仁打電話要我馬上到南京去，我不知是凶是吉，橫直在上海也躲不了的，不如到南京同他（指李）死在一塊吧。

蔣介石接到白崇禧電報的時候，淮海大戰正在進行，他不敢遽然破裂，就在中央黨部召開的一個緊急會議上表示要下野，飛回奉化去了，一面在那里指揮作戰，一面又派張羣、吳忠信同李宗仁和我商談下野後的善後問題。我想，下野就下你的好了，還有什麼善後？其實他是要借着商談來緩和我們，等待淮海戰役的最後勝負：如果他勝了，我們當然是叛逆，作階下囚；如果淮海戰役他敗了，也不由得他不下野，而由李宗仁出面收拾殘局，他看機會再作擺布。他的用心是陰險的。果然為了代理總統或暫代總統這幾個字，就

拖了好几天沒有結果。

武汉的白崇禧也急了，打电报邀张羣和我去汉口商量。白崇禧要张和我去汉口是两种作用：要张羣去，为的是对蒋介石方面仍旧是想敷衍，对张羣表示他的电报无非是对总统表示他个人的意见，不管采纳与否，他仍然服从总统的命令；又要使张羣知道武汉方面仍然是积极备战，并没有什么特殊变动。张羣也知道这是敷衍的手法，但也乐得与其敷衍。要我去的目的，是桂系内部的商量。黄旭初、李任仁、李品仙、夏威等及桂军的总司令、军师长都集中在汉口（刘斐是否参加，我记不清），一天晚上在他的屋里开会，他把经过说明之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与南京已经闹翻了，不能再合作，但南京仍然是党中央，是政治的号召和力量，现在与南京党中央闹翻了，我们政治上拿什么东西来号召呢？就是与共产党合作吧，也要有一个政治组织支持才好办。”他提出可否请李济深回武汉主持政治，这样，既可以与南京对抗，又可以与中共联系。我同李任仁都同意这个意见，其他的人更不会有反对的意见。于是就拟电报准备打到香港。我说：“电报不知打得到打不到？又不知李任公现在还在不在香港？因李任公在上海临走的时候对我说过，到香港后不久就要到解放区去，并希望我也快些到香港去。”我又说：“不如你亲笔写一封信，由我作代表去请他回来，如果他肯回来的话。”我又说：“如果李任公已离开香港接不到头，我可否代表你直接找中共方面接头联系，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很同意，一切都由我代表去办。解放后有人说我想拖李济深到武汉去与中国共产党对抗，实情就是这样。

那时南京——汉口、汉口——广州的民航机已经停航了，我怎么去香港呢？白崇禧在抗战时期与美国空军“飞虎将军”陈纳德很

熟，那时陈納德已退伍办民航，他馬上打电报給陈納德派专机来武汉。我就乘专机經桂林到广州，到的时候已是黑夜了，我到张发奎家里住了一夜，我把武汉情形同他約略談一談。他不久以前正被宋子文挤下了台，对蔣也是不滿的，发了許多牢騷。

次日我到了香港，打电话給黃琪翔，他立刻来看我。我把来意告訴了他。他說：“李任公已到北京去了，不知道这里什么人負責？你如果要找中共方面駐港的負責人，我可以設法。”于是由他打电话給一个姓楊的联系。楊是陈銘枢任交通部长时的邮政儲金汇业局局长，我也認識，由他介紹，就在他的家里会見了中共駐港負責人潘汉年。我把武汉情形并代表白崇禧来港与中共方面接头的意思同他詳談。他說：武汉情形他也知道，与我所說的差不多，他答应打电报向中共中央請示。过两天，中共中央回电要白崇禧派刘仲容为代表，由信阳向郑州沿鐵路去找刘伯承面商彼此前方的联系問題。我立刻将中共中央回电的内容电告白崇禧，希望及早派刘仲容去。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淮海战役結束，蔣軍全部被歼灭，同月十四日毛主席发表时局声明，提出了在和平談判基础上的条件八項：（一）惩办战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总统；（四）依据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动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約；（八）召开沒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权力。

同月二十二日，蔣介石宣布下野，二十六日李宗仁代理总统。李、白都有电报来要我赶快回去。我乘飞机先到了汉口。我問白崇禧：“刘仲容派了去沒有？”他說还没有。我說为什么？他說因为

交通不便，刘仲容在上海也有事接头，尚逗留在上海。我很責怪他。他說，一切的問題我們到南京再談吧。我們同机飞南京后，有一天他對我說：“武汉方面中共軍隊不断进迫，我看和平合作沒有希望。”我說：“人家（指中共）要你派刘仲容去商談，你現在还不派去。必須双方商量妥当后，才能停止敌对的軍事行动呀！人家决不能因为蔣介石下了野，李宗仁代理总統，就算了呀！彼此現在还是处于敌对地位。”我又問：“你現在到底怎么样？”他說：“如果他們（指解放軍）逼我太甚，我还是打。”我听了这句话不禁跳了起来，我說：“你还有資格講‘打’嗎？你一个月以前电蔣主张和平，蔣的下野固然由于他的軍事失敗，而全国人民希望和平是最大的压力，你既对蔣主张和平，为什么老蔣下野之后你又要打呢？即使是北洋时代的小軍閥也不会‘出尔反尔’这样快，你不容易弄得来一根和平的拐棍，为什么輕易又把它扔了呢？我真不解！”我又說：“現在講‘打’，只有蔣介石还有資格，最好你亲自到奉化溪口去，向蔣介石認罪，請蔣介石再出来！”我們两人鬧得不可开交，刘仲容进来了，我說：“算了吧，我們还是說說笑話吧。”

白崇禧态度所以突然轉變，是由于他認為目的已經达到——蔣介石已經下野，李宗仁代理了总統，尤其是因为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发表的和平談判基础上之条件八項，是他們所不能接受的。

李宗仁呢，代理总統的烂椅子坐上来了，正是得意忘形的时候，虽然作了一些和平試探（攻势），写信給毛主席主张和平，并暗中指使一些上海名人如顏惠庆之流作为民間代表去北平走了一趟，但中共方面并不重視，而李宗仁的亲信甘介侯則拉攏美国駐华大使司徒雷登和傅涇波与李宗仁亲近。司徒雷登說：“蔣介石之所以失敗，是由于貪污无能，不能善用美援，現在美国还有十八船

軍火和好多美金要援助中国,只要你不同中共和談,繼續打下去,这些美援都可直接交給你处理,局面仍然是大有可为的。”李宗仁心里动了,对于和平沒有絲毫誠意,还有好多“攀龙附凤”的人包围着,要他隔江抗拒,平分天下,好从中猎取位置。李宗仁的老婆郭德洁更无聊,对人說,李宗仁之当总统,明朝的老和尚就有詩的預言,前途是无限的。他們商量組織行政院,要我当副院长,我見情形太不成样了,不肯参加。二月中旬我又回香港去,不愿过問。张国淦老先生曾对人說:“桂系这个局面,为什么連黃季寬都不合作?我看搞不长久。”后来李宗仁又以孙科的班底組織代表团想去北平和談,遭到中共的拒絕,最后才改派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釗、刘斐、李蒸、黃紹竑为和談代表,中共方面总算接受了。代表团准备四月一日去北平,我挨到三月廿九日才回南京,以前的經過我一些也不知道。四月十六日李宗仁在南京拒絕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款(詳情見另文:李宗仁拒絕和平条款),我狼狽地从南京逃回香港。南京解放后,李宗仁逃回桂林、广州,屢次要我回去商量,我見沒有什麼可商量的,都沒有回去。从此,我不但与蔣介石的关系完蛋了,我与桂系的关系也完蛋了。这就是我与蔣介石和桂系的肮脏历史。正是“从前种种比如昨日死,今后种种比如今日生”,感謝党和毛主席給我新的政治生命,准我参加一九四九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會議。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二日

桂系及其反动的政治組織

黃 啓 漢

一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正当一九二四年中国共产党在广州推动孙中山先生改組国民党，組織革命政府，全国出現革命高潮的时候，在广西以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等人为首的一羣青年軍官組織武装和当时統治广西的旧軍閥陆榮廷、沈鴻英等进行战斗。由于当时的广西人民羣众对陆榮廷等的长期黑暗統治，深恶痛絕，所以李宗仁等在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援下，很快就取得了胜利。但是李、黃、白三人，都是地主階級出身，当时他們虽然把陆榮廷、沈鴻英等旧軍閥打倒，取而代之，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进步的政治主张，仍然是在广西維持着反动的封建統治，不过换了几个統治者的名字而已。一九二六年初，李宗仁、黃紹竑派白崇禧为代表到广州与国民党党政当局汪精卫、譚平山等商定两广合作，准备出师北伐。广西軍隊被編为国民革命軍第七軍，以李宗仁为軍长，黃紹竑为軍党代表（以后又扩編一个軍，为第十五軍）。白崇禧因为得到蔣介石的特別賞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軍总司令部副总參謀长。这就是国民党桂系集团开始形成的情况。

北伐的时候，李宗仁率第七軍經湖南攻打江西而到南京，白崇

禧兼任东路軍前敌总指揮，指揮刘峙、薛岳两个师从浙江到上海；黃紹竑兼广西省主席，留守广西。在北伐各战役中，桂軍子弟和其他友軍一起，奋勇作战，对于打倒当时的北洋軍閥孙传芳等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但当北伐軍攻占南京、上海之后，蔣介石投靠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实行叛变革命。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等由于都是地主阶级出身，他們参加北伐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地位，所以就很自然地跟蔣介石一起叛变了革命，特别是白崇禧成为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急先锋。

这时候(一九二七年四月)桂系在前方的軍隊，已扩充为两个軍，即第七軍及第十九軍，以夏威任七軍軍长，胡宗鐸任十九軍軍长。一九二七年十月，李宗仁率領夏、胡两軍，直扑武汉攻打唐生智，占領武汉以后，把唐部改編为四个軍，除何鍵一軍留駐湖南，归程潛(湖南主席)指揮外，叶琪、李品仙、廖磊三个軍都归李、白指揮，这三个軍长都是广西人。此外，又把湖北軍隊扩充为第十八軍，以陶鈞为軍长。

一九二八年初，武汉設立中央政治委员会武汉分会，李宗仁任分会主席；国民革命軍又划分为四个集团軍，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分任一、二、三、四集团軍总司令，白崇禧任四集团軍副总司令。蔣、馮、閻、李决定联合繼續北伐，白崇禧率領李品仙、廖磊两軍及卫队韦云淞一师北上，任前敌总指揮，不久打到北京，把张作霖部队全部驅出关外。这时候的桂系，南北伸张，声势浩大，引起了蔣介石的嫉畏。李宗仁、白崇禧曾极力主张派兵出关攻打张学良，白并已派出密使何家駒联络张学良部下楊宇霆作内应，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手就可以解决。但蔣介石害怕桂軍势力繼續发展，于己不利，派人說服张学良投誠，并将白的密謀告张，张学良即

把楊宇霆处死。宣布易帜，归順于蔣。李、白为此对蔣大为不滿。

在这个时期，蔣介石派魯滌平担任湖南省主席，并暗中向湘省运进大批軍火，阴谋切断武汉桂軍和广西的联络，准备进攻武汉。湘軍何鍵因与魯滌平爭主席不到，遂以此事到汉口和北京分別向李宗仁、白崇禧密告。李、白商量結果，由武汉政治分会下令，以何鍵代替魯滌平为湖南省主席。蔣介石則早已在九江、安庆一带密集大軍，主力是刘峙、顧祝同两部，积极准备向武汉进攻。李宗仁撤換魯滌平，使蔣更有所借口，于是爆发了一九二九年三月的蔣桂之战。

蔣桂战争爆发前，蔣介石召开全国編遣會議，桂系駐在武汉的軍隊，从六个軍改編为六个甲种师，另外两个独立旅，共十余万人。当时的六个师长是夏威、胡宗鐸、陶鈞、叶琪、张义純、程汝怀；两个独立旅长是周祖晃、楊騰輝。由于当时桂系坚持反共，不得人心，貪污腐敗，軍心涣散，故貌似强大，实际上不堪一击。例如胡宗鐸兼任湖北清乡督办，陶鈞兼会办，抓往鄂省軍政大权，镇压工人农民，并任用私人，把持財政稅收机关，中飽私囊。夏威和桂籍的中上层軍官分脏不均，牢騷滿腹。胡宗鐸还吃上鴉片烟，“吞云吐霧，不亦乐乎”。陶鈞借清乡之名，到处抓錢。夏威則沉迷于女色，大有“乐不思蜀”之概。其他中下級軍官，亦多狂嫖濫賭，每当夕阳西下，汉口旧法租界的旅館，就挤滿了瘋狂聚賭的和寻花問柳的軍官，經常鬧酒鬧事，发生大小乱子。軍中卖枪和克扣粮餉，成为普遍現象。总之，这时候在武汉的桂系集团非常腐敗，桂軍子弟普遍厌战思乡，所以当蔣介石大軍逼近武汉，并通过俞作柏用大量金錢收买夏威部下的第一旅长李明瑞倒戈，迫使桂軍不战而退，武汉防綫就此瓦

解，未放一枪一弹，桂系即宣告失败。这样，中原人民免除了一场大的战祸；至于蒋桂之间谁胜谁败，对人民来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当蒋介石大军向武汉进逼的时候，白崇禧在北京，本来联络冯玉祥一起反蒋，一度准备从北京率领李品仙、廖磊两军回救武汉。但由于武汉桂军失败太快，冯玉祥反而通电赞成蒋介石对桂系的讨伐。白崇禧回救武汉的路已被截断了，他不得已由廖磊护送出走天津，只身从天津坐英国船逃到香港。李宗仁在蒋介石下讨伐令的前几天，还到南京去见蒋介石解释撤换鲁滌平的事，后得密报知蒋就要动手，李即连夜逃到上海躲在法租界里。以后也坐船逃到香港，与白崇禧相见之下，大为懊丧。

随后李宗仁、白崇禧回到广西继续和蒋介石从云南、广东、湖南三省调动来的大军苦战了一年多，中间一度失败下野，流亡香港和越南海防，但得旧部杨腾辉等支持，很快又重整旗鼓，先后把蒋军、滇军、粤军驱逐出境。当战争进行到最艰苦的阶段时，黄绍竑认为大势已去，主张不必再干。白崇禧则坚决主张与蒋死拼到底，不惜以广西全省人民生命财产，作最后的孤注一掷。李宗仁支持白的意见，黄绍竑就独自退出，离开广西。

此后，蒋介石忙于在北方应付冯玉祥和阎锡山，又在江西忙于进攻日益壮大起来的工农红军，就无暇和桂军再战。李宗仁和白崇禧也以连年苦战，疲惫不堪，急待喘息，就提出了“亲仁善邻”、“励精图治”、“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等等欺瞒性的口号，号召广西文武官员埋头苦干、穷干、硬干，把广西“建设”好，实际上是为了积蓄力量，待机而动。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六年的五年中间。桂系集团基本上和南京蒋介石集团保持着和平对立的状态。

二

北伐战争后,李宗仁、白崇禧被蒋介石压迫,退回固守广西。他们总结了失败的經驗教训。得出来的結論是:从广西出兵参加北伐之日起,桂系在軍事上的发展很快,但是政治跟不上,在政治上始終是做別人的尾巴。其实,李、白自一九二七年跟蒋介石背叛人民、背叛革命之后,政治上已經是走进死胡同里去了,在死胡同里,不管他們怎样橫冲直撞,总是死路一条,沒有去處。但是李、白的反动政治野心却很大,他們不甘失敗,决心要在政治上“独树一帜”,和蒋介石集团繼續进行斗争。問題是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的制度下,任何人不是站在反帝、反封建这一边,就是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一边,沒有第三条路綫。李宗仁、白崇禧的反蒋,不是从人民的立場出发,把蒋介石集团作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的代理人来反对,而是从桂系集团的利害出发,把蒋介石作为一个爭取权利的对手来反对,因此他們在政治上的“独树一帜”,实质上仍然是走蒋介石所走的道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的道路,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抄袭了蒋介石的做法。例如李宗仁、白崇禧的秘密政治組織——“三民主义同志会”,就是和蒋介石的法西斯組織复兴社类似。

桂系的“三民主义同志会”大致是成立于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之間,是高度秘密的反动政治組織。它以李宗仁、白崇禧为終身正副会长,設总部于南宁桃园路。會員大多数为中上层軍政人員,須經三个會員的介紹,并由李、白两人亲自批准。

該会的宗旨标榜以三自政策——自卫、自治、自給——为手段,“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設广西,复兴中国”,实际上

是为了巩固桂系在广西的反动统治,并为它扩充地盘作积极准备。该会在正副会长之下,設立三个委员会、一个秘书处。三个委员会是:軍事委员会,以李品仙为主任委员,夏威、廖磊为副主任委员;政治委员会,以黄旭初为主任委员,王公度、潘宜之为副主任委员;经济委员会,黄旭初兼主任委员,黄钟岳为副主任委员;丘昌渭是秘书处秘书长。所有当时广西的“軍政大計”和“重大人事”的变更,都经过这个“三民主义同志会”的各委员会討論通过。最后提請正副会长批准施行。例如当时桂系以广西省政府名义頒布的“广西建設綱領”,就是由“三民主义同志会”的政治委员会副主任王公度主稿,提出該会反复討論通过,經白崇禧核定以后,才交給广西省政府委员会作形式上的通过和对外正式頒布。

所謂“广西建設綱領”的中心内容,和蔣介石集团一样,以三民主义作幌子,“挂羊头,卖狗肉”,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所不同于蔣介石集团的是桂系要保持广西的半独立状态,提出了三自政策,作为“实现三民主义的手段”。所謂三自政策,就是自卫、自治、自給政策。自卫政策,是以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募于征为具体内容。寓兵于团的意思是把常备軍縮小到最低限度,办理民团作为后备軍隊。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間,桂系在軍事方面仍沿用第四集团軍的名义,李宗仁为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总参謀长先是叶琪,叶墜馬去世后,改由李品仙担任。下設第七軍和第十五軍,廖磊、夏威分任軍长;每軍按編制三个师,每师三个团。这样,常备軍是十八个团。从一九三三年开始普遍办理民团以后,这些正規軍就逐漸縮減,先是把第七軍的一个师裁減,后来又把十五軍的一个师裁減,最少的时候,全省只有正規軍十一个团。他們把全省的十八岁到四十五岁的男人都編入民团之列,每村編为一

队,每乡(鎮)編为一大队,每区編为一总队,每县設立民团司令部,县长兼司令,下設专职的副司令,并設常备民团若干大队。民团司令部每月派出专职干部到各区乡去巡迴訓練和检查各区、乡、村的民团。全省設立民团干部学校,招收初中以上毕业生訓練一年,毕业后派到各乡、村担任乡长或村长,兼任乡、村民团的大队长或队长,同时兼任乡、村的小学校长,名为“三位一体”。

广西民团干部学校,是一种軍事化的学校。在軍事課程上,它按照步兵操典,从一个士兵的基本动作起教到連排长的指揮战斗;在政治上,以“广西建設綱領”、“三自政策”、“三寓政策”为內容,进行欺騙性的教育。黄旭初兼任該校校长,白崇禧經常到該校去演說和指导工作。每年从民团干部学校毕业的学生約一千人,都統一分配到各乡、村去做民团的骨干,也是行政基层組織的骨干和初級教育的骨干。依靠这批骨干把全省的民团訓練起来,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內把民团变成軍隊。这就是白崇禧強使广西农民为巩固桂系的反动統治而服役的自卫政策之一。它們的“寓将于学”的办法,是对全省初中以上学生实行軍事管理,每周軍事訓練三小时;高中学生并集中訓練一年,大学生在校訓練两年,使每一个高中毕业生具有团級干部的軍事知識,大学毕业生具有师級干部的知識。这样,初中以上的学生都成为預备軍官。所謂“寓募于征”,就是強行征兵制度,以代替雇佣兵的制度。但是在反动統治下,征兵制度的施行是有很大的欺騙性的。地主和富农的子弟被征的时候,可以雇佣別人代替,仅此一点,就足以拆穿桂系当时征兵制度的实质。

所謂“自治政策”,一方面,对于国民党中央政府,桂系主张实行地方均权,反对中央集权,以維持桂系在广西的半独立的反动統治。但是什么职权归中央,什么职权归地方,並沒有明确的和具体

的意見。另一方面,对省内是废除县以下的保甲制度,建立区、乡(鎮)、村制度,区設区长,乡設乡长和乡民大会,村設村长和村民大会。区长是由省政府委任,乡长、村长由县政府委任。乡或村民大会,制訂乡、村公約,内容着重在“維持公共秩序”方面。区、乡、村长大多数是民团干部学校毕业的学生,成为桂系反动統治最基层的骨干。这些“骨干”,在乡村里或者是同土豪劣紳結合在一道,或者是以新的土豪劣紳面目出現,排挤老的土豪劣紳,代表地主富农压迫人民。一切征兵、征粮、拉伕、征稅、反共、反人民等等活动,都是他們的本份。“自治政策”的实質,就是如此。

所謂“自給政策”,他們提出鼓励私人投資“振兴工业”,“发展农业、矿业和交通运输业”、“扩大出口貿易,維持国际收支平衡”、“实行二五減租,改善农民生活”等等漂亮的口号,实际上都是一些騙人的空談。而当时桂系在广西的財政来源,除田賦外,大部分依靠鴉片烟稅和賭餉,沒有烟賭,就不好过日子。

以上所举,就是所謂“广西建設綱領”和“三自政策”的概要,是桂系“三民主义同志会”的政綱。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相繼发生以后,桂系对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政策和先安內、后攘外的主张,都表示过反对。但桂系自己却和日本帝国主义勾搭,例如一九三五年接待日本軍人松川中将到广西訪問,并通过他向日本訂購一批軍火和聘請十多个日本軍事顧問,分別派在南宁軍官学校和柳州航空学校等工作。这件事情开始提到“三民主义同志会”来研究的时候,曾有人提出,既然說要主张抗日,又怎么能买日本的軍火和聘請它的顧問呢?白崇禧佯裝不敢作主,打电报去广州向李宗仁請示(那时候李宗仁經常在广州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員会聯絡各方反蔣人士),經李核准后才

逆行。李說，“日本軍火也可以打日本人”，实际上是那时候李宗仁、白崇禧和蒋介石集团仍然处于对立地位，他們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反动統治，就不择手段地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結。直到一九三六年六一事变(两广联合反蔣事件)前夜，白崇禧才把日本顧問“礼送”經欽州、北海去香港。从这一件事情可以看出当时桂系的所謂“三民主义同志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

又当桂系軍閥集团退守广西、組織所謂“三民主义同志会”期間，在資本主义世界里正出現一般逆风，那就是德国希特勒和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蒂独裁之风。所以蔣介石模仿德意，組織藍衣社(复兴社)，李宗仁、白崇禧則模仿了藍衣社，組織“三民主义同志会”，并专派亲信干部韦永成、程思远分別到德国、意大利去学习。

到抗战前夕，“三民主义同志会”會員約共五百余人，都是武官校官以上、文官荐任以上的桂系干部。凡有三个會員以上的地方就編成若干小組，小組每周座談一次。汇报各人在工作崗位上所見所聞和学习討論該会所发下的文件或指示。而忠于桂系集团，忠于李、白，是小組政治思想教育的全部中心。

桂系“三民主义同志会”还通过广西省政府和四集团軍总司令部，分別举办县长訓練班和将官訓練班，調集現任县长和在职上校以上的軍官进行短期的政治訓練，集中灌輸“广西建設綱領”和“三自政策”的大广西主义的思想，并通过这些訓練班选择对象，发展新的會員。負責主持这些訓練班的是黃旭初、廖磊、实际具体掌握这一項工作的是王公度、謝蒼生。

桂系在南宁、梧州、桂林、柳州各大城市設有“防奸委员会”，担任特务工作，直接对李、白及黃旭初負責，先后主持防奸委员会工作的有蔣伯倫、鍾紀、韦贇唐、林茂、梁学基等人。特务工作的中心

內容就是反蔣、反共。

但对外省的聯絡和情报工作，是由王公度負責。一九三六年白崇禧亲自对我說过，王公度个人每月支取活动費港币五千元，誰也不知道他是怎样用的。此外，还有麦煥章、张兆棠、黎蒙等人在香港做情报工作，他們通过秘密电台，每天有电报給李、白，报道各方面的政治动态。

桂系“三民主义同志会”除了大事培养广西干部以外，还“广罗人才”，凡对蔣介石不滿的跑到广西来，都被重用。但这样在“三民主义同志会”里面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派系：主要的是以潘宜之、丘昌渭为首的外省派，下面有刘士衡、黄鈞达、胡納生、万民一、万仲文、徐梗生、林茂等人；以王公度为首的广西派，下面有韦永成、程思远、謝蒼生、李一尘、张威遐、区渭文、韦贇唐等人。后来韦永成、程思远、韦贇唐又分开与鍾紀、蔣伯倫等独成一派，被称为广西的少壮派。潘宜之、丘昌渭等是典型的官僚政客，他們有一套吹、拍、拉的“本领”，在李、白、黄三人周围，大献殷勤，都是坚决反共反人民的角色。王公度、謝蒼生、张威遐、李一尘等人，据說是托派，但迄今未能証实（至少，我自己未能証实），但王公度很注意抓中下层干部，并有一定基础。少壮派掌握特务机构，气焰也不小。所以从桂系“三民主义同志会”的政治干部面目来看，也可以看出該会的反动本质。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桂系与蔣介石妥协，出兵抗日，并与蔣介石取得協議，双方解散秘密的政治組織。桂系“三民主义同志会”就在桂林内部宣布取消，并焚毀一切文件。一九三八年，蔣介石在武汉組織“三民主义青年团”，据說是用以代替复兴社的。蔣要白崇禧派程思远担任三青团中央組織处副处长，

处长是复兴社的重要骨干之一康泽。这就形成桂系的“三民主义同志会”和蒋介石的“复兴社”的合流。但桂系的“三民主义同志会”是取消了，蒋介石的“复兴社”实际上并未取消，李宗仁、白崇禧对此曾背里骂蒋不守信用。一九四七年秋白崇禧在南京一度提到要考虑恢复以前的政治组织，以后听说李宗仁、白崇禧在香港是建立了一个组织，但我不知道，无从叙述，也许程思远可以提供这一方面的资料。

一九六〇年六月四日于上海

閻錫山的鐵軍內幕

朱 崇 廉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寇攻陷山西太原，閻錫山及其所部退到臨汾。一九三八年春，日寇從東陽關和靈石夾攻臨汾，並由中陽向晉西進攻，閻僅率少數隨員逃往黃河西岸陝西省宜川縣之桑柏村。他想到這個割據多年的山西省已不能立足，便哭着說：“我們完了”。

閻錫山看到自己的舊軍雖已大多潰散，不能成軍，但他看到新軍抗日決死隊還能存在，並在敵後協同八路軍打游擊，於是又回到河東吉縣，企圖收容舊部，重整旗鼓；溶化新軍，以為己用。這年冬天，日寇進攻吉縣，閻又逃往河西，駐于宜川縣之秋林鎮。晉西政變後，新軍決死隊重創閻的舊軍，從此新、舊軍便處在敵對狀態。同時，傅作義也脫離了第二戰區的建制，陳長捷有直接倒向蔣介石的傾向。閻感到眾叛親離，就要倒台，於是決定成立所謂鐵軍組織，為改編、擴充軍隊，挽救死亡，打下組織基礎和思想基礎，並為向蔣介石提出擴軍要求製造借口。

一九三九年九月間，閻錫山授意王靖國召集已經拉攏好的溫懷光、高斌、王乾元、趙恭等十幾個軍人到閻錫山住處召開所謂軍整會。閻錫山故意在會上責罵舊軍人不爭氣，不會練兵，不會組織，不會和共產黨、牺盟會作鬥爭，以誘導和激勵他們提出建立所

謂鐵軍組織的建議。果然，當時的騎兵軍參謀長溫懷光就按照王靖國的指使首先發言說：“我們是軍人，是絕對服從會長的（閻錫山自命為反動的“同志會”會長），會長沒有詆我們組織，我們就不敢組織；如果准許我們組織，我們一定能夠組織得很好，和會長同生死，共患難。”繼而你一言、我一語地逢迎附和，有的哭鼻子，有的皺眉頭，形形色色，丑態百出。閻錫山即假惺惺地對他們表示親信，讓他們擬出方案辦法來進行籌劃。其實這一夥參加的人，都是當時給閻錫山和王靖國跑龍套的角色，並不是閻的骨干，他們希望乘此機會和閻接近，好達到升官發財的目的。王靖國對他們封官許愿，再加閻錫山對他們說了几句哄小孩的鬼話，他們就昏頭轉向地跟着喊叫反共，秘密殘害進步分子，而成為閻錫山為非作惡的主要幫凶了。

在這次會議以後，即由王靖國一面繼續拉攏伙伴，一面召集他們擬定守約、誓詞、紀律、發展辦法、化名編法和參加儀式等等。為把這事神秘化，規定仍以軍整會名義召集開會，時間要在深更半夜，地點要採取流動方式，有時在王靖國的辦公室或住處，有時在集訓團的窯洞或秋林河灘，有時還要到附近的一個小村五里坪。這都是閻、王預先商定，故事神秘來眩惑大家、欺騙眾人的鬼把戲。

發起人的人數和人選是經過相當爭吵的，明里是採取各實力派的分贓方式，暗中却是要抽梁換柱，把已經和外界發生關係、腰包已經肥滿、隨時能離開他的一些人撤調下來，然後安排他們的接替人。發起人是二十八個人。這個二十八的數目，是從十天干、十二地支、二十四孝、二十八宿、三十六好漢等詞彙中選定採用的。人選是按實力派的關係來選定的，趙承綬、王靖國、陳長捷、郭宗汾、彭毓斌等是當時有實力的；楊爰源、孫楚、楊澄源等是沒實力的。于

是就按这个关系来决定分配人数。这二十八个人是：刘召棠、史泽波、孙福麟、刘效曾、王凤山、武玉山、高倬之、王乾元、王维楨等，是王靖国的部下；温怀光、韩步洲，是赵承綬的部下；郝士文、刘墉之，是陈长捷的部下；商得功、樊釗、郭标，是郭宗汾的部下；滑廷璧、赵恭，是彭毓斌的部下；于鎮河、賈毓芝和楊爰源有旧，张翼和孙楚有旧，婁福生、魯应祿和楊澄源有旧，賈宣宗、傅海云、李国枢、张荣汛是敌工系，高斌是炮兵。实际这些人都已由王靖国拉攏操縱，和他們旧日的主官关系已經疏远。規定这二十八个人的数目，出了缺額要补足，閻由克难坡回到太原后，樊釗、郝士文、刘墉之、王凤山、郭标、王维楨、商得功等均先后死亡，便以陈震东、孟际丰、楊貞吉、梁培璜、許鴻林、朱崇廉、雷仰湯等人依次递补。

发起人已經决定，守約、誓詞、紀律、仪式等也都拟好，就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在閻錫山的住处开始了丑剧的表演。第一幕是发起人和王靖国、閻錫山环跪，一齐假哭如丧考妣，故示激动，决定要歃血为盟，就在預先放好的一块白絹上，各自用針刺破指头，用血来点写守約。在点写以前，还研究了这个組織的名称，因为規定了一人介紹三人，递层发展，就决定叫“三三鉄血团”；但另有一种說法要叫作“山山鉄血团”，說这里寓有閻錫山的山西的含义。閻錫山諷为很好，但仍可涵蓄其音义，且为神秘欺人，規定这个名称要絕對保守秘密，只許参加者眼看心記，不准任何人由口中說出，倘有洩露，要按紀律制裁。守約的头一行，是写“三三鉄血团守約”七个字，下边写的是“鉄血主公道，大家如一人，共生死利害，同子女财产”四句話。然后举行发起人宣誓仪式，宣誓人跪在閻錫山跟前，宣讀各自写好的誓詞和紀律。誓詞是：“誓以至誠，亲爱团結，用鉄血拥护会长閻百川先生，坚决实现物产証券和按劳分配的

主张,……以生命付組織,与組織共存亡,始終到底,如有违紀,愿受組織最严厉之处分,謹此宣誓”。紀律是:犯左列各条之一者处死:

- 一、脫离組織、背叛組織者;
- 二、阴謀破坏組織者;
- 三、不服从組織決議及組織指示者;
- 四、洩露組織秘密者;
- 五、有污蔑会长之言論或行动者;
- 六、污蔑同志、破坏亲爱团結者;
- 七、营私舞弊者;
- 八、不积极努力組織工作,致組織受重大損害者;
- 九、犯烟、賭、脏、欺之一者。

宣讀完毕,再刺破左食指,在宣誓人姓名下押指印。閻錫山还要叫出他的妻和子与他們相見,他一边和人握手,一边給他儿子介紹說,这是你某某叔叔,你們給行个礼,咱們已經成了一家人了。儿子依父亲命行一鞠躬礼,这幕丑剧就告一段落。大家休息一陣,接着第二幕丑剧开始,就是大家和閻錫山坐在一块儿吃飯。这一下眉眼改变了,每个人故作喜笑,考究了生辰年月,便称兄道弟起来,大家交盃換盞,猜拳行令,說說笑笑,表示欢乐景象:这个吹牛,說我們比共产党好,那个拍馬說国民党比我們坏;你捧“物劳主张”;他罵馬列主义,好象这个反动組織一成立,閻錫山就可任所欲为了。

这个組織是“同志会”内的核心組織,具有特务組織的性質,与希特勒的国社党和蔣介石的复兴社的一套組織相似,要在軍隊里偵查和監視旁人,执行警察和宪兵的任务。为了使参加的人給土皇帝閻錫山作馴服的工具,要求他們必須以生命付給組織,与組織

共存亡，始終到底；要具備“鋼的意志、铁的團結、铁的紀律”三个条件；因此就規定：組織永远不开除同志，如有违犯紀律的，就給予最严厉的处分——自裁处死，即将犯錯誤的人关起来，逼他用服毒或上吊，留下自杀自愿书；如拒不执行时监护人即将他杀死。閻錫山是个阴狠成性、好話說尽、坏事做遍的封建軍閥；他成立这个組織，實質上是強制这批人跟他反革命到底，因之它的組織方法严密，专制慘酷，毫无一点人性。另一方面，閻錫山在表面上又喊叫說，他練鉄軍，建組織，是为了使山西成为华北要塞、全国堡垒，担任保障西北、掩护西南的任务，以便向蔣介石政府詐騙更多的粮餉来扩充他的反动势力。

鉄軍組織是按一人介紹三人递层发展的，二十八个发起人为第一层，每人所介紹的三个人为第二层，第二层介紹的人为第三层，层层发展，依次下推，預計要发展到二十层。仿照青帮大通悟学的排字法，各层的人均給以化名，与組織取秘密联系。按守約“鉄血主公道”等字句，用同音字編姓，如第一层的姓戚（山西五台人讀“鉄”如“戚”），第二层的姓續，第三层的姓朱，即鉄、血、主之同音，故第一层也叫戚层，第二层也叫續层。他們把鉄軍組織也起了两个化名，叫“郭复兴”、“楊明德”。規定組織是屬人的，無論到天南海北，一切联系传达，均由介紹人負責。橫分为系，即按二十八人分为二十八系；縱分为层，即按守約的字，預計到二十层。

参加鉄軍組織的手續，是先由介紹人提出被介紹人的姓名职务和表現，再經組織的审查，并受七八日的短期訓練。参加仪式是詭密的。先經王靖国、閻錫山等的四次传見，然后才能履行仪式：半夜里把参加的人帶到閻錫山的住处，在一个窑洞里的正中悬挂着閻錫山的像片，前边摆着桌子，上面点着两支腊烛，焚着一炉香，

桌上放着用二十八人血指写成的白絹守約，还放着几支針。閻錫山站在桌子的左边，监誓人站在桌子的右边，承办这手續的駐会发起人站在两旁陪班。参加人进来后先向閻錫山行九十度的三鞠躬礼，由承办人向閻报告参加人的情况，閻点首表示同意后，参加人即跪在桌子的前面，正对着閻錫山的掛像，背誦誓詞和紀律（在短訓期間写好背会的），念毕用針刺破左食指，在誓詞末宣誓人姓名下押指印，閻作簡短訓話，参加人表示了决心，閻与之握手道別。这种規定的仪式和手續，最初是逐个单独举行的，以后因参加的人多了，又規定队的一、二层可以先履行假定手續，特委可在各地代为主持，仪式大体与上述同；必要时也可以集体参加。

“三三鉄血团”的名称对外最初是軍整会。一九四一年閻錫山到难登坡后，就把太原綏靖公署的整訓处予以改編，由张翼任处长，添設了一个督訓課，由王凤山任課长，就是专办鉄軍組織工作的一个机构。这时又成立了整軍委员会，由楊爰源、孙楚、赵承綬、王靖国、楊澄源、楚溪春、郭宗汾、彭毓斌等任委員，这是領導鉄軍組織的公开机构，实际是由王靖国一人負責。这时王靖国凭借这个組織的权势，独攬軍权，排斥异己，气焰极高。其他整軍委員，都向閻表示消极，对王靖国心怀不滿，内部便互相傾軋起来。閻錫山为了应付大家并牽掣王靖国，就把这些人也拉进鉄軍組織中去，給鉄軍組織又起了一个“特团”的名称，把这些人就叫作“特委”。以楊爰源为主任特委，担任传見、监誓任务和代行手續等，实际仍系由王靖国一手把持。王靖国原不在二十八个发起人之中，只是代替閻錫山主持鉄軍組織，現在既然成了特委，独包独攬，就更为名正言順了。一九四二年，整軍委员会又改为建軍委员会（簡称建軍会），除仍由这些人为委員外，并把鉄軍組織的二十八个发起人叫

做“督建委員”。但鉄軍組織的工作，始終是由王靖国支配，其他人員只不过是陪衬而已。鉄軍組織、特团、建軍会这三个名称，一直并存到太原解放。

一九四二年，閻錫山为了加強控制，又成立了“鉄軍紀律維護团”，直属于鉄軍組織之下，专事迫害他們认为不忠实的分子。計自鉄軍組織成立后，人所共知的被杀害的人，有芦宪高、刘墉之、鍾有德、陈道琦、李光兴、姜煥章、萧利鋒、續亦龙等。这些人或系表示不滿，被誣杀害；或系触犯閻錫山，遭受自裁的处分。其他秘密处死的，因多系半夜拉出活埋或处死，究有多少实无法估計。总之当时造成了极为恐怖的局面。

鉄軍組織的发展过程，随着閻錫山的反动措施而逐步扩大，又随着他的日趋沒落而消沉下去。它最初是发展上中級軍官，以后才发展到下級；一九四一年后，又发展到敌工和政工人員；一九四六年，才发展到士兵。这些就是所謂鉄軍基干，閻錫山把他們分別叫做鉄班中的鉄大梁、鉄二梁、鉄柱子，特別交給他們可以當場打死倡議繳械投降的任何人的大权，在軍隊中曾起过一度的作用。鉄軍成立的最初一二年，因参加后即可得到信任，能升官，故人們爭取参加；后期即視為一种負担，一种危險，在軍官中就漸漸輕視起来。

閻錫山成立鉄軍組織的目的，既是要加強控制他的軍隊来消灭革命力量，为他投降日寇扫清道路，因之在鉄軍組織成立后的第二年，即一九四〇年，就开始扩充頑固軍隊。他危言聳听地要挟蔣介石政府增加番号，扩充軍隊，以图壮大声势，他将原有的两个集团軍、五个軍扩充成为四个集团軍、八个軍、六个游击縱队，两个政卫师、一个独立旅、两个总队、一个特务团、一个机关旅团、一个

騎兵团、一个炮兵司令部、五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一个宪兵司令部及三个宪兵大队；兵站系統，也作了相应的扩充。他把原来的各軍、师长大部調換，以鉄軍組織的骨干分子来接充。所有軍队的整編、人事、訓練等，統由鉄軍組織一手操縱，凡事必須先經鉄軍組織研究决定后，再由太原綏靖公署或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頒布施行。

鉄軍組織对延緩閻錫山集团的死亡是起过很大作用的。因为这个組織的分子，都能和閻錫山发生直接联系，作为他在軍队中的耳目和化身，發揮了警察、宪兵的特务效用，所謂“大家和会长一条心，条条电话綫通向会长”，以故在軍队中造成了恐怖、对立和互相監視的局面。因之，官兵中虽有对閻錫山的統治心怀不滿，也都慑于淫威，未敢有所举动。再則，它对官兵不断进行反共的欺騙宣传，灌輸反动主张和言論，挑动反共反人民的浪潮，在毒化官兵思想上，也起了极大的作用。一九三九年以后，閻錫山在軍事上所进行的一切反动措施，正是鉄軍組織的全部工作和它反共反人民的真实写照。閻錫山的罪恶是和鉄軍組織分不开的。鉄軍組織是閻錫山这支反动軍队的組織者、訓練者和指揮者；这支反动軍队又做了鉄軍組織进行反共反人民、慘杀和掠夺人民的工具，它們的关系是两位一体，密切不可分离的，因而它們就成为閻錫山反动罪恶的制造所和工程队，給人民造成的灾难是难以数尽的。

流氓軍閥孫殿英

張述孔

辛亥革命以後，在二十多年的長時期中，中國社會現象的主要特點之一，是連年軍閥混戰，割據稱雄，各個大小軍閥，為着擁兵自衛，擴充地盤，都是漫無限制地招兵買馬，以增強自己的實力，因而逐漸把中國形成了一種擁有龐大陸軍的畸形狀態。在這個混亂的年代里，不管什麼人，只要能夠糾集一批烏合之眾，那怕為害地方的匪類，也可以得到招撫和收編。於是有些不逞之徒，便把帶兵看作是升官發財的終南捷徑，孫殿英就是在這樣的历史條件下混出來的一個典型人物。

為了尽可能地把孫殿英這個人的全貌勾劃出一個輪廓，先從他的出身說起。

一、流氓賭棍出身

孫殿英，名魁元，一般人都叫他孫老殿，因為他臉上出過天花，所以也把他叫作孫麻子；河南省永城縣小馬牧集孫家庄人，幼年喪父，其母對之溺愛嬌慣，自幼養成了調皮搗蛋的性格。他在十几歲的時候，開始跟着當地流氓地痞鬼混，經常出入賭窟，憑着自己的一些歪聰明，不久就做了一名大賭棍的助手。起初在賭場做些“傳寶盒”、“看台子”一類的事，等他窺見個中奧秘之後，很快地就成了

一个著名的賭棍。从此闖蕩江湖，以賭為業。在旧社会，有不少人吸食鴉片或金丹（烈性毒品中的一种）一类的毒品，而販賣毒品，又是一項追求暴利的生意，孙殿英便以其賭博得來的金錢從事于販賣鴉片、制造金丹的違法勾當。并以所得不義之財勾結地方軍警胥吏，以打通販運毒品的門路。當時，由陝、甘到上海，到處都有他的朋友，而他在這一路所販運的毒品，只要押運人出示他的一張名片，即可通行無阻。

由于他在賭場中白手起家，因而對賭博一道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具有着特殊的愛好。他經常把麻將牌、天九牌等賭具當作研究的對象，他用棉布擦拭牌的背面，然後察其紋理，辨其異同，不論是什麼樣的牌，只要經他短時間的把弄，就能夠記清每一張牌的暗記，不看牌面，能知牌名，信手拈來，絕少差誤。在別人，當牌還沒有揭開的時候，是無從知其底蘊的；而在他看來，則能根據每一張牌的特征而了如指掌。因此，在玩牌的時候，他可以根據自己和別人手中的牌，運用他的“戰略”和“戰術”，在知己知彼的有利條件下，總是立于不敗之地。他的口袋裏還經常裝着一付骰子，閑時就練習投擲，久而久之，便可以叫骰子聽他使喚，可以得心應手地要幾點就擲成幾點，幾乎是百無一失。孙殿英既然掌握了這樣一套賭博技能，同他在一起賭博的人們，就不能不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成了他手下的敗將。在他當了軍官乃至高級將領以後，這種習性依然不變，他的辦公桌上經常擺着麻將牌、天九牌和骰子等一类賭具，好象某些文人學者對待自己的文具古玩一樣，一坐下來，就愛不釋手地細心把玩。

孙殿英的賭博，對他後來的發迹是有着密切關係的。他常常設宴招待一些銀行和大軍衣莊的經理，宴會之後，照例要有麻將、牌

九之类的所謂余兴。他在这种場合,往往一局終場,就可贏得几千元几万元的巨款,他便拿这些来之甚易的金錢作为扩充实力,广結交游的資本。他对于一些“当令”的人物,經常利用賭博作为交际聯絡的手段,如对待张宗昌、褚玉璞的亲信和后来对待东北軍、西北軍及晉軍的將領們,常常把贏来的錢退還給輸家,甚至有意識地把牌打輸,以取得他們的欢心。这种办法很有效,他曾运用这种手段,博得不少人替他說过好話。

賭博一道,对孙殿英來說,已經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項活动,他曾經对人說:“賭博这个玩艺儿,并不是什么坏事。我可以从賭博中看出每个人的性情,可以針對每个人的性情結交許多朋友,这些朋友,帮了我很大的忙,縱然有的不肯帮忙,至少也不至于說我的坏話。我是一个粗人,沒有真才实学,如果連这点子办法也沒有,我还凭啥混呢?”

二、封建会道門起家

孙殿英在賭博和販毒两途,确实賺得不少金錢,但他并不以此为滿足。他看到在社会上活动的人們,必須是既要有錢,还要有勢,才能够吃得开,叫得响。当时豫西农民,遭受地主、豪紳和兵匪的压迫扰害,特別严重,他們因为沒有获得工人階級的領導,不可能找到解放自己的正确道路,只有把解除痛苦的希望,寄托于“神”的保佑。而狡黠之徒,針對农民这种弱点,遂紛紛組織各种封建会道門,供其利用。孙殿英看到这些会道門在羣众中頗有不小的影响,一旦有事,便可以糾合上百成千的人进行各种活动,他認為这种会道門大可为他利用。因此,这个慣于投机取巧的孙殿英便参加了河南省西部封建会道門之一的“庙会”道。

据说这个庙会道創始于清末民初，它有三位祖师，一姓刘，一姓张，还有一个被称作白奶奶的妇人。张和白的来历不得其詳，只知道姓刘的是河南巩县英育鎮人，自称姜太公轉世，假借神道为人治病，广收会徒。他們有这样俚俗不堪的四句咒語：“上上姜尙轉卯巾，枝授无蔽踵徽音，才育八八原有定，弓长苗裔白何心。”他們把咒語写在黄布或黄紙上，作为每个会徒供奉的神位。

当时这个庙会道的头子名叫李凤朝，是洛阳傅良村的人，孙殿英就是李凤朝的弟子。孙殿英既然看清了庙会道在豫西农民中的影响和潛伏的势力，遂千方百計地加以利用和操縱。在他掌握了一小撮土匪队伍以后，他曾經玩弄了一套騙人的把戏。据孙殿英說，某天夜里，他作了一个梦，梦见祖师指点說：“在某庙宇里面藏有宝剑一柄，叫作‘太阿宝剑’，是神賜給你的，要赶快去取，你如得此宝剑，就可以逢凶化吉，纵横天下。”他一連梦了两次，觉得奇怪，于是起床前往某庙，在行抵某庙附近时，看見庙內灯光閃閃，进門一看，原来是神剑放光。他拜謝神恩之后，捧剑而归。这柄宝剑掛在他的寢室里，还是經常黑夜放光，并且只要神剑錚錚作响，就一定要杀人，实在灵得很。他这个騙人的把戏，利用庙道会徒的愚昧无知，故意在会徒中大肆宣传。因而孙殿英逐漸在庙会道中取得了众多道徒的拥戴，繼李凤朝之后成了庙会道头目。

以后，不知他从那里又弄来了一柄拂尘，据他說也是神賜的。他把拂尘同宝剑用黄綾子包裹在一起，在行动的时候，命他的亲信随从背負而行，一直到他掌握数万大軍的时候，从来也沒有离开过他这随身法宝。他要用这个法宝籠絡人心，使他的徒子徒孙們看到这个法宝，就会想到他們的“老师”的无限前程和非凡事业，死心塌地为他卖命。

庙会道的規矩,凡是收徒、治病和問事,都要摆香堂。香堂里懸掛着咒語,供桌上陈列敬神祭品,焚香燃烛,行跪拜礼。礼毕,“老师”端坐供桌旁,由另一人代神发話,会徒們管他叫作“口”。“口”在发話之前,須飲凉水淨口,少頃,即佯作神仙附体,装模作样,口念咒語,接着发話。愚昧无知的会徒們,便把这些荒唐无稽的話看作是神的意旨,无不奉命惟謹。孙殿英就是利用这个神的代言人作为糾集徒众、发展实力的工具的。他常常示意各地庙会道,叫这个代言人动员豫西农民参加他的部队。在作战的时候,他所派的指揮人員,也大都通过这个代言人來指定,借以坚定官兵的信念。他这种利用迷信、进行欺騙的办法,行之頗为有效。他的队伍,絕大多数是来自豫西的庙会道徒和他的家乡永城一带的人,因而能在几次潰散之后重新召集起来供其利用。庙会道这一反动落后的組織,在孙殿英的利用和操縱之下,成了搜罗政治資本的工具,使得他能够屡仆屡起,在北方各省为害二十余年之久。

三、一个特殊类型的小軍閥

孙殿英自从一九二二年当連长起,到一九四七年被俘,在他的为时二十五年之久的軍人生活中,一貫以投机取巧的办法,看风轉舵,朝秦暮楚,最后竟然墮落成投降日寇的汉奸。下面就是他这二十五年活动历史的簡述。

(一) 从入伍当兵到投靠張宗昌

民国初年,河南有一悍匪,綽号“仁义老张平”,橫行豫西,无恶不作。后为刘鎮华的鎮嵩軍收編。孙殿英曾在张平部下当兵两年余,繼在洛阳重理制造烈性毒品的旧业。一九二二年,吳佩孚駐在洛阳时,曾严令緝捕这个制毒犯,孙以在洛阳不能立足,乃逃往陝

州躲避。由于他在贩运毒品时结识了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的官佐，因而在镇守使署混得了一个副官职位。他勾结丁香玲，依然贩运鸦片和制造烈性毒品，并且以此取得了丁香玲的信任，不到半年，就升为机关枪连连长，居然成了一名军官。他乘机收容豫西土匪、庙会徒众、流氓赌徒以及烟毒贩子等等，开始形成了包括一切社会渣滓、亦兵亦匪、不伦不类的混合体。孙殿英既然以这类人作为兵员补充的对象，他的军队的性质和行动，也就不能不是一股挂着军队招牌的匪类。

孙殿英以这样一个集团为基础，在豫西一带大肆活动。他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驻豫西直军开赴前线的机会，率领他的机关枪连并纠合丁香玲部的一个骑兵连在陕州譁变，东窜洛阳，攻下彭婆镇，缴获民团枪械百余支，继即窜扰临汝镇，又先后攻陷郟县、禹县、临汝和嵩县县城，豫西各地土匪和庙会道徒从之者甚众，一时声势颇大。一九二五年春胡憨战起，憨玉昆收集豫西土匪对胡景翼作战，孙殿英和其他匪首袁英、张得胜、詹老末等，都被憨玉昆收编；孙殿英任第五混成旅长，驻防密县。憨玉昆失败，孙又改投国民军第三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叶荃部下任旅长，旋复升任师长。在国民三军由豫开赴陕西的时候，他又脱离了国民三军，在豫西自由行动。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孙殿英对于胡匪出身的张宗昌（时张宗昌为山东军务督办），早有心焉向往之意。他听说豫西某县县长曹元度与张宗昌为素识，立即托他往见张宗昌，说明率部往投、请予收编的愿望，经曹元度的吹嘘和牵线，张宗昌慨然接受了孙的要求。孙殿英就在一九二五年秋，率部开始了大流窜的活动，由豫西穿过豫中，经过安徽亳州，折而北上，复经过豫东，窜往山东。沿途

所經之地，奸淫擄掠，无所不为，特别是經過亳州的时候，給亳州城关人民造成了历史上少有的灾难。

亳州位于渦河南岸，交通便利，商賈輻輳，地方殷富。孙殿英率領匪众攻陷亳州后，大事搶掠，所有城内商业繁盛地区，如白布大街、爬子巷、南京巷等处，都被焚掠殆尽。已故毅軍統領姜桂題家中所存枪械、弹药、鴉片烟土和金銀財物等也被洗劫一空。当匪众还在亳州逗留的时候，安徽当局陈調元調派了二十个营的兵力將亳州重重包围。但是孙殿英非常狡猾，他揚言：如果城外放一枪，城内就杀一人，以为要挟。因此，围城軍隊投鼠忌器，始終不敢攻城。孙殿英匪部盘踞亳州二十多天，最后架走男女“肉票”数百人，乘隙突围，窜往山东济宁。

孙殿英与张宗昌会面后，深得张宗昌的賞識，立即被委为第五师师长。原来，孙殿英匪部总人数不过五、六千人，竟編了九个旅之多，而这九个旅长之中实际听他指揮的只有两人。张宗昌为了帮助他整頓队伍，由駐在济宁的褚玉璞于是年农历除夕出面請客，俟各旅长到齐，即将孙认为不听指揮的七个旅长一并擒拿枪决，將九个旅編并为两个旅。孙殿英这种翻脸无情、阴狠毒辣的猙獰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从此孙殿英部就在张宗昌的卵翼之下逐漸发展成为一个流寇式的軍事小集团了。

一九二六年春，张宗昌与李景林联合向国民軍反攻，激战于直隶省（即現在的河北省）滄县一带。孙殿英部袭击了国民軍第三軍所属徐永昌部，为张宗昌立下了第一次战功。战事结束后，张宗昌以孙为他出了死力，即将孙部改編为直魯联軍第三十五师，旋又扩大編制，改为直魯联軍第十四軍，以孙为軍长。他自从投靠张宗昌之后，不到一年的時間，就以五、六千人的烏合之众扩充成軍，正所

謂物以類聚，臭味相投，孫殿英對張宗昌投下的這一賭注賭贏了。

一九二七年春，孫殿英在直隸軍務幫辦徐源泉的指揮下，在南京附近參加了孫傳芳對北伐軍的戰爭，不久，又調往直隸大名，並兼任大名鎮守使。一九二七年秋，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馮玉祥部對奉軍第三、四方面軍張學良、韓麟春部發動猛烈的進攻，直魯聯軍之一部開往豫北增援，張宗昌派孫殿英參加了這一戰役，並且撥給他一個白俄騎兵團，以加強他的戰鬥力。孫部徐長齡旅守滑縣，任增祺旅守衛輝。徐長齡與第二集團軍北路軍總司令鹿鍾麟有同鄉之誼，鹿寫信招降，滑縣不攻而下。任增祺死守衛輝縣城，鹿派兵圍困達一百多天，最後由徐長齡曉以大勢已去，堅守無益，終亦開城投降。

當奉軍和直魯聯軍節節敗退之際，孫殿英亦率其殘部向北潰退，先退到天津南倉，繼又退到薊縣、馬蘭峪一帶。這時，何成濬奉蔣介石命策動徐源泉和孫殿英投降，他們正在走投無路的時候，當然俯首就範，接受了蔣介石的任命。孫殿英被任為第六軍團第十二軍軍長，仍歸徐源泉指揮。至此，孫殿英就打起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成為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分了。

（二）東陵盜寶

一九二八年，孫殿英率部開到河北薊縣、馬蘭峪一帶的時候，他看到規模宏大的清朝的陵寢（通稱東陵，在河北易縣良格莊的清朝陵寢通稱為西陵），頓時賊心一動，想作挖墳盜墓的勾當。為了掩人耳目，他先在附近村莊貼出布告，說是舉行軍事演習，並派兵在東陵四周嚴加警戒，鳴槍示威，阻止居民接近警戒地區。這個挖掘任務，是由他的工兵營長顏孫子瑜執行的。六月某日夜間開始行動，先挖開慈禧的墳墓，接着又挖開乾隆的墳墓。顏孫子瑜督飭士

兵先将墓口掘开,为了不致发出巨大声响,对隧道内的石門,采用了以硝鎚水浸蝕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完全无效,旋改用鋼鋤先凿开一个洞,爬进一人,把頂門的石滾子挪到一旁,然后把石門拉开。顯孫子瑜在把每进石門打开以后,亲帶工兵在孙殿英的亲信人員監視之下进入停放灵柩的寢宮,除将灵柩以外的殉葬物品全部取出外,为了搜罗更多的宝物,还将灵柩劈开,尸体也被移置地下,把灵柩内放置的和尸体上穿戴的珍貴物品悉数搜罗一空。他們的盜墓行为,整整用了三夜的时间。在把宝物盗出的时候,孙殿英乘汽車由薊县来到墓地,他将宝物检视一遍之后,滿滿地装了五只大皮箱,由孙亲手将皮箱加封、盖章,交給他的亲信人員帶回薊县司令部。

据当时曾經进入乾隆墓中的人說:墓中隧道全用汉白玉砌成,有石門四进,亦全系汉白玉雕制,寢宮为八角形,上复圓頂,雕塑着九条金龙,閃閃发光。寢宮面积約与故宮的中和殿相等。乾隆的棺槨是用茵陈木制成的,安放在一个八角井的上边。两座坟墓中的殉葬器物,除金銀元宝和明器外,都是些罕見的珍宝。慈禧的殉葬物品,多是一些珠宝翠钻之类,她的凤冠是用很大的珍珠以金线穿制而成的;衾被上有大朵的牡丹花,亦全用珍珠堆制;手鐲系用大小钻石鑲成一大朵菊花和六小朵梅花,澄澈晶莹,光采夺目;手里握着一柄降魔杵,长约三寸余,为翡翠制;她的脚上还穿着一双珠鞋。另外,在棺中还放置着十七串用珠宝綴成的捻珠和几双翠质手鐲。乾隆的殉葬品都是一些字画、书剑和玉石、象牙、珊瑚雕刻的文玩及金质佛象等物,其中絹、紙制品都已腐朽,不可辨認。

孙殿英在盜墓之后,率部移駐延庆县,改編为步兵独立第二旅。这时,馬兰峪滿族人民发现乾隆和慈禧的坟墓都被挖掘,当即

报告地方当局查办。不久，孙殿英派人携带一部分珠宝翠钻到北平秘密出售，因此案早已引起各地军警的注意，正当卖方与珠宝商人进行交易的时候，北平侦緝队当场将买卖双方一并逮捕，连同赃物一并解送平津卫戍司令部訊办。孙殿英的师长譚温江适在北平与何成濬、徐源泉有所接洽，亦被拘捕审讯。

这一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报纸都纷纷登载了孙殿英东陵盗宝的新闻。溥仪聞訊，立即召集清朝遺老开会，結果由溥仪和一些遺老們联名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申訴，要求緝捕孙殿英依法严惩。

孙殿英看到情势严重，乃多方設法，力求解脫，他从赃物中挑选了一部分稀有的珍品偷偷地送給了宋美龄，請其代为緩頰。果然，这份厚礼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原告迭次催促，全国輿論对此案亦极重視，而孙殿英却依然逍遙法外，沒有受到任何处分，就是已被逮捕、羈押在鉄獅子胡同旧陆军部內的譚温江，也得到当局的特別优待。当时的平津卫戍司令閻錫山，虽然組織过軍法会审，并派商震为审判长主持其事，但是商震早已知道“最高当局”（指蔣介石）的意旨，并且与譚温江又是相識，因此，在会审的时候不但不認真追究，反而对譚說：“請你委屈一时吧。”这样，所謂正正堂堂的軍法会审就成为逢場作戏的一幕趣剧了。

中原大战开始后，閻錫山为了利用孙殿英，即将譚温江释放，北平宪兵司令楚溪春还亲自送他到車站。从此，哄动全国的孙殿英东陵盗宝案遂不了了之。

孙殿英所盗东陵宝物，除在北平被扣及送給宋美龄的而外，据说有一大部分由孙的軍需处长李德祿帶往上海出售，正在接洽中，即被人盜去；孙殿英自己收存的一部分，在他以后进攻宁夏的时候，曾拿出一小部分由他的部下楊明卿經手，交給駐在包头的晉軍

旅长田海泉代为保管,后来田說这批东西遺失了;另外,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軍总司令王仲廉进驻豫北,孙殿英以鉅額黄金向王行贿,并以盜陵所得乾隆的白玉搬指、白玉連环簪和周代銅鼎等宝物贈送了王仲廉。孙殿英的盜匪行径,竟然使这批价值連城的珍貴物品被糟塌得无影无踪了。

此外,由于孙殿英狠毒成性,当时,孙部第四师副师长(原任孙的參謀长)赵瑤昆因对盜陵案有不利于孙的言行,在他从延庆返回防地的途中,就遭到了孙殿英的暗杀。

(三) 归 附 閩、馮

盜陵一案,虽然遭到全国輿論的指責和痛罵,但是这个盜匪成性的孙麻子全不把它放在心上,一有机会,还是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恶。距盜东陵还不到一年的時間,便又在山东省章邱县犯下了一桩大搶案。

一九二九年二月,孙殿英奉令移駐皖北蒙城,到达山东省齐河县,即脫离徐源泉的隶属关系,又恢复了他的自由行动。

这时,张宗昌余孽张明九匪部二千余人盘据章邱一带,烧杀擄掠,荼毒人民。章邱有一个村庄叫作九軍,是我国北方著名的“八大祥”(如瑞蚨祥、謙祥益等)綢緞行业資本家孟家的故乡。孟家因不堪张明九匪部的扰害,向孙殿英請求解决张部,为地方除害,許于事成之后酬劳十万元。后来,孟家看到孙殿英只是将张部收編,并未予以消灭,并且还将匪首张明九委为旅长,所以未践前約,仅給孙送了“万民旗”和“万民伞”,以資敷衍。孙对此极为不滿,他唆使所部譁变,将孟家所有金銀財宝和細軟衣物搶掠一空,所搶財物共装二百多輛大車,同时还燒毀孟家住房一百四十余間。

不久,张宗昌、褚玉璞乘日寇还侵占着胶济路沿綫的时候,由

大連到胶东，招集殘部，并拟解决駐防胶东的刘珍年部，以图死灰复燃。孙殿英听说老上司卷土重来，自是喜出望外，便自封为鲁东民軍总司令，挑起了五色旗，率部进驻寿光、桓台，与张、褚取得联系，并派徐长龄、苏醒斋、张明九等率部为张、褚打接应。蒋介石命任应岐部及陈調元所属之一部馳往援助刘珍年，张、褚不得逞。孙見势不妙，乃搖身一变，又恢复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帜。同时，他又借机火并了他的拜把兄弟顧震所部一万余人。

孙殿英虽然成了举世皆知的盜陵罪犯，但是他毕竟还掌握着一部分队伍，在当时几个大軍閥集团明爭暗斗的形势下，他成了各方面爭取利用的对象，孙殿英也就利用这种矛盾，根据自己的利益，挑肥拣瘦，以定取舍。他本来抗拒了蒋介石的命令，沒有开赴皖北，而是逗留胶东，并且与张、褚勾結，情同造反，但蒋介石并不怪他，仍然三令五申地調他开赴蒙城。孙自度在胶东曾干过对蒋不利的勾当，深恐此去凶多吉少，便連发电报向蒋辞职。后經蒋派人当面慰留。除将孙部扩編为新編第十八师外，并增加餉項，补发被服，而且将移防地点改为河南商邱，旋又开往洛阳一带。

一九三〇年春，在蒋、閻、馮、李中原大战酝酿时期，孙殿英看到反蒋势力强大，有意依附閻、馮。閻錫山、馮玉祥亦甚望将孙爭取过来以为己助。这个待价而沽的孙殿英，便毫不費力地从閻、馮那里取得了第四方面軍第五路总指揮兼安徽省主席的重要地位。孙殿英躊躇滿志地率部开赴豫东、皖北布防，他自率一部进驻亳州城內。

在这以前不久，孙往洛阳参加馮玉祥召集的軍事會議，当他和馮見面的时候，馮緊握着他的手說：“殿英老弟，你的革命精神我很佩服！咱們是好朋友，好同志！在反对滿清这一点，我干的是活的

(指驅逐溥儀出宮),你干的是死的(指盜陵)。”孫殿英聽了這番話,登時滿臉通紅,頗為忤怩不安,但他卻很受感動。事後對人說:“總司令真偉大,他要是叫我賣命,弄種(是好漢的反面,河南土語)才會含糊!”

中原大戰開始,蔣介石以孫部有隨時襲擊津浦、隴海兩路交通綫的可能,對他威脅很大,曾派王均、葉開鑫、秦慶霖、金漢鼎等部共八、九萬人的兵方向孫部防區進攻。由於孫殿英對於亳州的防禦戰作了充分的準備,使蔣軍久攻不克。後來蔣派張鈐、王翰鳴(曾任張宗昌的參謀長)先後到亳州勸降,亦均無結果。至此,圍攻亳州的戰鬥遂益趨激烈。孫向閻、馮求援,馮派孫連仲率五個師馳援亳州,內外夾攻,城圍始解。自四月被圍,到七月解圍,共歷時九十八天,亳州人民再一次遭到孫殿英的蹂躪摧殘。

(四) 退據晉城,製造毒品、假鈔

孫殿英依附閻、馮,取得了省主席和總指揮的不小頭銜。但是,好夢未圓,鷄聲報曉,失望之余,又不得不另作打算。

他從亳州出來以後,中原大戰,已近尾聲。他看到戰局前途對閻、馮不利,乃派譚溫江赴沈陽往見張學良,表示輸誠。不久,張學良率部入關,閻、馮失敗,孫殿英率部退到山西,駐防晉城一帶,張學良任命孫殿英為第四十師師長,“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又升任為第四十一軍軍長。從此,孫殿英又投到了張學良的麾下。

孫殿英所恃以活動的有兩套資本:一是兵,二是錢。他為了攫取和充實這兩套資本,從來是不擇手段的。他的兵源,不是從招募選拔而來,而是通過一些封建會道門、匪股等,糾集會徒、匪眾、流氓、地痞,或者是採取“大魚吃小魚”的辦法火并一些兵匪混雜的小部隊。他的財源,除了正式餉項外,主要靠搶劫、賭博、制毒品、造

假鈔等等违法和欺騙行为以取得大量的金錢。如果把孙殿英这两套資本加以权衡,錢,可能是更基本的因素。下面所述,就是孙駐在晉城时弄錢的主要手段之一——制造和販賣烈性毒品。同时也涉及制造假鈔的勾当。

孙殿英为了制造烈性毒品,派李之朴常川住在陝西收买大批制毒原料——鴉片烟土运往晉城,烟土車都有山西宪兵押送,一路通行无阻。制造的毒品有白面(即海洛英)、金丹和“二两三”三种。这些毒品,行銷于山西、河南、北平、天津和上海等地。很多人因吸食毒品,逐漸变为废人,甚至淪为盜窃。流毒之广,害人之深,在孙殿英看来,自然是无动于衷的。

在他大量制造毒品的同时,还伪造河北省銀行鈔票数十万元,在天津购买軍需物品,后被河北省銀行发觉,經张学良告誡,始停止制造。当他在晉城制造毒品和假鈔票的时候,他的駐津办事处人員介紹了两个德国人来到晉城,說是他們能以簡單快速的方法制造假鈔,方法是:把制造鈔票的空白紙复上真鈔票,刷以特制的葯水,即可制成与真鈔毫无二致的假鈔,經孙当面試过,果如所言。他为了用这种方法制造假鈔,曾帶領这两个德国人前来北平,就在他的寓所,交給这两个德国人中国銀行的新鈔票五万元,以备大量制造假鈔,他万沒有料到,假鈔票沒有造成,而这五万元中国銀行的真鈔票却被两个德国騙子給騙走了。有人說:“孙殿英慣于騙人,这两个德国人居然騙了孙殿英,真是‘能人’背后有‘能人’。”

(五) 热 河 抗 战

孙殿英对于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都不肯放过。当他到了值得一搶的地方就搶,到了值得一偷的地方就偷;在国内軍閥混战时期,他便乘机混水摸魚。一旦到了要他对外作战而势又不能不去

的时候,他便利用时机沽名釣譽。

一九三三年二月,日寇動員了熊本第六師團、弘前第八師團、旭川第十四混成旅團和丰橋騎兵第四旅團全部兵力三万余人向熱河進攻。張學良親赴承德進行作戰部署,派張作相為華北第二方面軍總司令,節制萬福麟、湯玉麟等部和由東三省退入熱河的義勇軍。任命萬福麟為華北第四軍團長,率五個旅進入熱河,在凌原、平泉一帶布防;湯玉麟為華北第五軍團長,率六個旅在熱、遼邊境迎击進犯之敵;義勇軍馮占海、鄧文、劉振東、李海青等部則配合湯玉麟部在熱河東部、北部阻击日寇。同時電令孫殿英率所部第四十一軍由山西馳援熱河,任命孫為華北第九軍團長,亦歸張作相節制。

孫殿英接到援熱命令后,曾召集營長以上軍官講話,他說:“我們的軍隊確實有不少污点,有些人罵我們是土匪隊伍。這次出發熱河抗戰,正是洗刷我軍污点的大好機會,我們一定要象樣地干他一場。可是,抗戰必敗,我們不能完全犧牲在那里,要預先計劃好退路,最好退到西北,那里不但安全,而且容易發展。”從孫殿英這番話里不难看出,他之所以抗戰,並不是為國家民族的存亡着想,更沒有勝利的信心,而是企圖借着抗戰這一美名,把他過去的種種罪行加以洗刷粉飾,並且為他以後的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

孫率部經古北口進抵熱河圍場,即以圍場為根據地,派劉月亭旅駐守,自率丁綽庭旅向赤峯前進。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日寇開始向開魯、北票、凌南等地發動進攻。駐熱北、熱東的義勇軍未作抵抗,即望風而逃;湯玉麟的軍隊素質很差,根本不能打仗,湯本人亦無抗戰決心。加之日寇特務早就收買了熱河軍隊中民族敗類崔新五、邵本良、李守信等為日寇作內應。當日寇一進入熱河,北路日軍即由崔新五、李守信引

路由开鲁南下，东路日軍即由邵本良引路由北票西上。万福麟部一經与敌接触，即放弃凌源、平泉和三十家子等处天险要隘，潰退喜峯口內，日軍乃得如入无人之境，以一百二十八騎于三月三日进入承德。当时，全国輿論大譁，紛紛責罵国民党政府和蔣介石因循誤国，而对防守热河負有直接責任的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和湯玉麟等責罵尤甚。

孙殿英率部进抵赤峯、尚在部署未定之际，日寇两个旅团及伪滿軍张海鵬部即向孙軍猛烈进攻。孙殿英虽然沒有坚决抗战的意志，但是迫于当时的形势，无法立即后退，也就只得拼他一仗，不管胜敗，总可以借此宣传，博得抗战民族英雄的称号。于是在赤峯展开阻击敌人的战斗，相持达七昼夜。繼因受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又率部轉移到猴头沟門新陣地，利用山岳地带的复杂地形，繼續与敌作战十余日。迨日寇将孙軍截成数段，分段包围，孙殿英始带着随从数名突围而出，繞道北山、大庙一带返回围場。不久，日寇进逼围場，孙即率領殘部向察哈尔的沽源轉进。行抵下黄旗附近，始与湯玉麟、馮占海相遇。旋經大閣鎮、沽源县退駐独石口。不久，又移駐沙城一带。

孙部在赤峯和猴头沟門抗战的日子里，因为在东北軍、热河軍和义勇軍不战而潰的对比下，曾經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支援，送粮送水，救护伤员，人民对抗战的热烈情緒，使孙殿英也不能不这样說：“友軍不友，义軍不义，都不及热河的人民。”

孙殿英热河抗战，他个人收获很大。一方面，人民原諒了他过去的罪恶，实现了借抗战以邀名的目的；另一方面，他的部队虽然在抗战中受到很大損失，但是他在这时对湯玉麟玩了許多阴谋詭計，結果吞并了湯玉麟的两个騎兵旅和一个歩兵团以及义勇軍李

純华的部队,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实力。

这时,孙殿英看到抗战这面旗帜对他頗有用处,他要利用热河抗战换来的名譽换取更多更大的实际利益,这就需要有一批人来为他装点門面,加强宣传,扩大影响,借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发展自己的实力。他敦請国民党进步人士李錫九为高等顧問,由于李的建議,孙殿英致电何应欽将被押的韓麟符保释出来,任为政訓处处长,以宣侠父(中共黨員)为秘书长。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抗战的力量,扩大革命的影响,又派了很多党、团员和左派进步青年参加了孙的部队。

(六) 宁夏称兵,一败涂地

孙殿英駐沙城的时候,又成了蔣、馮两方交相爭取的对象;馮玉祥爭取他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軍。蔣介石則爭取他不要参加馮的抗日活动。孙殿英利用这个矛盾,竟如愿以偿地取得了退往西北开垦青海的头銜——青海西区屯垦督办。

一九三三年五月,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軍,何应欽秉承蔣介石的意旨,对同盟軍的活动百般地阻挠和破坏。当时孙部防区与同盟軍防区壤地相接,馮曾派张允荣等与孙接洽,积极爭取他合作抗日。何应欽亦两次三番地派刘健羣、戴笠前往拉孙,并以察哈尔省主席为餌,借以造成孙与馮之間的矛盾。在孙殿英看来,如果参加抗日同盟軍,抗日失敗后怎么办?同盟軍是参加不得的;如果听从何应欽的唆使去攻打抗日的馮玉祥,則刚刚由热河抗战换来的名譽又要彻底破产,遭人唾罵,同盟軍是攻打不得的。因此,他对于两方的爭取都不作明确的表示。何应欽看到孙殿英不肯上勾,便又发表了一个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的名义,令孙部离开察省,前往边远的青海,并且相机

予以消灭。这个名义，既然符合了孙殿英的要求，于是他欣然接受，率部西上。这时孙殿英又收编了綏西騎匪楊猴小部，全軍号称有五万之众，在孙殿英率部西上的同时，蔣介石已密令宁夏的馬鴻逵对孙部予以中途截击。

孙殿英率部开到五原、临河、陝垣等地后已經获悉馬鴻逵严陣以待、阻其西行的情报，便停止了西进。五原一带本属于晉綏的势力范围，閻錫山当然不欢迎这位不速之客；但由于中原大战时期孙曾出过力，不便把他驅逐出境，不得已，許以物質上的支援，劝其早日率部西进。

孙殿英处在这样的情况下，留既不能，行又被阻，便不得不寻求外援，壮大声势，以摆脱目前的尴尬处境，并且为尔后的发展开辟广闊的道路。因此，由李錫九前往天津邀請南汉宸到包头共商西进計劃，希望通过南汉宸的关系与陝北紅軍和楊虎城連成一气，共同經營西北。經過中共組織的同意，南汉宸到了包头，孙殿英聘南为高等顧問，优礼备至。

孙殿英与革命力量取得联系，并不意味着他真有革命的决心，实际上，他所拉攏的方面很广。就在这个时候，住在包头与孙联系的人，有广东国民党执行部的代表，有福建人民政府的代表，有汪精卫改組派的代表，还有国民党的 CC 分子。更荒謬的是，还有伪滿溥仪派来的代表赵某也住在那里，据孙殿英自己說，溥仪已封他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他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一定的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他始終是以个人利益作中心的唯我主义者，在投机取巧思想的支配下进行多方面的活动。在他的脑子里，根本无所谓革命与反革命和进步与落后的区别，在一定的時間、地点、条件下，誰对他有利，就利用誰为他服务，即使叛国投敌也未为不可。当他

在偏促綏西、进退維谷的时候,除了与陝北紅軍和楊虎城取得联系并爭取他們的支援而外,已經沒有其它的路子可走,同时,又有李錫九为他策划奔走,这就是孙殿英在这一时期与革命力量和革命人士接近的原因所在。

南汉宸到达包头后,曾經起草一件关于陝北紅軍、楊虎城和孙殿英三方面合作的通电,并經有关方面审閱同意,准备孙部到达陝甘边界时即行发表。孙殿英为了表达自己的誠意,还送給陝北紅軍步枪两千支,輕机枪一百挺,約定紅軍派遣部队到黄河渡口接运(后因孙殿英攻宁夏失敗,紅軍未能收到这批枪械)。

孙殿英为了打通西进的道路,取得宁夏的地盘,計劃先将馬鴻逵打垮,他認為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但扫清了前进之路,而且还減少了后顧之忧。在开始与馬鴻逵部接触的时候,进展頗为順利,很快地就占領了石咀子,包围了平罗和中卫,接着又攻占了五响堡和饅头桥。孙殿英为了速战速决,定下了“明攻李崗堡、暗袭宁夏城”的作战計劃。攻城战一开始,很快就占領了宁夏城外的两道堤岸,居高临下,本已胜算在握。不料他的亲信团长卫曰功听說宁夏警备司令已內定由旅长楊干卿担任,心怀忌妒,不战而退,以致攻城战未能得手。以后孙把大部分兵力調集宁夏城垣附近,形成了胶着状态。本来南汉宸不主张攻打宁夏城,仅留一部兵力围困城垣,監視馬鴻逵部的活动,大部兵力即可长驅西进,但孙殿英沒有采取这个办法。到第二次夜袭宁夏城时,由于楊干卿将攻城計劃密告于馬鴻逵(楊以回族关系,早已与馬暗通声气),攻城之战又告失敗。不久,他的將領孟庆典、丁緯庭和楊干卿都投降了馬鴻逵,于世銘則与何应欽相勾結,企图赶走孙殿英,由他来收拾这个摊子。至此,孙才后悔沒有听南汉宸的話,以致落得师老兵疲,餉糈不繼,

而他平日所倚为心腹骨干的将领又纷纷投敌,他感到茫然了。

在他攻打宁夏的时候,陕北红军已派遣一部队伍到陕宁边境接应;杨虎城亦派杨渠统率部从平凉遥为声援,因孙殿英把全部兵力都使用在宁夏之役,没有及时地取得联系。在这同一时期,何应钦一面对孙部停发餉项给养,一面授意庞炳勋、胡毓坤、戢翼翘等致电孙殿英,劝其悬崖勒马,解甲归田;同时,派侯成与閻錫山商洽由晋、綏出兵,截击孙部;国民党政府并且明令撤销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公署,免去孙殿英本兼各职;之后,何应钦又派富占魁当面劝告孙殿英早日离开部队。这时,这个惯于投机取巧、詭計多端的孙殿英,竟然一筹莫展。他先将李錫九、南汉宸送走,自己则前往太原轉赴晉祠居住。

(七) 林縣投敌,湯陰就縛

晉祠位于太原市的西南,在那里有两千多年以前的古迹,山清水秀,风景宜人,是一个避暑养静的好地方。可是象孙殿英这种不甘寂寞的人,在这样的名胜之区怎能住得下去。他需要另打主意,图謀再起。

孙在晉城駐防时,二十九軍軍长宋哲元在阳泉駐防,孙与宋哲元及其将领时有往来。这时,宋在北方已经造成了冀察一个不小的局面,孙乃派人与宋联系,寻找再起的机会。一九三六年二月,宋邀孙到北平,不久,給他发表了察北保安司令的名义。在宋还没有給他发表察北保安司令的名义以前,他曾經到过天津,同汉奸池宗墨和日本人和知偷偷地进行勾結,和知当面請他前往察北,繼王英之后任伪蒙軍总司令,以德王主政,由他主軍。这一卖国求荣的罪行,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他那种毫无民族气节,无所不为的思想活动,已经昭然若揭了。“七七事变”发生,宋又任孙为冀北民軍司

令。宋离开北平后，孙前往房山县，他将从北平潰退下来的二十九軍阮玄武旅和沿途散兵游勇以及土匪收容了三千余人，迨退到河南武安、陟县时，又逐渐发展到五千余人。一九三九年孙部移駐河南林县，改为新編第五軍，以邢肇棠、康祥（康为刘峙介紹給孙的人）任副軍长，旧部来归者日众。最后达到一万多人，編为第七、第八两师，以刘月亭、康祥分任师长。一九四〇年庞炳勛部开抵林县后，孙部即归庞指揮。

孙殿英过去在热河抗战，虽然時間很短，抗战的动机也不純，但在他的一生中，这一段历史毕竟还是光榮的。可是他現在却不顧惜这段抗战的光榮历史，而是在逐漸地轉化到相反的方面。他授意旧部刘广德和路朝元分別投靠日寇，替他同日寇牽針引綫。同时，与蔣介石的特务勾勾搭搭，搞些不可告人的勾当。

邢肇棠曾不止一次地对他說：抗战就是革命，不抗战就是反革命。八路軍絕對根据人民的意志积极抗战，而蔣介石則是借抗战的时机消灭八路軍，因而他是反革命。應該分清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坚决站在革命的方面，不要偷偷摸摸的另搞一套。但是这个既不講气节、又不講信义、只知个人眼前利益高于一切的孙殿英，那里能够接受这样的忠告。

由于邢肇棠坚决走革命的道路，蔣介石認為他一定与八路軍有密切关系，曾密令庞炳勛将邢肇棠誘捕，押送重庆。孙殿英不仅不設法掩护，反而騙邢同去見庞。幸而邢肇棠发觉了他們的阴谋，机警地摆脱了这个陷阱，投奔八路軍总司令部。

一九四三年春，日寇进攻陵川、林县，孙在林县被日寇围困。按照当时的情况，孙本来可以率領一部兵力突围而出，并在地形复杂的有利条件下（林县多山）进行游击战争。但是他沒有这样做，

而是与国民党特务勾串妥当之后投降了日寇。他为掩饰自己投敌的可耻行为,还给康祥打了一个电报,他说:“梗日所余部队无多,死亦不可,走亦不可,久与戴雨农所派之文强同志商洽,暂时屈就,图报将来。”

孙投敌后,汉奸汪精卫仍任孙为新编第五军军长。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对于住在洛阳的孙部留守人员和孙的眷属,仍按时发给养;国民党政府原定颁给孙殿英的三等云麾勋章,仍以府令公布颁发,何应钦并专为颁给勋章一事致电蒋鼎文:“希将此事告其眷属,善为抚慰,并转达委座及弟惦念彼等之意。”蒋介石对于叛国投敌的罪人,就是这样来对待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蒋介石又任命孙殿英为第三纵队司令,仍在豫北驻防。这时,他勾结国民党运输飞机,在北平和大后方之间,大量做买卖黄金的生意,着实发了一笔横财,并以这笔横财,对北来的国民党各军的将领大送其礼,极尽其贿赂勾结之能事。

一九四七年四月,由美帝国主义装备的蒋军快速部队开到豫北。我人民解放军为了解决这支队伍,以一部兵力为饵,将孙殿英司令部所在地的汤阴县城予以包围,吸引敌人前来应援,以大部兵力从两翼延伸,形成一个口袋形的阵势,待敌接近汤阴时,即从两翼包抄,一举而将其歼灭。当时,这个快速部队对于援救孙殿英既不感兴趣,而对战力坚强的人民解放军又不敢接近,于是我人民解放军即以几个小时的猛攻将城垣攻下,孙殿英俯首就擒。

我人民解放军对孙殿英十分宽大,在生活上给以特殊的照顾,希望他悔罪自贖,重新做人。但是,这个多年来骑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的孙殿英,如何能甘此寂寞,而且他又有吸食鸦片的嗜好,不久即抑郁患病而死,结束了他一生的丑恶历史。

刘神仙与四川軍閥

蔣 尙 朴

熟悉旧中国历史的人們，也許还能記得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三年四川鬧过所謂刘神仙。其人其事从今天来看自然极其荒誕，但在四川当时那样的社会中，刘神仙在整个四川的政治和軍事乃至社会上都曾发生过不小的作用。作者是刘神仙的道徒之一，愿就記憶所及，加以比較全面的叙述，对于了解当时四川的情况会有一定的帮助。

算命先生創立孔孟道

刘神仙本名从云，道名白鶴，四川威远县人，大約生于一八八三年。他幼年讀了些旧书，后来就在乡間挂起測字算命的招牌，作为生活的工具。因为他工于心計，能言善道，又在乡間掌握了地主、袍哥和乡民們的一些情况，他所算的命、測的字多半“灵驗”，漸漸有了“名望”，于是引起了他的野心。四川在旧时代，是軍閥、紳粮、袍哥和会道鈎心斗角的时代。刘神仙計上心来，就由算命先生創立了他的孔孟道，自称道主。他吸引羣众的最大法宝是“点道作功”。他說：“作功运气要从两腰和肚臍眼中間起，透出喉管，离頂命心冲出来一寸三分高，显出一条紅綫，紅綫頂上現一顆紅珠。無論行走坐臥都要想到这个紅珠，自然会起变化，而且变化无穷，随心

所欲。但必須严守秘密，虽夫妇間也不能泄露。”所謂“紅綫”、“紅珠”自然是些幻觉，大概是因为他練熟了拳术上的一套气功，就把它“神化”一番，引人上套。同时，如同一般会道，他也利用“降乩”、“降体”的方式愚弄信徒；先期訓練好几十名“乩手”和“体生”作他的帮手。每逢“降乩”“降体”的时候，不是“关夫子临坛”，就是“李老君降世”，装模作样，写出或說出一套預先編好的詞句。这种花样本是算命測字的另一种神而化之的表现；人們的吉凶祸福，托諸神仙之口，一經巧合道中，就不免被落后羣众信服得五体投地了。

刘从云創道之始，約在一九二五年以前几年，正当举国騷然，四川又特別混乱、民不聊生的时期。他到处宣传說什么“浩劫就要临头，眼看桑田变成滄海。人們想逃避浩劫，只有信仰孔孟道。”这些話在落后羣众中起了影响，結合他原来已有的基础，加入孔孟道的徒众就一天天多了起来；地区也由近及远，逐漸扩大。到了一九二五年，他竟有了男女老少道徒一万余人，包括有地方的紳粮、地主、袍哥的“舵把子”一类人物，分布在威远、荣县、內江、富順等县，声势相当浩大。神仙之名，从此传起。他收徒的普通手續是先經人介紹，然后举行点烛焚香、頂礼磕头的仪式；道徒賭咒发誓，决不泄露秘密，他才开始点道，传授那套“作功”。

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刘从云在道徒中选择了一些比較活跃的角色，对他們說：“你的根基很好，是前代×××（历史上或小說上的有名人物）轉世，今后前程远大，定能安邦治国。……”这样，他就有了一批骨干，替他到处活动、宣传，拉攏了不少中上层人物，势力逐漸伸入到軍政紳商各界。

刘从云把这些中上层人物分別組織到成都的“靜候館”、重庆的“靜德館”、万县的“事园館”等館坛中作为一百单八位将星。另

在柴、威、富、内各县乡镇也设有一些馆坛，在他家里设“明通总馆”，馆下有六个通部，总揽一切。这类馆坛的组织叫作“调舟”，被“调舟”的道徒共三千六百八十四人；“调舟”的开始，又要赌咒发誓，说什么“力保恩师，严守秘密，毁家纾难，互相提携”。“调舟”之外的徒众分为若干组，由总馆六个通部的头目分别负责传道之责。

网罗了四川的大小军阀

一九二五年，四川大军阀之一的刘湘，在重庆经刘佛澄之介绍加入了刘神仙的孔孟道，道名玉宪。他随即介绍潘文华（道名玉羽）、唐式遵（玉美）、王纘绪（玉道）、王陵基（玉豹）、范绍增（玉泉）等人加入。他们被“调舟”到万县组织“事园馆”，由刘湘任馆长，潘文华、唐式遵任副馆长。我是在万县经潘文华介绍加入的。成都的“静候馆”道徒多半为当地士绅，现尚未死者无几。重庆“静德馆”馆长是邓锡侯（玉齐），道徒有贺国光、彭光汉、蓝文彬、陈书农、竊禹门、黄石子、寇孟波、何克修等。一九二九年，刘文辉由刘湘介绍在泸州加入，道名玉献。一九三三年杨森由潘文华介绍在成都加入，道名玉勇。其余二十一军营长级以上的军官加入的约有百分之九十。田頌尧、李家钰、罗泽洲、谢德堪等也都参加。其他各军军官也有少数加入的。可以说刘从云的孔孟道，几乎网罗了所有的川中大小军阀。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四年，每逢阴历初一、十五，先后在唐式遵、潘文华家里讲道，刘湘讲的是拿王阳明的书照本宣科；刘从云有时亲自来讲，无非是要大家努力“作功”、才能避免浩劫的那套鬼话。

一九二七年，刘从云借口“事园馆”、“静德馆”的“灵根”还未调

齐，出川前往汉口、上海一带活动。刘湘那时完全以神治军，刘从云变成他的军师，言听计从。刘从云临行前对刘湘说，如有困难而又不便通电写信时，就派亲信人去找他。一九二八年，刘湘从外国买进的一批枪械、子弹、飞机被蒋介石扣留，同时感到所部驻地只有江北、巴县、璧山，周围驻军逼得很紧，难以应付。他就派我去找刘神仙想点办法。我在汉口找到了刘从云，把刘湘的困难转告他。他说：“枪械已无希望，我曾阻止不买而玉宪不听。到了明年或者可以拿到一点子弹，由张必果（刘湘的驻京办事处处长）运回。”同时，他大概探听到了内幕消息，断定重庆要有战事，叫我立刻回四川，告诉刘湘集中兵力，把王纘緒全部由资、内调到重庆，战事发生时，刘湘必须亲自出马，指挥王陵基、王纘緒、范绍增等作战；由唐式遵守重庆，向江津赖心辉、永川刘文辉警戒；潘文华守桃子垭，向合川陈书农警戒。我在九月下旬回到重庆，刘湘照刘从云的计划作了布置。十月下旬，杨森、罗泽洲、谢德堪等部果然联合进攻重庆，被刘湘所部打得大败，杨森退到渠县，所有下川东二十九县防地都被刘湘占有。刘从云原先说过，对付杨森，适可而止，不必去抢万县，因为万县有“事园馆”。可是刘湘所部乘胜追击就占据了万县，而且当事人把“事园馆”搬到重庆。刘湘恐怕得罪刘从云，在战事快完的时候，又要我去汉口，向神仙请罪，另择日期安设坛馆。刘从云指责刘湘搞得太凶，说以后必须听他的话，否则得罪“上天”，他不再为弥补。

四万银元布置神仙府

刘湘经过这一次的胜利，对刘从云更加信仰。一九二九年上半年，命我代表“事园馆”、董荣彬代表“静德馆”全体道徒前往汉口

欢迎刘从云回川，“靜候館”的徒众也同时发出欢迎的电报。刘从云随即得意洋洋地回来，经过万县受了王陵基的特殊款待，为王扶了一次乩，但王以后由于乩笔并不灵驗，对神仙不很信服。神仙到达重庆上岸时，由潘文华、唐式遵率领全体道徒在朝天門碼頭欢迎。刘湘和神仙重相聚首，极尽推崇的能事，正式尊为軍师。他和潘文华、唐式遵在重庆江家巷买了一所大房子，布置得非常华丽，共用去銀元四万余元，作为神仙駐节之所。刘从云一度返乡后，一九二九年夏秋之交回到重庆，就迁居新府，每月由刘湘送他生活費三百元。但神仙并不以此为滿足，他常常借乩笔的“指示”，要刘湘把軍事、政治、財政等权交給他办。刘湘既不敢当面违背神的意旨，又不愿随便把政权让入，反而要我从中轉圜，拖延下去。

刘湘、潘文华、唐式遵等常到江家巷神仙府秘密會議，有时王纘緒也参加。刘从云主张刘湘同邓錫侯切实联络，对楊森、刘文輝、刘存厚、李家钰、罗泽洲、田頌尧等也要忍让維系，在政治上采取一致行动，經濟上予以支持，这样才能增強势力，提高声望。他又一再丁宁刘、潘、唐效法桃园三結义，对“事园館”徒道特別照顾；并且联络云南的龙云、貴州的王家烈，把西南半壁打成一片，一俟时机到来，即可問鼎中原，向外发展；那时刘湘率所部順江东下，邓錫侯率所部由川北向陝西出动，就可以立大业，成大事。刘从云又故意把这些意見向川中各軍駐渝代表泄露出去，借以向大小軍閥們討好。于是各个軍閥向刘湘有所要求，都走刘从云的門路。有时刘从云也要我向刘湘說項，催拨各軍的餉彈或放还被扣的軍用品等等。

“收緣大会”与“百子訓練班”

刘从云为着显示他的神仙威力，于一九二九年阴历八月十三日到十五日，在重庆南岸真武山举行了三天的“移星轉斗”的“收緣大会”，参加的除重庆道徒外，还有荣、威、内、富四县的道徒。这个会仍不外“磕头烧香，求神求天，禱告恢复道徒的灵性，使他們能够担当国家大事”。刘从云在真武山坝里点了三千六百八十四盞灯，三昼夜不息。刘湘在会后請道徒們吃了一頓豪华的飯，每人送牙筷一双、毛巾一块。

这年阴历九、十月間，刘从云从荣、威、内、富四县的各館内选了一百名青年道徒，集中重庆南岸大佛寺訓練，定名为“百子訓練班”，表面却挂着二十一軍干部訓練班的招牌；以刘湘的同学李任湘（靜德道徒）为教育长，共分三个分队，分队长为王蔭槐、周文彬（靜德道徒）、謝作孚（事园道徒）。訓練学科是典范令的摘要，术科采取“降体”的方式来教授白刃战，如“黄忠降体”大耍宝刀之类。后来把这一百人拨在重庆花生坪作为二十一軍新兵五个大队的下級軍官，第一大队长吳善长，第二大队长刘晓嵐（吳、刘均靜德道徒）；第三大队长是我，第四大队长謝作孚，第五大队长董荣彬。到了腊月，刘湘派我同刘晓嵐到上海买枪，事先已在南京、上海办好手續。我們到上海会同凌謂宾与安理英洋行接洽，买得路易式机关枪六百挺、步枪三千支并附子弹若干万发，但也經過半年才运回重庆，分配在新兵各大队使用。我去上海以前，还奉刘湘命陪刘从云到綏定去見吳佩孚一次；吳請刘从云扶乩，指示一条安全出川的路綫。

一九三一年上半年，刘湘和刘从云以新兵大队为基础，成立了二十一軍模范师，刘湘負师长的名义，下轄三旅，第一旅旅长人名

沒宣布，第二旅旅長何純武（即何克修），第三旅旅長廖澤（靜德館徒）。所有第一旅的人員安置及餉糈分配均由劉從雲親自主持。第一旅屬三團，第一團長吳善堂（靜德館），第二團長是我，第三團長劉曉嵐（靜德館）；另設機關槍營，營長是劉從雲的長子劉啟武，他也是有名的“乩手”。所有營連排長都是從百子訓練班挑選出來的，士兵夫役都是榮、威、內、富四縣的道徒。本來在上海買槍彈的款項已經劉湘撥付，可是劉從雲却借口乩筆，說是奉天命辦理，要四縣道徒履行毀家抒難的誓言，捐出一筆巨款。四縣道徒不敢違抗“天命”，只好傾家蕩產，甚至有些人賣妻鬻子，共湊集了二十餘萬元獻給神仙。後來花生坪發現匿名揭帖，敘述詳細經過，神仙假名斂財的把戲才被戳穿。

一九三三年，二劉（劉湘、劉文輝）發生衝突，在榮威激戰半月。劉湘方面的一切軍事計劃，都由劉從雲擬訂，劉湘執行。有一次劉湘沒有照計劃行軍，吃了一次敗仗，劉從雲就負氣回家，劉湘只好派侍從秘書張齡九（事園館徒）去威遠接回軍師，向他請罪。劉從雲的軍事計劃，也用乩筆指示。當時有人說這是“以神治軍，以軍亂政，以政虐民”，確是實在的情況。這次二劉之戰，互有勝負，劉文輝自知難於持久，提出議和，戰事暫告結束。

不久，鄧錫侯同劉文輝在昆河發生戰爭，鄧曾到資陽陽化場同劉從雲秘密會晤，劉從雲勸劉湘接濟鄧軍二十幾萬元款項和四十幾萬發子彈。同時劉湘又乘機進攻劉文輝，劉文輝在岷江潰敗，率殘部退往雅安。劉從雲不但勸止劉湘不必窮追，又要劉湘撥給劉文輝棉軍服一萬餘套、款項十萬元。至此，劉湘和鄧錫侯團結很密，劉湘所部擴充為三個軍，軍長為唐式遵、潘文華、王纘緒。劉從雲竭力慫恿劉湘整軍經武，以待時機，在下川東駐防三個師，其餘

分駐在所占領的各县。这样,刘神仙、刘軍师更成了四川軍人的偶象。

紅軍入川打破了偶象

但是好景不常,刘从云的这块神仙招牌,不很久就被紅軍入川而打破了。

一九三三年十月,工农紅軍在通、南、巴建立了軍事根据地后,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指揮邓錫侯、田頌尧、楊森、唐式遵、刘肇乾(刘存厚的胞弟)等部进攻紅軍。所有进攻計劃,仍然出諸刘軍师之手,并写成小册子散发。唐式遵所指揮的王陵基、范紹增、陈兰亭等部都是刘湘直属的“精銳”,共約五万人。刘軍师因为刘湘不能亲上前綫,便授意各軍道徒推他到南充坐鎮,指揮前綫軍事;并且又降乩請到关夫子,說关公指定他作軍事委員長,接着发出就职通电,故意和蒋介石的軍事委員長相抗衡。“刘委員長”就职之始,先将信心不坚、甚至反对他的第三师师长王陵基調回成都軟禁起来,刘湘命許紹宗繼任第三师师长,仍归唐式遵指揮。六月間,唐部在万源大敗,潰不成軍。刘从云諉过于唐式遵,說唐不按照他的軍事計劃。其实他的計劃完全胡鬧,軍队出发不但要按吉日良辰,而且指定“行軍大吉”的方向;因此有的軍队照办的几乎走上悬崖絕壁,传为笑柄。刘从云見事不妙,仓皇乘飞机逃回成都。刘湘曾命我到南充阻止他,等我到时,他已逃之夭夭了。自此川中各軍多数人士都猛醒过来,紛紛反对这位神仙軍师,刘湘所部有些軍官主张杀神仙以謝川人。刘湘无可奈何,終于在一九三五年初把神仙礼送出境。

解放后,这位神仙被政府逮捕改造。

补充和訂正

編者按：本刊所發表的史料，雖然大都是各方面人士根據親身經歷和見聞所寫的稿件，但是或者因為事隔多年，或者因為當時了解有所局限，所述事實難免有錯誤和遺漏之處。因此，本刊在發刊詞中曾經要求讀者以他們本身的親身經歷和見聞同本刊所選載的資料互相參証，提出補充和訂正，俾史料內容更臻于翔實全面。出版以來，我們曾接到不少熱心的讀者提出補充和訂正的意見，本輯特摘要發表。今后將繼續發表這一類的來稿，希望讀者協助我們做好這一工作，即使對於時間、地點或人物姓名、身分的訂正，都是有價值的。

關於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熊雄等同志的被害

宋 雲 彬

《文史資料選輯》第二輯覃異之委員寫的“黃埔建軍”，簡明扼要，很有史料價值。惟最後講到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背叛革命後，“軍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和宣傳科長楊其綱同志於四月十五日在廣州被捕，不久即遭槍決”云云，尚須作必要之訂正和補充。按那時候做政治部宣傳科科長的是安體誠同志，不是楊其綱同志，楊其綱同志是政治部秘書。安體誠同志號存真，原在浙江私立法政

專門學校當教授，教社會科學，一面跟宣中華同志等秘密做黨的組織工作。一九二六年黨調他到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工作積極，態度誠懇，黨外同志也都很敬佩他。一九二七年四月下旬（或五月初）他離開黃埔到了上海，在上海法租界和平旅館被捕，不久就被陳羣、楊虎殺害了。熊雄同志從被捕到被慘殺的情況，方鼎英委員完全知道。方鼎英委員那時候是黃埔軍校的教育長，他對於熊雄同志的被害甚為憤慨，直到一九四四年，我在桂林，方鼎英委員還來找我，跟我詳細地談熊雄同志被捕前後情況，我當時曾筆記下來，可惜後來在從桂林倉皇出走的時候把筆記本丟了。現在我建議請方鼎英委員寫一篇文章，把那時候的種種情況記下來，倒是一種極有價值的史料。

第四、五兩輯訂正二則

任 鴻 雋

近來我閱讀《文史資料選輯》第四、第五兩輯，發見有一二記載錯誤之處，特為指正，請予改正。

（一）第四輯“新政學系”一文中說：“王又庸、李為倫、盧作孚均於一九三六年一月到成都接事。”（見該輯第九十二頁）一九三六年我在成都任四川大學校長，記得當時的教育廳長是蔣志澄而非李為倫。

（二）第五輯“抗戰期間閻錫山和日寇的勾結”一文中說：“安平會議的時間是一九四一年夏天……”，而此下記載日人花谷的發言說：“珍珠港一戰，英美都被我們打垮了……”。我們曉得珍珠港

事件发生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一九四一年夏間日人何能預言其事。因此必有一誤。

“南行使命”文內有关湯薌銘史实訂正

陶 菊 隱

《文史資料选輯》第四輯刘驥所写“南行使命”一文中，提到湯薌銘的旅长张九維（見該輯第六十一頁），恐有錯誤（当时我在湖南）。湯仅有車震一旅，并无张九維其人，可能是团营长，則我不知道。

至于說湯与张敬尧打过一仗，那更是大錯特錯的，因为湯、张都是北洋派或站在北洋派方面的；湯于一九一七年被湘軍逐走，张于一九一八年入湘，根本是风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

关于袁世凱

惲 宝 惠

第三輯所載“北洋軍的建立”一文，作者张联棻先生与我曾同在馮国璋系統下任职，但他又是段祺瑞的学生，所記頗为詳备。惟他說袁甲三是世凱的祖父，这是錯了，因为袁保庆只是甲三之姪（是否胞姪，尙待考）。又世凱投奔吳长庆，是吳在山东登州的时候，后来随吳到了朝鮮，遂嶄然大露头角；此文說袁去到朝鮮找吳长庆，这亦是錯了。我以为袁的出身及在清代所經歷，应以《容菴